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172 期)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毛昭晰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 主 编 刘晓清(常务) 邓咏秋 潘杏梅 赵继海

陈益君

编辑部

主 任 朱小燕

编 辑 李 芳 郑秀花 王晓琳

编 务 茅珍艳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投稿邮箱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浙江国广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10-10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18年第10期(总第172期)

本期责编 王晓琳

■ 浙江经验

打破“篱笆墙”的公共图书馆

——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嘉兴模式”实践与探索

沈红梅 鲁 祎 6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探析

孙云倩 14

双创背景下嘉兴市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建设

沈红梅 王娟娟 17

魏塘模式:镇级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的新出路

黄旭东 22

总分馆制视角下阅读推广人培育的创新实践

——以海宁市图书馆为例

吕佳兰 26

组建农民读书会 改善基层阅读环境

——平湖市的探索与实践

陆爱斌 31

总分馆体系下24小时自助图书馆及可持续发展思考

——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

赵晓华 34

■ 学术论坛

日本主要中国学研究机构介评

刘立群 李吉子 38

建国初期浙江省对私家藏书的保护研究*

钱文艳 44

我国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综述*

楼海萍 潘杏梅 方 红 胡海翔 袁明捷 50

■ 探索与创新

基于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研究* 严贝妮 米 雪 刘青青 56

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及激励策略研究	袁 焯 孙瑞英	61
美国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实践及启示	王占梅	65
■ 工作研究		
城乡公共文化协同发展的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研究		
——以山西省永济市为例	李子峰	69
基于校地合作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探索*		
——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朱如龙 邢 玎	73
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郑 永	77
■ 文献学研究		
从郑樵目录学思想探析《通志·艺文略》类目数量	刘俊勃	80
新发现张寿镛及《四明丛书》稿抄文献研究*	李开升	87
《韩诗翼要》三题考辨	吕冠南	93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年征订开启		96
浙江省藏国家珍贵古籍撷萃	封二 封三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10 2018 (Serial No.172) Monthly

- Breaking the "Fence"—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Jiaxing Mod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Shen Hongmei, Lu Yi 6
- Analysis of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n Central Library & Main-Branch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Jiaxing
Sun Yunqian 14
-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aker Space" of Jiaxing Lib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Innovation
Shen Hongmei, Wang Juanjuan 17
- Weitang Mode: A New Way to Socialized Operation of Town Level Cultural Centers
Huang Xudong 22
- Reading Promoters' Innovative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Taking Hain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Lü Jialan 26
- Building a Farmer Reading Club to Improve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 Case Study in Pinghu
Lu Aibin 31
- Thinking about Operation Stat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24-hour Self-service Library under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Jiaxing Library
Zhao Xiaohua 34
- Introduction and Review of Major China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Japan
Liu Liqun, Li Jizi 38
-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PRC
Qian Wenyan 44
- A Research Summary on Downloading Indexes of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Lou Haiping, Pan Xingmei, Fang Hong, Hu Haixiang, Yuan Mingjie 50
- A Study on Evaluation of Digital Library Librarians based on Users Incentive Mechanism
Yan Beini, Mi Xue, Liu Qingqing 56
- Game Analysis and Incentive Strategy Research on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Library Alliance
Yuan Ye, Sun Ruiying 61
- Study on American Libraries' Practice on How to Protect Youth from False Information
Wang Zhanmei 65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in-branch System of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aking Yongji in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Zifeng 69
- Exploration on Practices of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ies based on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Local Government—Taking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Library as an Example
Zhu Rulong, Xing Ding 73
-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Literature Donation System in Public Libraries
Zheng Yong 77
- On the Categories of *Yiwenlve of General History* From Zheng Qiao's Bibliographic Thoughts
Liu Junbo 80
- A Study on Zhang Shouyong's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and His *Simingcongshu* Manuscripts
Li Kaisheng 87
-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ree Factors of *Hanshi Yiyao*
Lü Guannan 93

· 浙江经验 ·

编者按

近年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不断强调要建设覆盖全社会、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到了法律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浙江现象”以及浙江如何破解“成长中的烦恼”、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深入思考,引发了他对文化力量的更深层思考,把文化力量比喻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他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提出了浙江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省委省政府顺应浙江发展新特点、人民文化生活新期待,以更大力度谋划和布局文化发展。

我省推动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及其丰硕成果,为坚守文化自信、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浙江经验、浙江智慧、浙江元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省委坚持把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谋划和布局,我省文化惠民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不断丰富。全省各地积极面向基层,从整合文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入手,努力建设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超市式”供给、“菜单化”服务的模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效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改善了文化民生。

2016年6月,国内首个公共图书馆地方服务标准——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2011-2016)《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批准发布,浙江省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方面再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近几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以嘉兴为代表的总分馆模式、以温州为代表的24小时城市书房都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浙江公共文化服务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卓有成效的创新实践,受到文化工作同行和学界的关注。

为总结浙江经验、汇聚浙江智慧、推广浙江元素、探讨浙江模式、扩大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力,本刊从2018年第10期起刊登3期“浙江经验”专栏,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 浙江经验 ·

打破“篱笆墙”的公共图书馆

——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嘉兴模式”实践与探索

沈红梅 鲁 祎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0)

摘要: 2005年以来,嘉兴市坚持“城乡一体、普惠均等”的原则,构建了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单体图书馆服务转型为数字与纸质相结合、虚拟与现实相结合、全媒体、体系化的现代图书馆服务,基本解决了本区域乡村居民读书难的问题,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打破“篱笆墙”的创新之路。文章探析了“嘉兴模式”的建设历程与主要做法、基本特点、建设成效,以期为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嘉兴模式;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Breaking the “Fence” ——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Jiaxing Mod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Abstract From 2005,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iversal equality”, Jiaxing builds “Jiaxing mode”——an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urban-rural integrated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with logical structure, sound functions, cover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an initial realization that traditional and single-library service has become a part modern library service, which is systematic and all-media, combining digital and paper-based resource, virtual and realistic services. The “Jiaxing mode” mentioned above main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reading accessibility for rural residents, explores an innovative road which could break the “fence” nationwid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main method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Jiaxing Model,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urban-rural integrated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Jiaxing mode;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aera;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2005年12月,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嘉兴模式”肇始于此。所谓嘉兴模式乃是将过去一级政府建设一个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转型为多级政府共同建设一个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创新模式。其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在“多级投入”的

政府主导下,推动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馆全覆盖,同时实现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以及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亦即所有公共图书馆之间的“篱笆墙”统统打破,在总分馆体系内文献资源统一检索、统一流通,其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截至2017年底,嘉兴已建成1个中心馆(嘉兴市图书馆)、6个总馆(嘉兴市图书馆、海宁市图书馆、桐乡市图书馆、平湖市图书馆、嘉善县图书馆、海盐县张元济图书馆)、64个乡镇(街道)分馆、92个村(社区)

分馆、12个自助图书馆、6个汽车图书馆,以及1 200多个企业、部队、学校、机关单位等图书馆流通站(包括农家书屋)组成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四级网络服务体系。

1 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

从建设之初,嘉兴就基本确立了城乡一体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目标:围绕城乡一体化建设战略目标,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整体规划、统一实施的方针,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构建以市、县级图书馆为中心,以图书馆乡镇分馆为纽带,以村(社区)图书室和图书流动车为基础,以企业、学校、部队等行业系统图书馆联合加盟为补充,以全天候多平台的数字服务为手段,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2 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历程与主要做法

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根据自身特点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三重服务体系,分别是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图书馆联盟”服务体系、“社会资源整合”服务体系。通过三重服务体系的建设,基本实现了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优质、免费、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有效解决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城乡居民读书难问题,从而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和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一成功的探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被誉为打破“篱笆墙”的公共图书馆,被业界誉为“嘉兴模式”。

2.1 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

“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是由嘉兴市图书馆和嘉兴市下辖的五县(市)公共图书馆及其分馆共同组成,通过“一卡通”实现了整个服务体系内资源的共建共享和通借通还。读者走进任何一个分馆,都可以平等利用整个服务体系内的纸质资源和数字资

源,享受到整个服务体系内的所有服务。其中,中心馆由嘉兴市图书馆承担,是整个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核心,统筹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实施和业务指导。总馆由嘉兴市图书馆和五县(市)公共图书馆分别承担,发挥当地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中业务管理的作用。乡镇(街道)分馆指各总馆辖区内的乡镇图书馆和街道图书馆,除了提供服务,还负责管理和指导本辖区内的村(社区)分馆。村(社区)分馆是服务体系的末端,直接面向广大群众提供优质平等的服务。在村(社区)分馆无法覆盖的区域,通过设置图书流通站、建设自助图书馆、设置汽车图书馆服务点、送书下乡等方式提供延伸服务,从而实现嘉兴地区内的公共图书馆全覆盖。

嘉兴的“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始于2005年,经历了总分馆初步探索、市本级乡镇(街道)分馆试点、乡镇(街道)分馆全面建设推广、覆盖城乡的服务体系全面构建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07年):总分馆建设初步探索阶段。2005年底,嘉兴市图书馆与秀洲区政府采用契约的形式共同建设嘉兴市图书馆秀洲分馆。这一阶段,嘉兴市开始摆脱公共图书馆各自为政的局面,起步探索在未建公共图书馆的城区建设区级分馆。

第二阶段(2007年):市本级乡镇(街道)分馆试点阶段。以2007年南湖区余新镇和秀洲区王江泾镇的乡镇分馆建设试点启动为标志,积极探索市本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路子:以在乡镇(街道)设立嘉兴市图书馆紧密型分馆的方式提升农村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实现以城带乡共同发展。“嘉兴模式”的乡镇分馆建设模式如下:

(1) 乡镇分馆的建设方式

嘉兴的乡镇分馆由市、区、镇三级财政共同建设。乡镇分馆的馆舍由乡镇负责建设;乡镇分馆的设备费用由区财政给予补助;乡镇分馆日常运营经费以及当地管理人员的工资等也由乡镇负担;年底考核后,区财政按考核等级分别给予10万元的补助。而分馆的图书、报刊、数字资源、计算机管理软件以及市馆派出管理人员的工资由市图书馆提供。每设立一个分馆市财政每年给予市图书馆10~15万元的购书费和一定的相关经费。

(2) 乡镇分馆的分布、功能设置及办馆规模

乡镇分馆根据当地人口总量以及中心镇区的人

口集聚规模来配置服务功能。基本功能为书刊借阅、少儿借阅、电子阅览以及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等。每个分馆藏书3~5万册、配置计算机15~20台、阅览座位80~100个,还设有培训、讲座以及展览的空间。分馆的馆舍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大的分馆可达1 000平方米左右。

(3) 乡镇分馆的服务项目及服务方式

乡镇分馆与市图书馆纳入同一个计算机业务管理系统中,实行网络化服务,服务项目与总馆相似。分馆的读者和总馆的读者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完全平等的服务待遇。乡镇分馆实行每周6天开放,节假日照常开放,每周开放50小时以上。

(4) 乡镇分馆的管理方式

乡镇分馆的业务工作由市图书馆负责,业务规范和服务工作规范等由市馆确立,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实施。总馆与分馆之间以及各个分馆之间在业务规范和服务规范上完全统一。

市图书馆设有乡镇分馆藏书的统一采购中心和分编中心,图书报刊、数字资源等由市馆统一配置。市馆根据各分馆的规模配置相应图书,首配置图书不少于3万册,以后每月至少提供两次新书。每个分馆的报刊配置在250种以上,部分书刊资源由总馆负责定期流转。

在工作人员的管理上,由市馆派出业务骨干担任各分馆馆长,其他管理人员则由乡镇政府招聘并保证他们有合理稳定的工资与福利,市馆负责对其业务培训,要求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并定期接受考核。

第三阶段(2007—2011年):乡镇(街道)分馆全面建设推广阶段。在市本级建设乡镇(街道)分馆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向嘉兴市下辖的五县(市)全面推广。嘉兴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07年明确提出两年内嘉兴市本级全面建设乡镇(街道)分馆的目标;嘉兴下辖的五县(市)乡镇(街道)分馆的建设工作也全面启动。此阶段中,嘉兴市建立了市、区、镇三级政府合作建设图书馆的共建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并建立了服务体系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促进服务体系的领导机制、推进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基本形成。此外,为了规范乡镇(街道)分馆的建设,嘉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对乡镇(街道)分馆建设的总体目标、具体任务等作了详细阐述,提

出了统一的建设标准,在全市各县(市)加以推广。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体系全覆盖建设阶段。①从乡镇(街道)分馆建设延伸到村(社区)分馆建设,在人口较多、条件成熟的行政村(社区)设置村级分馆,而其他人口较少、条件不具备的村(社区)则采用设置图书流通站、自助图书馆、汽车图书馆、送书下乡等方式实现图书馆资源的流通和共享。②乡镇分馆完成升级改造,从保障型的1.0模式过渡到设备、空间和服务全面升级的2.0模式。2018年随着高照街道分馆的开馆,嘉兴的乡镇(街道)分馆开始步入3.0时代,即乡镇(街道)分馆与24小时自助图书馆相结合,将在城市普遍推广的自助图书馆服务延伸到乡镇层级,保证乡镇居民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下班之后,仍然可以享受图书馆借阅和空间服务。

在嘉兴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定,经过不断适时修改、补充和完善,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面向所有城乡群众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为了将这些经验和做法固化下来,2016年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定出台了《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2017年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服务规范》,作为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文化主管部门和标准化主管机构的支持和推动下,嘉兴市图书馆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提炼了嘉兴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的基本做法、基本经验,推进了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化进程,成为嘉兴服务体系建设和提高综合服务效能、规范内部管理的有力保障,同时为全国提供一个可借鉴和复制的示范样本,将嘉兴的经验推广到全国。

2.2 以数字图书馆共建共享为重点的图书馆联盟建设

在公共图书馆系统内的“中心馆-总分馆”建设日渐步入正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嘉兴开始探索以数字图书馆共建共享为重点的图书馆联盟建设。在政府主导的推动下,由嘉兴市图书馆牵头,联合嘉兴地区各个行业的图书馆组成联盟,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党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该联盟以统一的服务平台面向地区所有用户提供服务,以综合性、跨系统、全民共享的数字文献保障服务为特色,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打破地域限

制,整合嘉兴地区现有资源,以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电视图书馆等多种服务渠道,构建符合嘉兴读者需求和本地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文献保障和服务体系。

2010年12月,嘉兴数字图书馆开通标志着嘉兴地区以公共图书馆、科技、教育等行业系统图书馆或单位联合加盟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图书馆联盟初步形成,打破了地域与专业的限制,为全市读者提供一站式的资源检索与文献服务平台。嘉兴数字图书馆采用合作共建的办法,以单体馆最少的投入获得整体最大的数字文献共享。具体做法是:①嘉兴市图书馆负责数字图书馆技术平台建设,整合国家、省提供的资源,建立一站式检索,与各县(市)馆专线连接;②外购数字文献,由各馆、各系统根据用户数量共同投入、集体采购;高等院校图书馆可补充提供文献互借和传递;③各参与馆分布式建设特色文献数据库,先后建设了嘉兴名人数据库、血防数据库等32个数据库,全市可共享访问。

目前,嘉兴数字图书馆资源包括:390万种中文图书书目信息,其中150万种可提供全文阅读、下载;1万多种电子期刊、7600万余篇中文期刊可提供原文下载或文献传递;50万部各门类、各学科学习视频、讲座资源;还有国研网、新东方英语学习、贝贝国学等50多个专业数据库,数据资源总量超过90T,每天不断更新海量数据。嘉兴地区市民只要通过登录市民卡号或新居民号,可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访问嘉兴数字图书馆的全部资源,获得文献资源的全文检索、浏览、下载、文献传递等服务。

2012年,嘉兴移动图书馆正式开通,嘉兴数字图书馆服务有了延伸和升级。全市读者只需一张市民卡、新居民卡或借阅证,一个能上网的任何一款手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轻松地获取文献服务。依托超星云服务架构,读者通过手机就可以查找330万种中文图书书目信息、120多万种电子图书、1万多种电子期刊、10万余集学习视频。此外,嘉兴移动图书馆还具有个性化互动的服务,通过与嘉兴市图书馆OPAC系统对接,读者就可以在移动端进行馆藏查询、续借、预约、挂失等自助服务,还可以选择还书提醒、新书推荐、预约取书通知等信息交流功能。2017年,嘉兴市图书馆APP正式上线,拥有超过240万种电子书、海量的视频和有声读物,覆盖国内主流报纸以及中外文献元

数据,使读者可以享受到更专业、更便捷的移动阅读服务,随时了解嘉兴市图书馆的各种信息。

2015年,嘉兴网上市民学习中心和嘉兴电视学习中心(电视图书馆)建设完成并提供服务。其中网上市民学习中心作为一个新型开放式网上学习平台,以嘉兴数字图书馆为基础,以嘉兴市图书馆实体馆为依托,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向全体嘉兴市民提供完全免费的各门类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服务。设有图书阅读中心、视频点播中心、MOOC课程中心,实现在线自主选课、学习过程监控、学习参考书推荐、在线答疑、在线作业及考试、管理员课程审核等功能,帮助读者完成自主学习全过程。嘉兴电视学习中心(电视图书馆)则将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通过视频、音频、文字等形式呈现给电视用户。数字电视作为一种最为普及的信息传播工具,与计算机、手机相比,电视机普及率更高、更易于操作,于是基于数字电视网络平台的嘉兴电视图书馆应运而生。目前嘉兴电视图书馆提供最新出版的畅销图书3000多种,5万个小时的视频学习课程、讲座讲坛等,还配有手机阅读平台、云书签,实现电视、手机同步看的功能。

2017年,为支撑嘉兴市创新、创业人才的科研及创业服务,嘉兴市图书馆构建了面向创新、创业人才的产业专题数据库“数字众创空间”。该平台在资源和服务两个方面保障了创新创业人才、创客、科技人员等对于资讯和信息服务的需求。在资源方面,建设了24个产业专题数据库,涉及新能源、食品安全、机械装备、生态环境、农业科技、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行业领域。在服务方面,不仅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创业知识在线学习平台”和“创客在线工作平台”,协助创新、创业人才在线协同工作、协同创新、协同研讨,同时还提供“创客社区”平台,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在线互动与交流,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使群体知识与智慧凝聚成创新成果。

嘉兴数字图书馆、嘉兴移动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APP、嘉兴电视学习中心(电视图书馆)、网上市民学习中心、数字众创空间的建成并开通服务,是嘉兴市图书馆联盟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通过联合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其他系统图书馆的力量,以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为核心,采用现代新媒体技术,突破地域、时间、设备的限制,以各单体馆最小的投入为全市读者提供基于互联网、移动终端和电视媒体的一

站式图书馆数字资源全媒体服务。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任何一台上网的电脑、手机,24小时免费获得各种数字资源和文献服务,享受到无处不在的、个性互动的智慧服务。

2.3 以农家书屋整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资源整合

近年来,为解决城乡居民读书难问题,中央各部委启动了多项政府工程,如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职工书屋工程、党员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等,这些“工程”都以专项资金的方式建设资源,以满足城乡居民的信息需求与阅读需求。嘉兴市在乡镇(街道)分馆和村(社区)分馆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把视野投向了这类社会资源,以“中心馆-总分馆”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依托,把各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提供的资源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层级上整合起来,以图书馆行业的专业化管理和服务方式提升这类资源的社会效用,节约管理成本,同时也改善乡镇(街道)分馆、村(社区)分馆的资源配置,达到双赢的效果。

其中,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整合是嘉兴公共图书馆社会资源整合的重点工作和亮点特色。2015年上半年,嘉兴地区以公共文化示范区创建为契机,依托公共图书馆在文献资源上的优势,集合应用移动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最新信息技术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农家书屋系统进行融合共建,大大提升了农家书屋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双方资源的通借通还和科学管理。具体做法是:

(1) 农家书屋业务管理平台搭建。采用与本地公共图书馆相同的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搭建全市农家书屋管理平台,将各县(市)农家书屋手工登录的图书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图书著录标准》等国家标准统一分编加工,建立书目数据库。通过将各县(市)市民卡作为读者卡全部纳入,建立统一的读者数据库;每个农家书屋点成为一个业务终端。

(2) 打通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两个系统之间隔阂。将“农家书屋”作为一个整体,即相当于一个县(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系统,以“联邦制”的形式整合进入现有全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平台中,形成联合目录,实现图书的通借通还。这样两大系统平台既相对独立,又能实现相互间的数据交换。农家书屋的图书可以通过借阅流转到公共图书馆,同样公共图书馆馆

藏图书也能畅通无阻地流通到各农家书屋,这对农家书屋现有藏书结构的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开发移动客户端APP,将现有计算机平台上的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常用功能移植到智能移动终端(手机)上。政府统一向运营商购买或租用符合技术要求的智能移动终端,实现农家书屋借书、还书、办证等操作的手机处理,大大节约了成本。

社会资源整合的目的是让基层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降低各项“工程”的运行成本,提高各项“工程”的社会效益。以镇(街道)、村(社区)分馆为阵地,一个机构多块牌子,实现公共图书馆系统与各“工程”系统的资源共建共享:①各“工程”涉及到的纸质文献在基层公共图书馆平台进行整合,最终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②各“工程”建设的数字资源在嘉兴数字图书馆中进行整合,通过统一的平台对外服务。至于其他机构若有意愿购置纸本资源,而自身又无采编之专业技能,则可申请成为图书馆流通站,由图书馆按照该机构之需求建置馆藏,对资源进行分类编目,并与公共图书馆系统进行整合,实现统一检索、一卡通行,而该机构需提供建置该流通站的物质保障。

3 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基本特点

3.1 政府主导,整体规划

嘉兴市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主导下推进的。各级政府是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责任主体,在领导机制、推进机制、保障机制、管理机制方面实现全方位主导。嘉兴市图书馆乡镇分馆由市、区及镇三级政府或县(市)、镇两级政府共同设立,作为市、县(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公众的公益性基层分支机构。2008年嘉兴市政府出台了《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就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具体任务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乡镇分馆的布点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同时提出了统一的建设标准。文件出台后,各级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推动实施建设工作。

同时,市政府通过召开现场会、开展工作督查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乡镇分馆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

进。为发挥好市本级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政府牵头建立了嘉兴市本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保障乡镇分馆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另外,为加强乡镇分馆的规范化管理,嘉兴市分管副市长多次就乡镇分馆的建设问题专门召开了市长专题办公会议,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出台了市长专题会议纪要,对乡镇分馆的建设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3.2 多元投入,集中管理

在乡镇分馆的建设与运行上,嘉兴建立了市、区、镇三级投入机制,即全市总分馆体系中的乡镇分馆建设和运营保障由市、区及镇三级政府或县(市)、镇两级政府共同投入,不足部分原则上由镇财政负责解决。这样基本突破了财政“分灶吃饭”的困局。而集中管理则意味着嘉兴任何一个分馆从立项论证到建设规划再到日常运行,全部由总馆统一操作和管理。分馆的资源由总馆统一采购、加工、配送和更新,总分馆共享一个资源体系和同一个自动化管理系统,实行一卡通通行和通借通还。分馆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总馆派遣分馆馆长执行管理职责,由总馆对乡镇分馆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等。

在数字资源的建设与服务方面,嘉兴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具有多元参与的优势。采取了跨市、县公共图书馆合作,跨系统图书馆(中小学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农科院图书馆等)合作,各方分担建设全区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运行经费,以单体馆最少的投入获得整体最大的数字文献共享。参与方一般按购书经费的相同比例加入,共同获得最大量的、最优化的服务。而集中管理指的是由嘉兴市图书馆牵头搭建数字平台,各方协商后由嘉兴市图书馆负责购买各种数据库资源,并解决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以统一的平台向所有读者开放所有资源。

3.3 城乡一体,高度共享

城乡图书馆高度融合。嘉兴图书馆之间“篱笆墙”的打破,让乡镇居民享受到了便捷、免费、均等和优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总分馆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物流系统等,实现区域内资源和服务的优化整合和高度共享。读者在总馆及五县(市)二区和乡镇任意一个图书馆或图书流通站办理联合借阅证——一卡通,就等于拥有了所有图书馆的服务承诺。城乡图书馆之间一卡通通行,图书通借通还,书目统

一检索,传统文献服务与数字信息服务在城乡之间没有任何差异。

文献资源高度共享。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使得乡镇读者可以通过预约、物流、一卡通等方式阅读到嘉兴地区所有的文献资源,通过共享工程访问全国、省级的数字资源,通过馆际互借得到上海、浙江等兄弟馆的文献服务。由于图书产权属于市图书馆,由总馆统一采购和配置,在城乡图书馆之间的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图书还到哪里,系统自动更改馆藏地点,就在当地上架继续流通。通过物流,嘉兴市馆和五县(市)二区公共图书馆数百万册图书资源得到了高度流通与共享。

高水平、广覆盖。嘉兴市乡镇(街道)分馆、村(社区)分馆建设的高标准、高水平 and 全覆盖以及图书流通站、自助图书馆、汽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电视图书馆等投入使用,使得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的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在乡镇(街道)分馆等服务场所,居民可以不花一分钱,自由地进出,享受免费、优质的文献资源服务。更重要的是,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为农村读者提供了与城市读者几乎均等优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如全市流通的图书、不限时空的数字资源、总分馆联动的阅读推广活动等,真正推动以标准化促均等化的目标。

3.4 虚实结合,服务创新

当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正处于传统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实体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共存并逐步向智慧图书馆演化、迈进的阶段。嘉兴的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电视图书馆等虚拟服务很好地补充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突破了实体馆舍在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读者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获得所需信息。而当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都无法满足读者需要时,读者通过超星云图书馆,实现与国内众多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最终通过原文链接和云服务模式,找到、得到所需文献资源。另一方面,嘉兴的智慧图书馆也通过虚实结合、全媒体服务的方式推进城市的智慧化建设。由于人们阅读习惯不会轻易改变,传统纸质书刊仍将是图书馆长期的重要的馆藏和服务手段。嘉兴市图书馆通过对总分馆中书库的智能化改造、RFID技术的运用,使传统图书的借阅插上了智慧化的翅膀。特别是2018年

开始的乡镇分馆与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融合建设,将“智慧书房”建到乡镇,乡镇居民也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24小时享受图书馆服务。此外,汽车图书馆的无线定位智能服务、农家书屋手机借还等,不仅使城乡居民可以就近方便地借阅到所需的纸质书刊,而且能在借阅过程中充分地享受到智慧服务带来的人文关怀。

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和作用只有通过面向广大读者的图书馆服务才能得到体现,为此嘉兴市图书馆不断扩展服务领域,适应公众多样化的需求,创新服务内容,增强图书馆的吸引力。近年来,嘉兴市图书馆建成了“从0开始”的阅读推广体系,形成了如禾禾少儿品牌活动、夕阳红e族老年电脑培训班、帮兄弟回家——新居民信息素养培训、南湖讲坛、快乐读写直通车、好书有约、数字图书馆培训等阅读推广品牌活动,通过总分馆联动,将活动送到市民身边。特别是2017年启动的“图书馆第一课”项目,针对婴幼儿、中小學生及其家长,将图书馆的服务和阅读的理念传播出去,以培养未来读者为切入点,以儿童阅读带动家庭阅读,进而推动社会阅读风气的养成。

4 建设成效

4.1 均等化、标准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覆盖城乡

在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分馆建设的过程中,嘉兴市充分考虑行政区划、服务人口和服务半径,精心选址,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总分馆设施网点布局。目前,嘉兴市、县两级6个公共图书馆均达到部颁一级馆标准,高标准乡镇(街道)分馆全覆盖,92个村(社区)分馆以及842个农家书屋实现了一卡通行、通借通还。此外,在固定网点难以覆盖的地区开展流动图书馆服务,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固定网点和流动服务、移动服务相结合的图书馆服务网络设施。

嘉兴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把现代公共图书馆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引入农村乡镇,显著提升了农村公共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总量,服务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实现了以城带乡、城乡图书馆共同发展的建设目标。对于农民而言,农村图书馆的建设,把免费、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了农民身边,农民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优质的服务,缩小了城乡之间文化供给的差异,推动了社会公平。嘉兴市图书馆乡镇分馆已经成为深受农民喜爱的文化场所,城乡图书馆普遍均等服务基本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

4.2 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从2007年嘉兴开始建设乡镇(街道)分馆开始,嘉兴市的图书馆社会效益显著提升。图书馆的网点全覆盖,纸质资源通借通还,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阅读推广活动总分馆联动,全方位提升了乡镇等基层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从而明显提升了服务效益(见表1)。

在办证量方面,嘉兴市自2007年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来,年均新增办证数超过2万张,有效读者证的数量从2007年的5.3万张增加到2017年的22.3万张,增幅超过320%。

在外借册次和到馆人次方面,从2007年至2017年,嘉兴市图书馆的外借册次和到馆人次都有明显的增加。2007年,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的外借册次仅为66.2万册次,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值达到228.8万册次,是2007年的3.5倍。2017年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到馆读者361.1万人次,是2007年108.4万人次的3.3倍。

自乡镇分馆建设以来,嘉兴市本级平均每个乡镇分馆年到馆人次超过10万,社会效益达到了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平均水平。随着乡镇分馆的升级改造与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融合建设,乡镇分馆的办馆条件越来越好,资源和服务功能几乎是总馆的缩小版。以

表1 嘉兴市图书馆2007—2017年社会效益汇总表

社会效益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新增读者证/张	9 634	19 873	17 127	16 053	19 119	20 132	21 125	29 486	25 093	28 186	21 641
有效读者证/张	53 274	53 422	53 812	58 084	74 015	99 143	150 125	159 251	181 491	206 376	223 114
外借册次/万册次	66.2	100.9	110.5	126.2	128.6	139.1	146.0	202.7	214.2	227.5	228.8
到馆人次/万人次	108.4	157.2	188.3	220.5	224.1	254.6	287.6	303.4	322.5	354.4	361.1
数字图书馆读者有效登录/万人次	-	-	-	-	39.7	57.3	66.4	72.0	77.4	91.3	102.9
数据库访问/万次	-	-	-	-	500	584	717	794	847	999	1 151
文献传递/万次	-	-	-	-	18.0	15.3	22.8	35.9	26.2	26.1	20.1

2017年为例,乡镇分馆的到馆读者为156万人次,外借图书68.6万册次,乡镇分馆社会效益占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将近一半,农村蕴藏的巨大的图书需求得到释放和满足。

另外,在数字资源服务方面,嘉兴数字图书馆自2010年12月开通以来,经过7年的数字阅读推广,社会效益增长迅速,数字阅读日渐成为群众喜爱的阅读方式。数字图书馆开通的第2年,读者有效登录39.7万人次,数据库访问500万次,之后这两个数据保持年均15%左右的增速,至2017年,嘉兴数字图书馆的有效登陆读者为102.9万人次,而数据库访问为1 151万次。至于文献传递,2014年嘉兴数字图书馆的文献传递量是一个峰值,为35.9万次,之后随着嘉兴数字图书馆资源日渐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能力加强,文献传递的需求逐渐减少。

4.3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构建以总分馆制为主要特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嘉兴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创新工程,受到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中国图书馆业界普遍认为,嘉兴与苏州、佛山市禅城区模式代表了目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较为成功的探索模式,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发展方向。国内各级领导、业界同仁和重要媒体对此项工作非常关注。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省内各地借鉴嘉兴总分馆体系建设的经验。文化部于2009年4月在嘉兴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200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莅临指导,充分肯定嘉兴的总分馆建设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2011年6月,刘云山同志在乡镇分馆调研时做出高度评价:“你们为全国创造了一种新模

式,为全国做了贡献,嘉兴的文化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2013年,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中获得东部第一、全国总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同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2016年,嘉兴市以全国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验收评审,嘉兴市图书馆服务体系被验收小组专家认为示范区创建中的重要创建亮点,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推广和示范意义。

5 结语

嘉兴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事实证明,这是适合嘉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成功探索。嘉兴模式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总分馆体系建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现行体制下把这些理念变成了操作路径清晰、方法可以复制的现实。

当然,嘉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以人民需求为中心,根据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提供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践行公共文化服务是我们公共图书馆人的使命。在巩固和完善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嘉兴将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向更深更广领域内延伸和拓展,实现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完善“从0开始”的阅读推广体系、改革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等措施,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治理,提升服务的能力,将图书馆打造成市民的学习中心、休闲中心和社区中心,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3).

作者简介:沈红梅(1966—),女,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鲁祎(1981—),男,嘉兴市图书馆副馆长,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2018-05-23

· 浙江经验 ·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探析

孙云倩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0)

摘要: 标准化是推动均等化的重要手段。随着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建设也逐步规范化、更具操作性。通过标准化建设,嘉兴总分馆建设更加规范化,社会效益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均等。文章阐述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以期总结出一条普遍适用的标准化的中心馆—总分馆建设之路,为全国提供一个可借鉴和复制的示范样本。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 G127;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n Central Library & Main-Branch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Jiaxing

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is a principal way to achieve equal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Library & Main-Branch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Jiaxing, standardization on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s gradually normalized and becomes more operational. In virtue of standard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ervice system has rules to go by, while social benefits have been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more importantly, promotes social equal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ethods and effects of standardization on Central Library & Main-Branch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Jiaxing, concluding a feasible and standardized method of library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lso providing a practical way which could be copied and learned countrywide.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entral library & main-branch library service system; standardization

1 背景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嘉兴模式”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制度设计、体系架构和管理方式。目前,总分馆体系在嘉兴地区范围内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的建设目标,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正按照最初的规划进入常规运行阶段。未来,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将是如何完善管理制度,吸引更多社会公众利用图书馆,以及大幅度提升服务效能。这意味着嘉兴总分馆体系的发展面临一个新的临界点。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这为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服务

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和方向。另一方面,嘉兴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已经有近10年的实践,成为国内的代表模式之一。嘉兴需要按照以标准化促均等化的思路,探索出一条普遍适用的标准化建设经验之路,为全国提供一个可供借鉴和复制的示范样本。

事实上,嘉兴在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之初,就意识到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性。十年间市政府、文广新局和图书馆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化方面的文件和实施办法,指导嘉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确保图书馆从场地、设施设备、资源建设到服务提供和管理运行都有统一的标准,推动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的均等化,进一步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的做法

2.1 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强调标准化

嘉兴市于2003年启动城市分馆试点建设,2007年开始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之初即强调标准化制度设计的重要性,通过市政府、文广新局发文以及市长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对服务体系建设作了详细的规划,突破一级政府建设一个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多级政府共同建设一个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创新模式,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意见、规章制度、考核办法等,使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长效性和可复制性。此外,这些文件还对服务体系内部的资源共享和服务提供作了具体的规范和可量化的考核标准,使各分馆的服务逐渐规范化、标准化。在管理制度方面,嘉兴市已经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形成多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总馆下派分馆馆长、分馆工作人员培训、例会、分馆考核、线上实时交流反馈等制度,确保服务体系运作顺畅。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服务体系建设与标准化工作相辅相成,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形成了成功的经验,经验的固化有助于标准的形成,而标准化工作又可以规范日常业务工作,提高服务效率。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件有嘉兴地区六个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分别印发的《关于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嘉兴市文广新局印发的《嘉兴市图书馆乡镇分馆管理暂行办法》《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考核办法》、制定出台的《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以及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管理规范》。这些文件把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制度、政策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标准条款,有助于完善服务体系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也为嘉兴地方标准向省级标准、国家标准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为其他地区复制嘉兴经验提供了依据。

2.2 政府成为标准化建设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建设,就是由政府主导发展的,市政府、区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共同构建中心馆—总分馆的支撑保障体系。各级政府制定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发展规划和配套措施,将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并纳入政府议事议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体系。由于嘉兴市政府是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模式的主导者,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服务体系的发展和改革,所以服务体系的标准化进程也得益于嘉兴市政府的支持和推动。2015年6月,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嘉兴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年)^[1],列出4大类29项56条基本服务项目和标准,在《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项目,并明确各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和水平,使国家指导标准所规定的内容和种类实现了指标化、具体化。该标准为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图书馆的标准化工作建立在政府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嘉兴市文广新局制定出台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2]和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管理规范》^[3],作为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文化主管部门和标准化主管机构的支持和推动下,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提炼了嘉兴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的基本做法、基本经验,推进了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化进程,成为嘉兴服务体系提高综合服务效能、规范内部管理的有力保障。

2.3 科学确定标准的框架体系和主要内容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建设强调顶层设计,搭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化框架体系。由于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公共图书馆设施或者机构,因此标准化关注的重点不是单体图书馆的运行、管理和服务,而是与整个服务体系密切相关的内容。所以“嘉兴模式”标准化建设的框架是建立在整个服务体系的建设、运行和服务上的。以《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为例,此标准涉及到的所有内容都是针对服务体系设计的,而不是单体图书馆,其框架结构为:①建设原则和目标;②架构与功能;③设施建设标准;④资源建设与服务提供标

准；⑤运行管理标准；⑥服务效能标准；⑦保障条件标准。

在标准的具体内容中，将“嘉兴模式”最主要的经验提炼出来。首先，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责任主体。“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被概括为嘉兴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突出特色。建立服务体系的标准，就应该将政府这一责任主体纳入其中，并详细阐明政府在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职责。其次，明确了中心馆与总馆的主要功能，界定中心馆与总馆在服务体系中所承担的不同功能。中心馆将那些以县域为单元的总分馆体系连结起来，目的是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超越总分馆体系、打破分灶财政形成的行政管理壁垒。再次，明确了标准的量化指标和基本制度，其中量化指标包括设施建设指标、资源配置指标和服务效能指标，以考核指标的形式指明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而基本制度则包括中心馆—总分馆运行管理制度和人员经费保障制度。

2.4 逐步推进，提高标准建设的高度和适用范围

标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化之路也经历了馆内制度、文广新局文件、市长专题会议纪要、市政府文件、市质监局标准的过程，同时也顺利地由市本级复制到五县两区。每一次标准化的发展都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条款有所改动，使标准更加符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引领嘉兴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目前，嘉兴市图书馆正在积极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系，申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省级标准项目，根据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情况，以嘉兴建设服务体系的经验为蓝本，设计一套适用性广、操作性强、成效明显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标准，不断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加强标准的可复制性和操作性，将嘉兴的经验介绍到全省乃至全国，为国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3 成效

3.1 总分馆建设更加规范化

嘉兴市一系列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出台，对场馆选址、设施设备、资源建设、服务提

供和管理运行等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使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有据可依，形成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的长效机制。更重要的是，标准化将“嘉兴模式”进行固化，使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行政约束力。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嘉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的统一，确立了总分馆体系实行联席会议制度下的总馆馆长负责制，赋予总馆集中管理乡镇图书馆人、财、物的权力，使总馆具有了管理乡镇图书馆的合法性。基于此，总馆可以用专业的行业力量介入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指导乡镇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对乡镇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对乡镇的具体工作和社会效益进行量化考核，使乡镇图书馆的运作更加规范化，进而保证读者获得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真正解决公共图书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推动嘉兴地区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

3.2 社会效益提升

社会效益是衡量图书馆工作最直接的指标。通过制定各种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的标准，嘉兴的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嘉兴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主要指标为例，人均藏书1.66册（示范区创建指标为1册，完成率166%），人均年增新书0.13册（示范区创建指标为0.04册，完成率325%），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率1.12次（示范区创建指标为1次，完成率112%），市、县两级图书馆人均年到馆次数2.43次（示范区创建指标为0.5次，完成率486%），全部超额完成示范区的指标要求，而且嘉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也被评审专家认为是示范区创建中的重要创新亮点。此外，在2016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阅读报告中，嘉兴地区22.6万人借阅各类文献（含图书、期刊、多媒体等）1 149.2万册（件），约占全省借阅量的23.7%，其中人均借阅图书1.75册，嘉兴地区的总借阅和人均借阅量均列全省各地前列。

3.3 促进了社会公平与城乡资源均等

总分馆体制的本质就是把单个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联结起来，形成一个设施群、一个组织体系，在体系内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上下联动，从而解决基层资源和服务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均衡发展。而嘉兴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目的就是将农村图书馆纳入整

（下转第60页）

· 浙江经验 ·

双创背景下嘉兴市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建设

沈红梅 王娟娟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0)

摘要: 文章介绍了嘉兴市图书馆数字众创空间的建设背景,详述了建设数字众创空间的便利性、实用性、易用性、互补性以及特色化原则。基于嘉兴双创人员的信息、服务需求以及嘉兴产业结构,数字众创空间设置了24个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创业课程中心、创客协创空间以及专家咨询功能等。另外,嘉兴市图书馆将其提供的线下各类信息服务嵌入到数字众创空间平台,方便双创人员获取文献资源与服务。

关键词: 数字众创空间; 创业创新; 建设原则; 模块设计; 科技信息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0.76;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aker Space" of Jiaxing Lib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Innov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f digital maker space in Jiaxing Library, and expounds the convenience, practicability, ease of use, complementarity and characteristic principle of building digital maker spac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need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Jiaxing Shuangchuang, 24 industry thematic digital libraries,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centers, customer collaboration space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functions have been set up. In addition, Jiaxing Library embeds all kinds of offlin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to the digital maker space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access to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Key words digital maker space; start-ups and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module design; sci-tech information services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点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巨大热情。之后,“双创”被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嘉兴市出台了《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促进了众创空间的规范化发展。目前嘉兴市共有44家众创空间,其中国家级众创空间10家,省级众创空间7家。众创空间场地面积已达69.7万平方米,创业团队共有917个,从业人数为4 253名。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过程中,双创人员在信息资源、信息服务、创业经验等方面具有很大需求。自嘉兴市科技情报所改制以来,科技信息服务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双创人员不得不求助于上海、杭州等毗邻地区的科技情报服务,这些为双创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

作为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纸质与数字资源,长期为社会大众提供参考咨询、文献传递、图书借阅等各种服务。基于自身的使命感和资源优势,2016年起,嘉兴市图书馆与中国知网合作,着手建设一个集专题信息资源、双创人员自助交流平台与科技信息服务于一体的数字众创空间平台,服务嘉兴创业创新人员,助力嘉兴市众创空间的发展。

1 数字众创空间的建設原则

数字众创空间的建設是一个系统工程。数字众创空间项目组通过资料搜集、发放问卷、访谈、问询

等方式调研了嘉兴多家众创空间、科研院所、企业。通过调研分析,针对双创人员在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资源与服务问题,数字众创空间项目组确定了平台建设的基本原则。

1.1 便利性原则

一站式集成各类资源与咨询。双创人员在海量资源中难以找到对口的资源,或者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找到需要的资源。平台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便利性原则,将双创人员的信息资源需求、专家辅导与咨询需求、创业知识学习需求一站式集成起来,最大限度地方便双创人员资源与咨询需求,使创业创新新手能够迅速成长,使资深创业创新人员能迅速找到对口资源。

1.2 实用性原则

面向创业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建设数字众创空间,并非为了建而建,而是为了解决双创人员的实际问题,如查找不到对口资源,寻求科技信息服务太费时费力,出差办公无法和创业小组、创新项目组成员进行跨时空的顺畅交流,等等。市面上各种数据库种类繁多,真正按照双创人员的特点和需求设计的并不多见。平台建设应面向问题设计,与双创人员的需求相符,能够真正解决双创人员在创业创新过程中的信息资源与创业流程学习等实际问题,避免假大空,遵循实用性原则。

1.3 易用性原则

操作简便,外行也容易上手。好的平台不仅资源丰富、够专业,同时在使用上也不能太难以操作。大多数资源的使用者并非图书情报专业出身,也并未进行过数据库检索与使用的专业训练。因此,针对双创人员,检索设置上要尽可能简便,最好能够做到不需要检索就能一站式获得所需资源与课程。在数字众创空间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易用性原则,希望做到不管是领域/行业专家,还是刚入门的创业创新者,都能很容易地找到所需资源。

1.4 互补性原则

与已有资源与服务相互补充。嘉兴市图书馆从2010年建设数字图书馆至今,已积累了海量数字资源,拥有大大小小的数据库50余个。在建设数字众创空间的过程中,我们本着互补性原则,在原有已购买的中国知网等数字资源基础上,新增24个产业专题数字资源。在服务上,嘉兴市图书馆原有的参考咨询服

务、文献传递服务、馆际互借服务等仍保留,在这基础上新增了科技查新、引文检索、科技翻译、专利服务等服务项目,与原有服务形成了有效的互补。

1.5 特色化原则

与本地产业对接、符合本地产业需求。嘉兴地区纺织、印染等产业具有本地特色,还有一些新兴的产业,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也异军突起。在建设数字众创空间数字资源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与嘉兴本地产业相关的24个产业专题资源,突出了当地特色,秉承了特色化建设原则。

2 数字众创空间的模块设计与建设

2.1 数字众创空间的模块设计

通过对嘉兴的产业结构、双创人员的信息需求、服务难点的了解,并遵循建设原则,项目组对数字众创空间进行了定位,确定了产品框架,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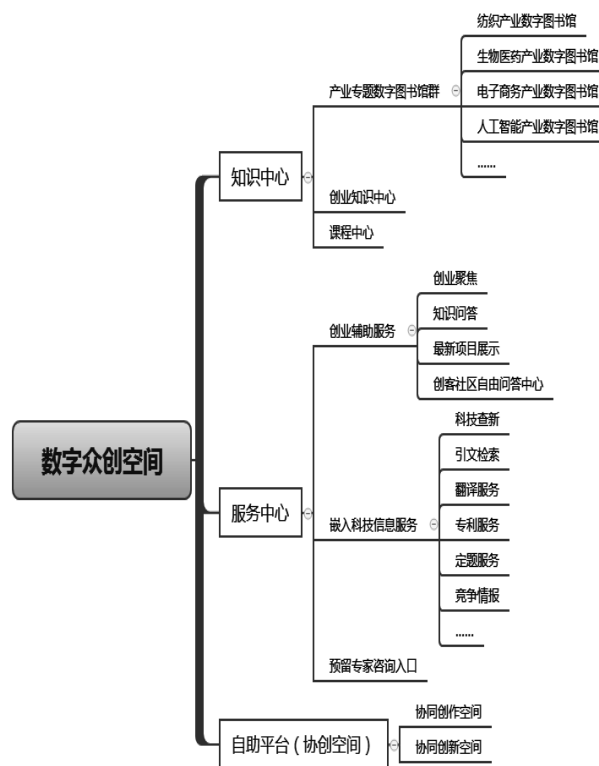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众创空间的模块设计方案

数字众创空间的定位是为双创人员提供知识中心;组织创业团队,申请协创空间;研讨创业计划,汇聚隐性知识;交流创业问题,在线专家指导;转化创业成果,分享创业经验;提供科技情报服务,打造面向大众的双创智库。

2.2 数字众创空间的建设

数字众创空间设置了知识服务中心、创客协创空间、众创训练营、项目众筹系统、创业支持模块、平台管理系统。经过不断的调整,数字众创空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中心与服务体系。另外,为了使平台能够持续、良性发展,项目组建立了各项配套制度,包括平台管理制度、平台宣传制度、用户咨询制度等,保证了数字众创空间平台的正常运行。在建成的数字众创空间中,资源和服务互为补充,二者不可或缺。创业创新不仅需要线上的信息产品,也需要软性服务^[1]。

2.2.1 建设精准化知识服务中心

(1) 建设了24个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

根据嘉兴成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构,“数字众创空间”平台最终甄选了新能源、工艺制品、食品安全、机械制造、生态环境、印染、纺织、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建设了24个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在嘉兴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增加了文献类型和文献数量。每个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设置文献检索、政府动态、产业动态、产业热点、市场情报、文献标准、专利、科研信息等,模块的设置根据产业的不同进行微调。例如,对于嘉兴成熟的纺织产业,我们设置了行业标准、要言要论、企业动态、产业规划、行业报告、贸易政策、国际纺织动态等内容,而海洋产业数字图书馆中,则设置了船舶与海洋运输、海洋环境与灾害、海洋资源等不同于纺织产业的内容模块。根据每个产业的不同特点,在模块设置上有所侧重。数字众创空间平台上的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和与产业相关的文献资源聚类,一站式满足不同行业人员的文献资源需求。

(2) 设置创业知识中心与课程中心

创业知识中心,包含创业资讯库、政策法规库、创业知识库、创业人物库、科技项目创新成果库。创业资讯库为创客提供实时更新的创业行业要闻、创业热点话题、各地创业动态、创业基地要闻、最新创业活动等,使双创人员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政策法规库为创客提供相关的法律支持,包括创业法律、创业政策法规、中央地方创业政策、税收政策、资金补贴政策、担保贷款政策等;创业知识库为创业者提供整个创业流程的文献支撑,包括准备创业、组建团队、产品开发、运营推广、创业融资、经营公司等流程;创业人物库集合了关于创业热点人物的文献资源,每一个热点创业

人物对应一个创业人物文献专题,如马化腾专题文献、柳传志专题文献、李彦宏专题文献,等等。除了热点创业人物文献专题,创业人物库还按行业对创业人物进行划分,提供创业经验、创业语录、创业故事、创业点评等内容,对计划创业的人员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科技项目创新成果库跟踪国内各类创业项目,让创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创业项目的信息动态。

另外,数字众创空间还设置了创业课程中心,包含大量创业相关的视频,分为创业入门、团队组建、产品开发、创业营销、创业融资、创业法务等细分模块,对创客在整个创业流程中进行创业训练。课程中心整合大量创业创新课程,为创客的创业创新工作提供更加便捷化、可视化、专业化的指导。

2.2.2 设置创客协创空间

创客协创空间包括协同创新与协同创作,是面向双创人员的自助协创平台,是数字众创空间服务的亮点,助力创业创新人员实现协同效益的最大化。用户可申请协创账号,登录后进行线上协同研讨、协同创作文档。双创人员可通过协创空间对创业创新全过程进行管理,实现对创业创新小组的分工,从协同研究到协同创作,实现对每个阶段的实时自动记录,并形成过程记录文档,有效管理创业创新小组。同时,也如实记录和反映了创业创新团队中每个人的创新贡献、活跃度及其隐性知识。

协创平台使创客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业创新小组成员可异地协同研讨,随时随地针对创业创新项目进行交流、讨论。创客可以基于大量的知网文献,针对某一创业问题深入地讨论,全过程记录成员意见及评论。协同创作平台支持创客在线拟稿、分工创作,提供在线编辑和基于创作内容的交流功能。创客团队管理者拟定目录,进行创作任务分工并确定最终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如研究报告、论文、专利等);小组成员根据分工,各自完成被分配的创作任务。创客团队针对组员协同完成的创作初稿进行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并通过迭代修改来完善创作成果,形成最终稿。创客还可以进入个人管理中心进行创客空间管理,进行待办任务查看、消息查看、编辑记事本、新建思维导图、观看在线直播、查看我的研究、订阅主题文献、添加知识图谱等。

2.2.3 设立创业辅助模块

(1) 设置创业聚焦与知识问答中心

创业聚焦模块,是在国内权威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行业期刊等媒介上抓取并推送最新的创业信息、行业新闻、区域内最新创业政策等。知识问答中心模块,抓取了国内相关部门负责人、业内资深创投大咖关于创业创新政策、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系列问题的问答,如创业创新财税政策问答、创业就业税收政策答记者问、专技人员创新创业答记者问、创业投资基金问答、创投大咖答创业者的45问等,来源文献多为报纸、期刊等。创业聚焦与知识问答中心为创客提供资讯、政策参考,为双创人员创业创新提供一站式的新闻资讯服务,从而更好地提高创业创新效率。

(2) 设置创客社区

创业社区是一个创业问答与交流平台,素不相识的创客可以在此平台上就创业创新中遇到的问题或自身的疑问进行提问、回答,创客可以在创客社区提出问题,也可以对其他创客在创客社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以此,促进了创客之间的互动,使其针对某一行业、领域内的创业话题,进行经验的分享与借鉴。

(3) 设置最新项目模块

在数字众创空间上,已申请协创空间账号的创业创新小组利用协同创新与协同创作空间可进行项目的讨论与研发。最新完成的可公开项目或课题展示在数字众创空间的最新项目模块,以被查看。这种方式增加了已完成的最新项目的“曝光率”。对项目或课题感兴趣的企业或个人,可以点击最新项目查看项目或课题简介、课题负责人等信息,进而考虑是否合作,提高了项目转化的几率。

2.2.4 预留专家咨询功能

数字众创空间预留了专家咨询功能,双创人员可根据自身需要邀请专家进入同一协同研讨、协同创作小组,针对某一问题或专题进行专家(或资深创业大咖)咨询与辅导,及时吸纳专家建议。

专家咨询能够帮助双创人员快速地解决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创业创新效率,增加创业成功率。双创人员还可以通过创建直播与专家建立联系,实时获得专家的专属指导。图书馆也可以利用直播功能,邀请专家或创业大咖针对某一创业创新问题进行直播解答、提供专业的创业指导与培训。

2.2.5 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入口

为使双创人员在创业、创新、成果转化、专利申

请等过程中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嘉兴市图书馆根据自身业务范围,将其所提供的参考咨询、科技查新、引文检索、翻译等服务嵌入到数字众创空间平台,为双创人员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入口,为创客创业创新提供支持。

3 完善配套的线下服务体系

线上的数字众创空间建成之后,嘉兴市图书馆在原有信息服务基础上特别增加了多项新的服务,不断完善面向双创人员的服务体系,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培训、参考咨询等。

3.1 科技信息服务

嘉兴市图书馆面向企业、创客空间、科技园、科研单位等机构用户提供科技查新、定题服务、引文检索、专利服务、竞争情报、科技翻译等科技信息服务。为了使创客能够方便、及时地获取上述服务,嘉兴市图书馆将各项服务的详情与联系方式以网页的形式放在数字众创空间的创业支持模块,便于创客获取相应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科技情报服务收费方面,嘉兴市图书馆面向创客免费或优惠。涉及收费的服务项目,费用多由嘉兴市图书馆承担,将方便与高效留给创客。

3.2 资源与服务使用培训

为了使数字众创空间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作人员不仅开展线上数字资源与服务培训,还走访企业、创客空间、科研单位,开展线下“数字众创空间”使用培训,目前已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嘉兴颐高广场楼友会众创空间等场所开展了数场数字众创空间与科技情报服务专场培训,为创业创新人员介绍了产业专题图书馆、创客协创空间、创业知识中心与课程中心,以及其他数字资源、科技信息服务等内容。

3.3 参考咨询服务

创客在利用数字众创空间以及其他数字资源与信息服务时会遇到种种问题。嘉兴市图书馆设立了参考咨询服务,设专人负责创客的咨询问题,并及时予以回复、解答。用户可进行微信咨询、QQ咨询、电话咨询、邮件咨询、现场咨询,向参考咨询馆员了解数字众创空间的功能、资源情况、协创空间账号申请、科技情报服务等问题。

4 社会效益

4.1 基本满足了双创人员创业创新文献需求

双创人员可以通过自助方式在数字众创空间平台上获取海量资源,同时也可以通过图书馆服务人员获取相关的中外文文献。自2017年5月5日数字众创空间平台正式启用以来,读者可使用嘉兴市图书馆借书证、嘉兴市民卡(已开通借阅功能)登录嘉兴数字图书馆,在首页点击“数字众创空间”进入该平台使用各类信息资源。项目组统计了2017年5—12月的后台数据,其中,产业专题数字图书馆等文献资源模块检索次数为232 673次,下载篇数为25 871篇,访问量为317 140次;平台视频总数量为9 024个,视频点击总量为39 652次。数字众创空间的产业专题图书馆及课程中心等文献和视频资源大大满足了双创人员在创业创新过程中的文献需求,降低了双创人员检索与获取文献的成本。

4.2 缓解了双创人员异地协同工作的难题

不同研究领域的创业创新人员都可以申请创客协创空间的账号,为创业团队提供在线研讨环境。截至目前,一些双创人员陆续向数字众创空间后台管理员申请了协创空间账号,获得了使用数字众创空间协同创新与协同创作功能的权限。

利用协创空间账号登录协同创新或协同创作平台后,创业创新小组成员之间可以实现异地研讨交流、协同写作,缓解了双创人员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段需要交流的困境,促进了双创人员思维的碰撞以及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汇聚,满足了他们异地协同工作与研讨的需求。

4.3 弥补了大部分双创人员创业创新过程中的经验缺口

数字众创空间提供各类创业课程、科研项目创

新成果库、创客经验交流空间、创业聚焦、创客知识问答中心等,使双创人员可以借鉴创业创新经验,少走弯路,大大提高创业创新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双创人员的创业创新经验。

4.4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创人员对专家咨询与辅导的需求

专家的建议与辅导是宝贵的财富,尤其针对刚入门的创业新手以及亟需专家在某一问题、某一项目上予以指导、斧正的创业创新人员。数字众创空间提供了专家咨询的良好平台,双创人员在协同创新、协同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将专家纳入小组的方式,或者通过创建直播的方式,建立与领域专家的联系与沟通。这一功能极大满足了双创人员专家咨询与辅导的需求,方便其及时吸纳专家的智慧。

4.5 大力支撑了双创人员的信息需求

数字众创空间建成后,图书馆以此为基础,为创客提供了定题服务、科技查新、翻译、专利查询等服务。短短几个月,就收到了来自企业、研究院和高校的很多科技信息服务需求。目前,嘉兴市图书馆已联合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先后完成了30余项科技查新、科技翻译、专利查询服务,得到了创业创新人员的认可,大力支撑了创客的信息需求。

5 结语

数字众创空间在“双创”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效满足了大量双创人员的产业专题文献需求,也极大方便了他们汲取创业知识、寻求专家指导,同时还促进了群体智慧的结晶,使创业小组、项目组成员实现不受时空限制的线上协同研讨与协同创作,极大节省了双创人员获取文献、寻求信息服务的成本。

参考文献:

[1] 王节祥,田丰,盛亚.众创空间平台定位及其发展策略演进逻辑研究:以阿里百川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1):1-6.

作者简介:沈红梅(1966—),女,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王娟娟(1986—),女,嘉兴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用户研究与信息服务。

收稿日期:2018-05-21

· 浙江经验 ·

魏塘模式：镇级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的新出路

黄旭东

(嘉善县图书馆 浙江嘉善 314100)

摘要：为努力实现由政府“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积极探索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方式，浙江省嘉善县结合魏塘街道文化中心新建契机，以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化建设为载体，以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项目资助为途径，把魏塘街道文化中心作为镇级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试点，打造了极具推广价值的“魏塘模式”。文章介绍了“魏塘模式”的具体运行程序、管理模式、运行成效，并对该模式的推广价值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镇级文化中心；图书分馆建设；社会化运作；政府购买服务；魏塘模式

中图分类号：G258.23

文献标识码：A

Weitang Mode: A New Way to Socialized Operation of Town Level Cultural Centers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crea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to government managing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social operation mode of cultural centers actively, Jiashan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building a cultural center for Weitang Street, tries to created a "Weitang mode" with great value to popularize. The count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s the carrier, and takes 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 entrustmen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support as methods, and set the cultural center of Weitang Street as a pilot project of socialization operation of town cultural center.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dures, management mode,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mode. It also discusses the promotion value of Weitang Mode.

Key words town culture center; branch library building; socialized operation; 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 Weitang mode

1 引言

魏塘街道属于嘉兴市嘉善县城关镇，由于城区已经拥有了县图书馆等县级文化设施，为辐射更多的农村群众，最终将文化中心选址定在位于街道北侧的中心村——魏中村。该村集聚本地居民5 000余人以及新居民50 000余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强烈。新建的魏塘街道文化中心建筑面积2 723.2平方米，广场面积为2 300平方米。文化中心建设初期，街道就面临“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因为根据文化中心的体量，至少需要8位以上的工作人员，每年

的人员经费就需要25万多元。如何克服文化中心运作供给不足、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的问题成为魏塘街道文化中心面临的首要问题。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图书分馆建设的实践模式的建立，提高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效益，嘉善县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善委办〔2012〕37号）文件和《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试行办法的通知》（善政办发〔2014〕107号）文件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方式，结合魏塘街道文化中心新建契机，以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化建设为载体，以政府购买服务、

委托管理、项目资助为途径,把魏塘街道文化中心作为镇级文化中心社会化运作试点,努力使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2 魏塘模式: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新出路

本着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把文化中心建成百姓欢迎、市场叫好的活动中心的宗旨,嘉善县文化局和魏塘街道进行了前期调查和市场考察。一是统一思想。改变过去镇(街道)级文化中心“等(等群众上门)、靠(靠上级政府给政策、给资金)、要(要钱办活动)”的思想,充分发挥魏塘街道的各项优势,走出一条公共文化工作的新路子,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图书分馆建设的实践模式。二是博采众长。采取了“向东看”和“向西学”的策略:“向东看”,即向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标杆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取经;“向西学”,即向鄞州区横溪镇、邱隘镇借鉴先进经验。三是消化落地。在认真学习分析两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比,经过再三论证,确定了魏塘街道综合文化站的发展模式、图书分馆公共服务业务的管理权对外整体外包的实践模式,并以部分免费和部分公益性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所收费用全部用于维持街道文化中心正常运作的必要开支。四是经费保障。人员、水电等经费由街道财政来保障。

“魏塘模式”的具体运行程序如下:

2.1 订立合约

由于在引入民办非企业组织经营管理镇、村文化中心方面尚处于摸索阶段,魏塘街道经过多方比较,决定与魏塘众悦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众悦”)签订试运行合约,并将文化中心的规范化运行写入合约。至此,魏塘街道文化中心开始尝试以部分免费和部分公益性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所收费用全部用于维持中心正常运作的必要开支;而人员经费则由街道财政保障。经过3个月的试运行,魏塘街道于2014年9月与“众悦”签订《关于魏塘文化活动中心委托管理服务的合约》(以下简称《服务合约》)。

2.2 约定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责权

《服务合约》明确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的职责

和权益。

(1) 政府职责。政府承担文化活动中心年度人员、大型项目等支出。按照10个额定人工计算,每年向“众悦”拨付30万元的人员经费,其中24万元为基本报酬,按季度拨付;6万元为考核报酬,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年终一次性拨付。

(2) “众悦”职责。坚持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服务的公益性原则,按照中心服务标准,不断满足基层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全面负责魏塘文化活动中心的日常运作管理,包括人员管理、环境秩序管理、安全管理和资产管理,年完成中大型公益活动项目48个,活动达到150场次(不包括电影放映),服务达到18万人次。

(3) 激励机制。完成《服务合约》规定标准的,年终由政府财政奖励中心负责人1万元;超过或者不足的,按照2 000元/万人次的标准同比例追加或者扣除。

根据《服务合约》规定的职责和激励机制,“众悦”在实际操作中体现出了市场化运作的优势:一是延长服务时间,服务时间是每天9:00—20:30,每周周一休整,全年无其他节假日,每天开放时间长达11小时,每周开放达到66小时。二是压缩服务人员,在保证完成《服务合约》任务的基础上,“众悦”的主任尽可能地压缩人员成本。签订合同,整体外包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使得合作双方分工明确。适度的培育和引导,使“众悦”明确了服务项目和服务目的,有效激发了“众悦”工作人员的服务积极性,同时也规范了“众悦”的服务。

2.3 转变管理模式

2.3.1 实行理事会运作

“众悦”内部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根据文化中心的功能与服务项目,进行了管理与服务岗位的梳理,制订了详细的职位说明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相应的待遇,为科学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奠定了基础条件。之后,又不断完善岗位责任制的考核与绩效评估奖惩办法,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良好竞争上岗机制,确保了服务质量的提高。

2.3.2 拓展服务内容

“众悦”通过各级项目配送以及中心项目策划“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努力拓展服务内容,吸引更多的群众走进文化中心,享受图书分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1) 各级项目配送。努力争取各级文化服务项目的配送,有效提高图书分馆的借阅量、到馆人次等指标值。县级宣传文化部门分别将全国“微散文”大赛颁奖典礼、全县电视歌手大赛等项目派送到街道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还组织了连续8周的“蓝海木业杯”魏塘好声音和连续7周的魏塘全民排舞赛放到文化中心举办。市、县、街道组织不同类型的配送培训,不仅提高了人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也为中心的图书分馆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2) 中心项目策划。在接受各级配送的同时,“众悦”的人员各尽所能,积极策划各类公益活动项目,如“众悦”杯桌球赛、“你寻我放”读者趣味活动、征文比赛、讲故事比赛、巧手吧、公益培训汇报演出、电影天天放等。每周“众悦”都会推出琳琅满目的“文化菜单”,力争用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满足不同读者人群对文化活动的多元需求。

(3) 推出“文化积分银行”制度。立足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的理念,“众悦”推出了旨在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文化积分银行”制度。即把个人参与街道组织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的次数兑换成积分,再由积分兑换魏塘文化中心或街道文化站提供的免费文体活动服务。目前,针对魏塘文化中心的普通会员、魏塘街道的文化志愿者和艺术团队的骨干成员有3种积分奖励方案。对于办理了会员卡的魏塘文化中心的普通会员,凭积分可享受到免费的文化服务。对于非会员的其他文化志愿者,根据积分的多少,可以半价享受到中心提供的各类文化服务。对于魏塘艺术团队的骨干成员,凭积分多少可以得到街道文化站从开华集团赞助资金中拨付的数额不等的补助经费,用于团队内开展日常训练等活动。“文化积分银行”制度目前还在试运行,积分设置和兑换的比例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和比例,在此基础上提高图书分馆广大读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读者个人的文化素养。

3 运行成效

“魏塘模式”是在读者需求的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图书分馆建设的公共服务和合同外包的模式,其实践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3.1 公共服务公益性增强,分馆的社会效益得到提升

为了确保嘉善县魏塘街道文化中心图书分馆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功能,社会化运作方式对街道图书分馆等的各类服务、培训和送文化活动进行指标管理。目前,“众悦”已逐渐成长为完全能够独立策划、组织各种活动项目的文化服务机构,在试运行的6个月时间里,文化中心共接待群众11.6万人次,其中图书分馆接待了9.3万人次。据统计,自2014年5月23日开业至2016年12月31日止,已接待活动人数超过40.2万人次,图书分馆人数超过31.8万人次,外借图书25.1万册次。2017年,接待活动人数达28.1万人次,图书分馆人数超过16.5万人次,外借图书9.3万册次。通过举办“汉字听写”“书海拾贝”“我的一本课外书演讲活动”及讲座展览手工亲子活动等一系列活动,使得图书分馆的到馆人次逐年稳定增长,逐渐成为广大读者生活的乐园、学习的校园、文明的家园。

3.2 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分馆读者受益显著

2014年街道文化中心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举办了街道文化品牌多项活动,开展了“一村一品”的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培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半年时间里,共承办和举办活动272场次,其中文艺演出29场次、体育活动8场次、电影放映209场次、培训20项、展览3次,形成了周三大舞台、周末戏曲苑、公益电影天天放3大中心群文品牌。

3.3 公共文体活动供给丰富,满足了分馆读者需求

一是“惠民卡”的发放和对周边新居民推出半价卡消费的服务方式,让群众每次只要花费2.5元就可以打半天的乒乓球和桌球;只要花费1.5元就可以在中心观看一场演出或者电影。二是文化项目菜单的推出,如开展“众悦”杯桌球赛、乒乓赛、“你寻我放”读者趣味活动、征文比赛、讲故事比赛、巧手吧、公益培训、电影天天放等活动,让不同的群体根据自己的喜好走进中心,参与活动。三是上级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的配送与活动供给,让基层群众享受到层次不同、类别不同的文化套餐。另外,“众悦”与“星艺缘”“上海嘉辰沪剧团”等民间艺术团队的多项合作,也丰富了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4 “魏塘模式”的推广价值

“魏塘模式”这一社会化运行模式是从“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魏塘实践”中走出来的,公共图书分馆从单向获取图书资源配送的长效机制带来的显著变化,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积极运作(如“文化积分银行”等项目菜单的推出),并在人民群众阅读需求满足的基础上达成更广泛的供需对接服务。《浙江文化月刊》2015年第4期《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辣妈宝贝”显品牌效应》文中对“魏塘模式”作了精准的介绍。《中国文化报》(2015年6月17日头版)也曾两次介绍“魏塘模式”:《浙江嘉兴持续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每一次提速都为了前方更美的风景》一文中大篇幅提到中心引进社会化管理的做法;《中国文化报》(2015年7月22日第五版)刊登的《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嘉兴十大创新加速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进程》一文中又再次提起此做法。各类媒体对“魏塘模式”的宣传起到了突出作用,截至目前,已有省内外近40多批次的领导和专家前来调研。

4.1 能提高图书分馆服务管理水平与社会效益

以往镇级文化中心是等群众上门,靠上级政府给政策、给资金,要钱办活动。通过社会化运作方式,我们可以及时督查工作指标完成情况,做到图书分馆公共文化的有效管理与社会效益提高。街道文化中心助力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活动,让文化中心图书分馆周边的读者逐步从以往被动式地接受政府“大包大揽”派送的免费公共文化转变为现在的主动式地享受民办非企组织提供的“项目菜单式”的文化活动,证明了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整体外包这一运作方式的可行性。

4.2 使图书分馆管理监督机制阳光操作、民主运行

魏塘街道文化中心图书分馆的社会化运作使镇级文化中心阳光操作、民主运行跨出了一大步。“众悦”的管理委员会,由街道文化站、魏中村党委书记、文化中心员工、魏中村村民代表、党代表和人大代表7人组成的理事会和由街道纪委、财政所、村党代表3方组成的监事会共同构成,使图书分馆管理监督机制阳光操作,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透明公开的图书分馆公共文化服务。

4.3 使图书分馆服务管理向市场化延伸

以往我们对街道图书分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实行层级管理,一级抓一级。但由于各图书分馆工作要求不一,导致图书分馆发展不均衡。通过构建社会化运作方式,把可以量化的工作要求指标化,可以激发出图书分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动力,使图书分馆服务更加快捷惠民。这种政府购买图书分馆公共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全新模式,突破了以往发展图书分馆等文化事业单纯由政府投入的资金瓶颈问题,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之一,同时也符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方向。

5 结语

“魏塘模式”既充分满足了街道群众、新居民旺盛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带动了基层图书分馆的工作,又实现了基层读者、民办非企的“众悦”和镇级文化中心三方的互利共赢。公共文化服务外包的“魏塘模式”在实现城乡均等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也推动嘉善县镇级文化活动中图书分馆公共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黄旭东(1964—),男,嘉善县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2018-05-04

· 浙江经验 ·

总分馆制视角下阅读推广人培育的创新实践

——以海宁市图书馆为例

吕佳兰

(海宁市图书馆 浙江海宁 314400)

摘要: 总分馆制实现阵地硬件标准化建设,随着全民阅读推广深入,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激活阵地,实现城乡阅读推广服务的同标准、同质量。文章阐述了海宁市图书馆依托总分馆制开展的阅读推广人培育工作的实践和创新,探索区域化阅读推广人培育管理和资源共享等机制,为促进总分馆阅读推广人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阅读推广人;总分馆制;项目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 G127;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ading Promoters' Innovative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Taking Hain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While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achieving the hardwar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ies and nationwide reading campaign developing, a wide rang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needed to activate the libraries to pursue reading extension services of the same standards and quality. By discussing the training of reading promoters in Haining Library relied on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regionalization reading promoters' cultivation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tri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improve the work of reading promoters in main-branch libraries.

Key words reading promoters;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project management

图书馆是公民持续阅读的保障,是社会阅读的保障^[1]。总分馆制实现了城乡文献阅读资源的无缝对接,建立起了一批规范标准的阅读阵地。随着全民阅读推广的深入,要激活总分馆制的阵地作用,仅依靠图书馆内部发力是不够的,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近年来,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读者以阅读推广人的身份加入到总分馆各类阅读推广服务中来,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壮大阅读推广人队伍,鼓励并规范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提升阅读推广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使阅读推广工作走向专业化的标志之一^[2]。

1 阅读推广人含义及其研究概况

1.1 阅读推广人的含义及其发展过程

阅读推广人的提法出自一批热心推动儿童阅读的作家和出版人,最初具有“自封”的性质^[3]。对于阅读推广人,目前没有官方明确统一的界定,既有作为身份称呼的,也有作为荣誉称号的。阅读推广人的出现,源于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提出的“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计划^[4]。

《深圳市阅读推广人管理办法》规定阅读推广人是指市民个人或组织阅读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形式和载体向公众传播阅读理念、开展阅读指导、提升市民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业和业务人士^[5]。中国图书馆学会在2014年“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中也对阅读推广人进行了定义:阅读推广人是指具备一定资质,能够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

力的专职或业人员,培育对象包括各级各类图书馆和科研、教学、生产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及有志参与阅读推广事业的其他社会人员^[6]。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建立并培养阅读推广人队伍,“建立基层全民阅读工作者队伍培训机制,对全国各级全民阅读工作人员、图书馆馆员、农家书屋管理员、阅读推广人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全民阅读推广能力,支持开展各类基层读书活动。”由此可见,阅读推广人已经成为与图书馆从业人员同等重要的全民阅读推动力量。

1.2 阅读推广人的研究概况

近年来,“全民阅读”多次在党和政府的报告中被提及,全民阅读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与此同时,全民阅读的良好风气正在形成。伴随全民阅读进程的深入,出现了阅读推广人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出现、成长、实践及发展是全民阅读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根本保障^[7]。

从相关学术著作检索中可以发现,在2002年已经出现2篇对阅读推广人的研究,在2010年迎来研究的高峰期,略有回落后近年来关注度再次进入上升期,并突破原有峰值继续攀升。仅2017年就能检索到相关研究382篇次,到2018年4月总被引频次达1 632次。对于阅读推广人的研究不断深入,内容涉及阅读推广人的含义及分类、阅读推广人的制度、阅读推广人的作用、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建立阅读推广人制度的实践、阅读推广人的培训、阅读推广人培训教材等。但对于目前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下阅读推广人的培育和发展尚没有系统的研究。

2 阅读推广人培育是总分馆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2.1 阅读推广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工作

图书馆行业一直以来普遍开展宣传图书、辅导读者、促进阅读等各种活动。《公共图书馆:大众教育的生力军》,即提倡图书馆要激发大众阅读兴趣,提供个人阅读指导^[8]。回顾图书馆事业发展史,除了信息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的变化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9]。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供给的重要阵地之一,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源供给方,

而需要有更多元的手段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起居生活的“第三空间”“城市文化客厅”。图书馆阅读推广由萌芽状态的放任自发管理发展为有意识的自觉管理,表明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已被广大图书馆管理者所认识,阅读推广活动已成为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最大亮点^[10]。

2.2 阅读推广有效激活总分馆服务体系

总分馆体系下的阅读服务阵地实现了城乡区域文献资源与服务共享,对城乡阅读推广服务资源的无缝对接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宁市总分馆体系以“政府主导、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为特点。总馆成为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文献书目信息中心、图书资源配置中心和网络管理服务中心;乡镇分馆成为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纽带,实现城乡文化的均等化。随着总分馆体系的完善,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成为读者走进图书馆的最后一道门槛,被认为是“隐形的门槛”。公共图书馆需要打破门槛,消除障碍,需要进行阅读推广,培养公众的“阅读饥饿感”,需要开展阅读活动,引导读者利用图书馆^[11]。

2.3 培育阅读推广人能提升总分馆阅读推广水平

总分馆前提下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体现公共图书馆“均等、免费、无障碍”的理念。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邱冠华认为,可以通过活动策划和阅读空间两方面来实现阅读推广的均等化:整体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让读者就近、方便地参与阅读推广活动^[12]。总分馆体系解决了阅读空间的问题。随着全民阅读推广的不断深入,读者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期待日益提升。然而仅通过公共图书馆自身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积极培育阅读推广人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等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阅读推广人信息库,为其提供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鼓励和支持教师、公务员、大学生、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志愿者加入阅读推广人队伍,组织开展面向各类读者群体的专业阅读辅导和推广服务。《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2018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指出,要围绕“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培养具有一定资质,可以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阅读推广人”,提升阅读推广工作的专业能力。

3 海宁市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培育的创新实践

海宁市图书馆在2010年实现了乡镇分馆全覆盖,2012年开始依托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城乡同步推进阅读推广人培育的探索。目前已经有阅读推广人930余人,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万小时。阅读推广人参与阅读推广活动占全年活动总量的60%以上。在海宁市图书馆总分馆同步开展的12场“绘·阅读”2018年“图书馆之夜”中,由阅读推广人主导开展的有6场次,覆盖绘本讲演、阅读实践、分享沙龙等不同形式,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3.1 制定区域招募管理机制

服务于总分馆制的阅读推广人不同于服务于单一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需要兼顾城乡阅读推广服务不同的特点,在招募及管理过程中实现区域性统一,既要有阅读推广人服务标准规范,同时也要基于市、镇、村不同层次阅读推广服务程度保留各自发展空间。

3.1.1 总馆统一标准规范

总馆根据区域阅读服务需求制定基础框架,明确阅读推广人的含义、范围、共同目标、申报要求、服务内容、激励机制等。打通阅读推广人与全市志愿服务资源之间的关节,实现与海宁市志愿者协会信息互通,使阅读推广人可享受全市服务基础保险、服务礼遇和评优表彰等。构建覆盖全市的线上线下招募平台,一方面在全市各级总分馆、汽车图书馆等设立线下招募点,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平台开展线上招募。

3.1.2 分馆充实特色管理

分馆根据当地阅读推广人服务开展的特点,在实现与总馆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对具体管理措施进行细化丰富,以便更贴近基层阅读推广需求。对于分馆自行特色规定,由总馆以案例形式汇总梳理后向基层阅读点推送,可以根据地区需求实现选择性的“增值”。

3.2 细分层次开展培训聘任

随着全民阅读推广的不断深入,不同群体、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人们所营造的分众阅读模式已趋形成^[13]。与总分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服务相伴而生的阅读推广人也具有各自不同的诉求,随着团队壮大,

需要通过分类分层管理,才能持续有效地激发阅读推广人活力。不同的阅读推广人角色呈现“金字塔”分布,其中共读人具有最广泛的基础,带读人是中坚力量,领读人进行方向引领。不同角色之间按层次可以向下兼容,也可以实现提升转换。

3.2.1 领读人

由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阅读推广人,通过自身阅读示范、推荐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阅读活动。领读人负责协作制定活动方案,其通过荣誉聘任,每次任期5年,在任期内开展指定活动。如海宁市图书馆由知名主播担任微信“最美阅音”分享人,开展主题绘本讲演分享。

3.2.2 带读人

由具有特色背景和分享意愿的阅读推广人,通过结合自身特长组织策划特色阅读推广活动,丰富各级总分馆阅读推广服务。带读人均需通过图书馆理念、服务技巧基础培训,进入2~5场次活动的“试用期”,由指定图书馆员通过“定点观察”出具评估意见。通过评估后将为带读人制定活动方案,定期开展主题活动,每年至少开展2次,少于活动场次将重新进入试用阶段。如海宁市图书馆为长期开展心理“焦点模式”分享的田继红老师开设了每周“焦点心理”读书沙龙。

3.2.3 共读人

共读人将原有分散于各部门协助图书馆开展阅读服务的志愿者资源进行整合。共读人需要通过图书馆服务基础、公共服务礼仪、文明阅读守则等主题培训,经过图书馆服务职能倾向测定后分配到相应岗位。由分配部门馆员担任导师,一方面指导开展基础阅读服务,另一方面共读人作文明阅读示范和劝导,共同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共读人每次服务需设定基础时长,由引导馆员作出评估反馈。6个月以上不参加服务或有2次评估反馈记录为“不合格”的将重新进入培训测试阶段。共读人具有3次以上评估优秀服务记录,且具有较强开展主题阅读推广的意愿,可以通过申请进入带读人试用期,经过认证成为带读人。

3.3 实行“项目化”服务管理

总分馆制下阅读推广人有广泛的人口基数,随着各级政府对全民阅读的重视,队伍日益庞大,一方面是总分馆制区域化管理成效的体现,另一方面实现专业化管理就要对大团体做精细化操作。海宁市图书馆采用了“项目化”服务管理,已经有绘本讲演、巧手

阅读、外语互动、智力游戏课堂等6个项目组,总成员近百人,累计活动200余场次。

3.3.1 设立主题项目

项目设定采用招募和自荐两种形式。招募项目由图书馆根据自身阅读推广服务需求设定阅读主题、活动内容、主要开展形式,招募读者参与。招募项目一般为图书馆主推项目或特色项目,如总馆绘本讲演项目组、斜桥分馆“阅读皮影”项目组等。自荐项目由读者发起,提交项目组阅读主题、内容形式、开展频次和组员构成信息,经过图书馆审核后开展服务。自荐项目一般开展与读者爱好背景相关的延伸阅读,如“智力游戏课堂”项目组开展智力游戏和主题阅读活动。

3.3.2 实行项目自治

在项目组内,指定图书馆员担任“观察员”由项目组推选1~3名读者作为负责人,每年12月进行组内推荐,参与项目组6个月以上的组员均可参与推选。图书馆员立足阅读主题协助读者制定项目组活动开展内容、频率等,协助项目组开展定期交流总结、内部分享,逐步实现读者“自主”发展。

3.3.3 探索项目对接

积极探索多个项目同步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增强项目之间互动联系。如将绘本讲演和外语体验相结合的项目互动。同时,在图书馆阵地内部交流的基础上,探索外部项目对接,如巧手阅读项目组与“I公益商店”对接,将优秀阅读实践作品上架义卖、项目组走进公益商店开展现场制作推广等。

3.4 探索区域资源共建共享

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现了区域性资源的高度整合,依托总分馆制打破阅读推广人活动空间局限性,实现城乡阅读推广人资源的共建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泛的阅读资源流动共享。

3.4.1 提炼区域共享资源

阅读推广人可共享资源需运作较为成熟,具有可移动性,同时具有特色和需求性(即本地短期内无法独立开展)。海宁市图书馆由总馆对阅读推广人主导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汇总分析,提炼活动清单。清单选取活动均由阅读推广人个人或者团队主导,以年龄层细分针对人群,活动时长在40~90分钟,具有特色主题且对场地、道具需求范围可控。

3.4.2 构建资源交流平台

依托总分馆制构建项目交流平台,总馆每年1月提

供总分馆可共享资源清单,提供交流预约。各级分馆实现资源传导,由乡镇分馆负责村级分馆、流通点等地区需求汇总至总馆,统一协调安排时间开展阅读推广人交流。根据当年资源总量、乡镇入选交流资源分配总馆及各乡镇分馆预约数量。阅读推广人交流资源既可以作为独立单场活动开展,也可以融入基层大型阅读推广活动中。在交流筹备过程中采用二元责任方式,申请资源方落实前期宣传、现场筹备、后期反馈等工作;被申请方落实时间协调、交通出行等工作。

3.4.3 探索区域定制资源

随着总分馆阅读推广人资源交流日益密切,总分馆制下阅读推广活动构成不断发生变化。海宁市图书馆尝试通过阅读推广人推送具有示范作用的模板化阅读推广活动,提升基层开展活动的质量和能力。如近年来,乡镇分馆和基层阅读点手工类活动占比居高不下,深受读者喜爱,但是活动形式单一,阅读元素单薄。海宁市图书馆推出了一批“绘本+填色”“外语+拼贴”“逻辑训练+魔方”等阅读推广人主导项目提供预约。通过现场演示,充实基层阅读推广活动内容,提升基层策划组织能力。

4 思考

4.1 规范阅读推广人资格认证

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阅读推广人资格认证标准,普遍采用自行培训、命名上岗的方式。在总分馆制下,总馆及各级分馆由于区域发展差异、地区管理水平和重视程度不同等因素,阅读推广水平也不均衡。同时阅读推广人涉及社会各行各业,随着各类阅读新空间的建设,阅读推广活动也已经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可以考虑由图书馆行业协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全市阅读推广人资格认证管理,组织专家学者对地区阅读推广人资格认证条件进行认证,形成不同程度的多级认证体系,以适应总分馆不同发展水平。

4.2 构建专业化公益培训体系

随着全民阅读推广的深入开展,阅读推广人也需要不断提升自身阅读能力,从而增强对社会阅读能力提升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构建长效、专业的培训体系。同时,对从事公益性事业的阅读推广人进行收费培训,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公平。因此,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公益性阅读推广人培训制度,对于促进阅读推广

人的发展,保持阅读推广活动的公益性质,具有重要意义^[3]。可以考虑根据阅读推广人服务需求,设计包含图书馆学、阅读学、文献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关策划学、公共关系学等多方面的专业课程体系,由政府进行专项招标采购课程。采用学分制管理,划定阅读推广人必修学分、选修学分分数线。完成必修学分,可以参与资格认证;每年完成一定选修学分,作为年度资格认证条件。控制总学分数,避免培训资源滥用;对溢出部分学分,可以通过阅读推广人当年服务时长进行兑换,换取更多感兴趣的课程。

4.3 完善项目管理支持体系

阅读推广人项目化管理提升读者参与积极性,直接体现了全民阅读的参与度。项目化推进需要更多的配套支撑体系,让读者更好地实现内部管理。可以考虑在行业协会设立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每年开展项目招标、投标审核,确认立项团队并核拨相应经费。每年对读者项目组运行进行日常督查,年度对项目完成指标、经费使用等进行审核。对优秀项目组进行表

彰奖励;对未按要求完成的项目组则取消近2年申报资格,并限期进行整改达标。通过将公共图书馆从阅读推广人项目组中分离独立出来,减弱总馆和各级分馆自身影响力对阅读推广人发挥的影响,凸显读者的主体地位,增强城乡项目组之间的竞争交流,提升阅读推广人队伍的综合水平。

4.4 设计区域共享配套制度

总分馆制下阅读推广人资源的自由流动,使阅读推广活动打破空间和地区发展局限,促进总分馆制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发挥出全新的作用。可以考虑将区域阅读推广人资源共享作为下阶段总分馆制发展规划组成部分,将地区阅读推广人组建、资源推荐和引入等情况纳入市镇村三级年度考核。为区域资源共享配备专项经费,保障共享资源不因为地区支持差异而简化变形。专项经费统一下拨到总馆,由总馆根据年度分配专门用于支持阅读推广人进行专题活动设计、出行交通保障、移动活动设备购买、活动宣传开展等方面。让阅读推广人资源依托总分馆制激活城乡阅读空间。

参考文献:

- [1] 王余光.时代转型 阅读永恒[N].光明日报,2010-04-22(10).
- [2] 杨飞.构建专业化的阅读推广人队伍: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人培育工作实践[J].新世纪图书馆,2015(7):38-42.
- [3] 范并思.建设全面有效的阅读推广人制度[N].中国文化报,2017-04-21(3).
- [4] 王天泥.图书馆建立阅读推广人制度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5(6):61-64.
- [5] 谯进华.深圳阅读推广人的实践及发展[J].特区实践及理论,2013(2):64-66.
- [6]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第六届青年学术论坛和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记者会[EB/OL].[2018-05-06].http://www.lsc.org.cn/cn/news/2014-11/06/news_7571.html.
- [7] 王磊.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模式的实践探索: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7(6):6-10.
- [8] UNESCO.The Public Library:A Living Force for Popular Education[EB/OL].[2017-03-23].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74/147487eb.pdf.
- [9]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 [10] 范并思,王巧丽.阅读推广的管理自觉[J].图书馆论坛,2015(10):8-14.
- [11] 范并思.培养儿童的阅读饥饿感是图书馆儿童服务的使命[N].新华书目报,2015-09-04(A04).
- [12] 邱冠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从主编“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中的两本教材说起[J].图书馆建设,2017(12):22-24.
- [13] 秦殿启.论泛在信息社会阅读推广人的培育[J].图书馆,2016(12):98-102.

作者简介:吕佳兰(1983—),女,海宁市图书馆副馆长,馆员。

收稿日期:2018-05-07

· 浙江经验 ·

组建农民读书会 改善基层阅读环境 ——平湖市的探索与实践

陆爱斌

(平湖市图书馆 浙江平湖 314200)

摘要: 在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资源整合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利用率、如何开展农村基层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急需考虑的问题。农民读书会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基层阅读环境的有效抓手,是一个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倡导自主学习、平等交流、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学习组织。浙江省平湖市在组建农民读书会、开展农民读书会“一镇一品”阅读品牌打造、开展农民读书会星级评定、建立长效机制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关键词: 农民读书会; 基层阅读; 浙江平湖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Building a Farmer Reading Club to Improve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 Case Study in Pinghu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library project and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how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how to popularize the basic reading in the countryside have been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public library. The farmer reading club is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improve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for grass roots in the new era. It is a farmer-oriented organization which advocat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equal exchang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mutual improvement. Pinghu city has made positive exploration and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farmer reading club, how to establish reading brand of "one town and one product", the star-rating method of the farmer reading club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Key words farmers' reading club; reading at basic level; Zhejiang Pinghu

1 发展背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作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纳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部署。基层阅读是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一环。公共图书馆在农村的阅读推广,是由公共图书馆独立或参与发起的,以村(社区)农民为参与主体,以扩大阅读普及度、改善农村阅读环境、提高农民阅读数量和质量等为目的,有规划、有策略、有步骤、有保障的社会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公共图书馆如何在“三农”问题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图书馆人急需考虑的问题。农村阅读环境是整个阅读体系中最薄弱、最不充分、最需解决的一块“短板”。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农民、树立新风尚,必须转变农村文化业态。

平湖,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浙江省杭嘉湖平原东北部,南濒杭州湾,东临上海市,是嘉兴市五县(市)之一,常住人口68.5万。平湖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市),2016年被评为全国首批19个“书香城市”之一、国家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也是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模式的发源地。建设适合农民阅

读的场所、购买适合农民阅读的书籍、搭建适合农民阅读的平台、建立农民阅读的长效机制和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是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应着重考虑的问题，因此，平湖市图书馆探索组建了农民读书会，除了政府行政部门推动以外，更培育农民自主参与、主动融入、自我教育，使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具体做法

2.1 组建农民读书会

2.1.1 政府主导，图书馆主抓

2016年，平湖市委、市政府出台“文化平湖、书香社会”行动计划，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将全民阅读纳入全市中心工作，将农民读书会作为改善农村阅读环境的平台和主抓手。平湖市农民读书会，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广新局主抓，平湖市图书馆制订《平湖市农民读书会章程》负责组建运作。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图书分馆协助举办，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固定场所定期举办阅读活动。

2.1.2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村居住环境正在向新农村新社区集聚。农民承包地的整体流转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这使得在农村组建农民读书会有了先天的条件。因此，平湖的农民读书会按照要求，坚持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组建原则。如平湖市曹桥街道就是利用现有资源组建农民读书会。该街道在2005年之后已在农村居民中开展过农民读书会活动，有一定的基础。在这次农民读书会组建时，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形成共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组建了10个农民读书会，发展会员230人。

2.1.3 多方合作，灵活多样

在制订《平湖市农民读书会章程》时，平湖市图书馆更多地考虑到以问题为导向，以农民为中心，以需求为目标，以实效为落脚点。结合农村实际，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民俗民风、中心工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相结合。同时，与村社区文体团队、党员先锋站、民情茶馆、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类服务机构和文化类非企法人组织等合作，组建灵活多样的农民读书会。如平湖市林埭镇，在全镇党员先锋站组建全覆盖的

情况下，以党员为主体，发动身边的农民群众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组建农民读书会，既发展壮大群体又带动了本村的农民读书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通过组建遍及农村各地的农民读书会，变单打独斗为多方合作，把农村阅读推广融入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实现“学习致富、情感交流、民意传达、素质提升、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的农民读书会宗旨。

2.2 农民读书会的运作路径

2.2.1 因势利导，推动农民读书会“动”起来

这里说的“势”具体包涵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2015年平湖市实现了公共图书馆资源和农家书屋的整合，整合后的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图书实现了统一购买、统一配送。二是农村文化礼堂的逐步建成，现平湖市已经建成了覆盖行政村70%以上的文化礼堂。文化礼堂的建成，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学习、娱乐、健身等多方面的便利，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全民阅读也有了固定的场所，为农民读书会的“动”起来创造了条件。三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把乡村振兴战略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农村的灵魂工程。农民读书会的相继建立，也是顺应了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农民的需要。农民读书会凭借着这样的优势，在农家书屋、文化礼堂、阅读骨干家里开展各种阅读推广活动，或进行经典学习、时事学习，让农民读书会真正动起来。

2.2.2 因材施教，推动农民读书会“用”起来

组建农民读书会不是看看样子，搞搞形式主义，而是要让农民群众真正参与进来，走得进、坐得下、有所收获，让农民读书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民看到参加读书会能达到致富、求美、娱乐、修身等作用。因材施教就是精准开展农民读书会活动的关键。针对种养大户开展农业种植养殖方面的培训辅导、技术交流；针对农民文学方面的需求，开展读名著农民读书沙龙；针对农民自身修养的提升，开展读《论语》《孝经》等。

2.2.3 因特施策，推动农民读书会品牌化

按照农民读书会设计方案，2016年实现农民读书会组建全覆盖，2017年开展农民读书会“一镇一品”阅读品牌建设。到2017年底，平湖市农民读书会“一镇一品”阅读品牌基本建成，形成了当湖街道的“枕边书”、新仓镇的“怀旧经典”、广陈镇的“朗读

者”等阅读品牌。新仓镇三叉河村农民读书会现有会员12人,依托三叉河村农家书屋,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利用空闲的农房改建了100多平方米的三叉河学堂,添置了书架、书桌、报架,制作了读书笔记,设计了logo以及制度上墙,建立了QQ群等,每月举办2期读书活动,相继开展了经典诗文阅读、本土田歌诵读、“再见双抢”、“十二封家书”等阅读分享活动。

2.2.4 因网沟通,助推农民读书会“活”起来

建立农民读书会微信群、QQ群等网络平台,实现农民读书会会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在微信上定期发布“好书我荐”、“我爱看的一本书”、农民读书会活动预告、农民读书会活动信息等,也在微信群中交流读书心得和读后感等,通过网络加强了农民读书会会员之间的交流,使农民读书会“活”起来。

2.3 农民读书会长效机制的建立

农民读书会建、管、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下,农民读书会以政府行政部门推动为主,是政府保障文化基本权益的责任体现。引导农民读书会沿着正确的路子走下去,是公共图书馆实现阅读推广的重要职责。要让农民群众融入农民读书会,必须充分调动农民读书的积极性,激发农民主人翁的意识,这也是办好农民读书会的关键。

平湖市积极探索农民读书会长效机制建设,制订了《平湖市农民读书会星级评定(试点)》办法。办法规定,平湖市农民读书会按三星级评定并制定了三星级评定条件:即一星级为合格,二星级为良好,三星级为优秀。每年申报一次,验收一次,评定一次。对获得三星级的农民读书会分别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奖励用于农民读书会书籍的添置、读书活动的支出,但不得用于人员奖励、补贴、就餐等。

2017年在新仓镇开展了农民读书会星级评定(试点)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18年农民读书会将由平湖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财政局等联合下发《平湖市农民读书会星级评定办法》,建立符合平湖

实际的农民读书会发展长效机制。

3 服务成效

3.1 提高了农家书屋利用率

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资源整合后,实现了一卡通行、通借通还,在业务指导上也全部由市图书馆主抓。同时,实行了农家书屋图书统一由市图书馆采购、配送、流通。农民读书会建立以后,主要依托的读书活动场所为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农民读书会按照章程,每月开展不少于2次读书活动以及举办相应的读书沙龙、读书心得、征文比赛、朗读分享等,使得农家书屋的利用率得到了提升。据2017年统计,农民读书会的组建、各类活动的开展,使农家书屋的利用率普遍提高30%以上,特别是借阅量和到馆率明显上升。

3.2 改善了基层阅读环境

2016年,平湖成功争创了全国首批“书香城市”,城市阅读已经形成气候,而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阅读环境却不尽如人意。组建农民读书会、改善农村阅读环境是平湖市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实践的一个课题。2年来,平湖市农民读书会从组建到运作再到长效机制的建立,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目前,已组建成立了113个农民读书会,参加会员2 047人。2017年农民读书会共计开展各类读书活动1 300余次,“一镇一品”农村阅读品牌初步建立,《农民读书会星级评定(试点)》方案出台。农民读书会组建前后基层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农民在建新房时会考虑建一个书房,阅读人数增加。新仓镇三叉河村几个不识字的老人自发搞起了识字班,每月一次,村里几位退休老干部,自发搞起来《弟子规》诵读活动,每周五上午举行。这种自身原动力的萌芽是平湖农民读书会组建的初衷。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只能是给读书会以养分和推力,而农民自下而上的“萌动”,才是农民读书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 [1] 农业发展将提档升级 农民生活越来越幸福[EB/OL].(2017-11-12)[2018-03-04].<http://sc.people.com.cn/n2/2017/1112/c379471-30912486.html>.

作者简介:陆爱斌(1965—),男,平湖市图书馆馆长,馆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阅读推广、民俗事项。

收稿日期:2018-05-09

· 浙江经验 ·

总分馆体系下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及可持续发展思考 ——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

赵晓华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50)

摘要: 文章以嘉兴市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2016—2017年运营状况为基础,从智慧服务、品牌服务、远程管理、社会绩效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同时提出了总分馆体系下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远程管理精细化、建设模式多元化、管理模式体系化、发展思路创新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考。

关键词: 总分馆体系;自助图书馆;嘉兴市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Thinking about Operation Stat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24-hour Self-service Library under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Jiaxing Library

Abstract Based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from 2016 to 2017 of the 24-hour self-service library in Jiaxing Library, the paper conducts a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rom aspects of smart service, brand service, remote management, social performance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new think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24-hour self-service library under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which include the refinement of remote managemen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mod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ideas.

Key words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self-service library; Jiaxing

1 引言

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被国际图书馆界誉为“我们职业最简明的表述”。它的第四定律——“节省读者的时间”^[1],要求图书馆人通过科学排架、参考咨询、馆址选择等种种手段来节省读者时间,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为广大的农村读者提供了便利的阅读服务。那么,在城市交通相对拥堵的今天,城市阅读服务该如何运作来满足市民就近阅读的需求?24小时自助图书馆应运而生。

自2006年第一台自助图书馆设备诞生之日起,自助图书馆的建设发展走过了十余年时间,已发展成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自助图书馆

体系,该体系集成了RFID技术、图书传输自动控制技术、图书分拣自动控制技术、数据通信和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相关的安全技术和生产工艺^[2]。另一种以张家港图书馆驿站、温州城市书房为代表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读者可以进入其中自由选书、休闲阅读。本文研究的是后者,以跟踪嘉兴市图书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一年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嘉兴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坚持充分调研、合理布局、规范建设、远程管理的原则,努力打造成遍布全城的第三文化空间,成为满足国民文化保障有益补充的基层文化设施。它的建成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时间、空间,打通城市阅读“最后一公里”,促进了全民阅读,真正体现了全民阅读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从而更好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 嘉兴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运营与管理现状

嘉兴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少年路点是在总馆的指导下建设的,建成后一直由南湖区分馆负责日常管理与维护,社会效益喜人。研究此成功案例,可以为24小时自助图书馆项目建设的开展与推进提供借鉴。

2.1 智慧服务与图书馆新技术的有效整合

自助图书馆智慧服务指的是图书馆运用高科技手段,为读者提供文化休闲、阅读交流等自助公共文化服务,从而提高读者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自助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包括自动门禁系统、自助办证、自助借还书、电子书阅读、自助售货、图书消毒、智能温控、智能光控、一键报警、视频监控、远程设备控制等。自助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是与各种新技术的有效整合,是新技术与导引标识、服务告示等相结合,从而引导读者自助服务的新模式。

2.2 自助服务与属地管理员的常态互补

在自助图书馆里,读者根据标识指引自主借还书、随意阅读,看似无需工作人员,但它是一个自助图书馆,功能完备,属地管理员的作用非常重要。从打扫卫生到设备维护从劝说读者不文明行为到书架整理、从突发事件处理到实际工作面临的矛盾的解决等,可谓事无巨细。读者的自助服务离不开属地管理员认真负责的工作。

2.3 品牌服务与图书馆员的专业指引

自助图书馆是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端,是为方便馆外读者群体的服务场所。因此,它一般离图书馆比较远,又分散在不同方位,能全天候正常运作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馆小、书少的自助图书馆一定要精致高雅,才能吸引读者、留住读者。因此,嘉兴市图书馆在少年路自助图书馆里试着作了图书推荐活动,效果甚好。“好书有约”是嘉兴市图书馆的一个品牌活动,每月会推出最新图书4册。自助图书馆里设置“好书有约”专架,受到年轻读者群体的青睐。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每天都有读者来借还“好书有约”的书。其次,我们还在自助图书馆里作了一面图书展示墙,定期开展图书推荐活动。2016年,开展了“沈石溪动物小说作品展”“经典绘本展”“女性休闲阅读图书展”“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展”“家常菜私房菜图书展”“台湾作家图书展”等图书展。这些图书

展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喜爱。此类读者服务活动非常适合自助图书馆。

2.4 服务效能与远程化管理的社会绩效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拓展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将读者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更多的街道社区等基层区域。

2.4.1 多元化拓展延伸服务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理念创新,首先实现了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延伸服务——时间延伸、地点延伸、窗口服务延伸、资源延伸、网络延伸等。24小时自助图书馆拓展了服务时间,不受开闭馆的影响,甚至可以全天候开放。其次是服务空间的拓展,它是总馆集中学习空间的有力补充,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读者家门口的图书馆。再次,阅读服务人群的拓展,吸引了上班族、学生族、考试族、亲子族、特殊人群等多样化读者群。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阅读资源相对丰富,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目前,嘉兴市图书馆有20m²和100m²左右两种不同规模的自助图书馆,分别配置1 000册和6 000册纸质图书,同时开通了电子书借阅或嘉兴数字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等数字阅读渠道,基本可以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

2.4.2 最大化提升服务效能

街道、社区,甚至住宅小区,都需要文化配套设施建设。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配置建设,不仅可以夯实基层文化根基,展示地方文化独特魅力,还可以产生经济价值。比如一个高档住宅小区,有了这种自助图书馆,它的宣传、销售变得很有底气,居民的选择也会带有倾向性。

嘉兴市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借还书服务统计采用力博系统的业务统计,以2016年6月1日—2017年5月31日为例,少年路点(馆舍面积100m²,藏书6 000册)借书20 566册,还书19 023册,图书利用率343%,远远高于传统图书馆的图书利用率。其中借还书时间段在图书馆闭馆时间段内的占71%,这相当于2~3个社区图书馆的借阅量之和。少年路自助图书馆一年接待读者9万余人次,读者高峰段出现在晚上8时—10时,其中节假日到馆人次更多。暑假(7月1日至9月1日)期间,每天7时至22时座无虚席,日均读者312人次。国庆长假、元旦、春节等节假日,读者量也较平时有较大的增幅。这些数据表明,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满足读者工作上学之余文化休闲阅读需求、丰富读

者假日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4.3 远程化管理完善高效

(1) 设备远程控制。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设备远程控制主要包括自助借还机、电子书借阅机、自助门禁系统等,这些设备都可以实现远程控制。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标识及指引牌上有设备应急电话,要求负责的馆员(或外包公司的技术人员)能保持电话通畅,一般来说,5分钟内故障可排除。从本人跟踪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来看,设备调试阶段故障次数较多,读者使用中会有不便之处。调试结束正常运营情况下,这些设备稳定性较高。一年里,自助借还机故障次数在10次之内,且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排除。而门禁系统的故障则是网络不稳定、临时断网引起的,一般都可避免。

(2) 图书整理更新。目前,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图书整理以志愿者服务为主,以属地管理员的辅助为补充。图书更新则是由馆员统一安排,做到每月更新。如果社会效益优良,总分馆通借通还使得图书自然流通更新。

(3) 视频实时监控。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视频监控做到360度无死角,并将监控纳入图书馆总监控系统,24小时实时控制。

3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与运营工作创新,成效显著,但它毕竟只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一个延伸与拓展,不是公共图书馆日常工作的重点。如果管理不到位,会形成建设轰轰烈烈、管理马马虎虎、后期可持续发展空间闭塞的现象。因此,我们要不断研究不断创新,树立品牌服务的意识,将提高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工作长抓不懈。

3.1 建设配置合理化

门禁系统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安全保障。目前,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门禁系统都是RFID门禁报警系统,读者有未借阅的图书是无法打开自助门的。它的漏洞是在其他读者开门的瞬间跟着出去。虽然报警声会响起,可是因为无人值守,就会导致图书流失。如果能将RFID门禁报警系统与地铁门禁系统ACS系统或淘宝无人超市的门禁系统整合,则会更安全稳定。

资源配置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目前,我国公共文化重点供给缺少质量意识^[3],图书馆员应该创新工作思路,提升资源建设档次。24小时自助图书馆纸质图书配置要合理,可以根据每个自助馆的需求或特色,分配好新旧书、成人少儿书、不同类别图书、经典名著、热门图书及自助馆特色书等的比例。同时要求有一定数量的数字资源作辅助,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标识指引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精细服务的体现。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标识指引至关重要,要求清晰完善而又简单明了。读者使用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或是遇到突发事件该如何解决等都要在自助图书馆最显眼位置有指示牌或引导标识。

3.2 远程管理精细化

总分馆体系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远程管理精细化提供了便捷。24小时自助图书馆要成为读者喜爱的公共书房,离不开图书馆的有效管理。一个管理上的小小不足,就会影响到读者的使用选择,影响到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成败。它的远程管理需要精细与完善。比如,后勤服务管理中的如厕问题、饮水问题,都要考虑周到且保障安全便捷。自助图书馆的日常保洁,通风系统、桌椅安全完好、灯光空调控制等要落实到位,给读者营造良好舒适的阅读环境。而分馆的就近管理最经济、高效。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放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优化调整。

3.3 建设模式多元化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建设中功能设置要完备,做到建一个成功一个,在研究与实践中构建建设新模式。①政府投入与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可以是政府行为,可以是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4]。目前,在公共文化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是当前的一种大背景、大趋势。正如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所说,公共服务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购买或与民间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产生的效益更高^[5]。(2)不同规模的自助图书馆相结

合。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规模可以根据地方特点及读者群阅读需求等作可行性分析,以此来确定馆舍大小(20m²~200m²不等),并选择合适的馆址。城市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分布则按照辐射服务半径及服务人口,从最需要的人口密集区着手建设逐渐发展到全覆盖。24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可以有个性化、定制化的自助图书馆。例如,科技、法律、绘本纯阅读自助图书馆等。

3.4 管理模式体系化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管理只有标准化、规范化,才有生命活力,才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与高度。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制定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宣传模式、智慧服务及日常管理模式、考核监督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等。在分析与研究中实践,在实践与探索中改进与制定相关制度标准,使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规范化、体系化。这也是“普遍均等惠及全民”嘉兴市图书馆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向更深更基层推进的一个落实之处。

3.5 发展思路创新化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工作思路的创新。图书及时更新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生命,是吸引读者的关键。由于它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位置离图书馆较远,图书更新一次成本大、周期相对长。因此,可以与流动图书馆(汽车图书馆)的服务适当融合,也可以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物流配送体系,从而降低配送成本、增加更新频次。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良好发展的运作思路与必然

趋势。目前,图书编目、计算机设备维护及图书馆专业新科技开发等业务外包已成普遍。同理,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外包来达到更高效优质的服务。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与社区分馆的有效整合,建有人值守的智慧图书馆,是服务与需求的双赢模式。目前,社区分馆存在工作人员少、开馆时间短且随意性强等现实问题,读者使用不便,图书流动性自然就少。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能将自助图书馆服务模式融入社区分馆,则目前社区分馆的弊端都可避免,社会效益一定会大大提升。同时,有人值守的自助图书馆管理更到位、服务更优质。

4 结语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使传统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和服务人口从地域中心向边缘不断增加,有效促进了图书馆服务的普遍均等化。同时,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书香社会构建这个庞大的文化工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200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此后,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便开始复制与创新,并力求找到适合本地区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的新模式。而城乡一体化总分馆服务体系使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有了更多发展空间。目前的试点实践与分析研究,引领着图书馆人在满足读者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创新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有力。

参考文献:

- [1]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10.
- [2] 吴晞.大道之行 有器之用:关于自助图书馆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论坛,2008(6):170-173.
- [3] 周鸿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公众评价的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21-27.
- [4] 杨述明,管志鹏.PPP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发展[J].决策与信息,2017(5):66-70.
- [5] 吴建中.社会力量办公共文化是大趋势[J].图书馆论坛,2016,36(8):37-38,47.

作者简介:赵晓华(1971—),女,嘉兴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2017-10-30

· 学术论坛 ·

日本主要中国学研究机构介评

刘立群 李吉子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日本对中国研究由来已久,在海外中国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采用文献调查法,把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大致分为3种类型:政府设立的官方机构、由法人代表或学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大学里的研究机构。按上述分类选取代表性的机构,对机构的历史沿革、研究内容、学术成果进行介绍,总结日本中国学的研究特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

关键词: 中国学;汉学;日本中国学;海外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 G250;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Introduction and Review of Major China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Japan

Abstract China studies, which has profound impact overseas, boasts a long history in Japa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method, China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Japan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ficial institutions founded by government, demotic institutions operated by a legal person or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s, introduces their history, prime stud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a studies in Japan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Key Words China studies; Sinology; China studies in Japan; overseas studies on China

“海外中国学”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对中国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包括传统的汉学和对近、当代中国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得益于日本有众多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and 一大批学识渊博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有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由法人代表或学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以及在大学里设立的研究机构3种类型。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选取代表性的机构进行介绍。

1 日本主要中国学研究机构

1.1 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

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金融、科技、经济和军事领域,是官方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1.1.1 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

其前身是1979年7月大臣官房调查企画部设置的

财政金融研究室,于2000年7月变更为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业务范围是在国际和国内的财政经济相关领域进行调查,及时获取情报资源,与国外机构举办交流合作活动,开展课题研究。每年不定期召开中国研究会议,并针对时势及时召开各种研讨会。其相关全部内容通过机构网站对外开放。2000—2012年度的会议录文稿的网页版保存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网站,2013年度至今的会议录文稿在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的网站^[1]。

1.1.2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

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于2006年成立,2013年4月1日成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直辖组织。其宗旨是在中日两国的科技领域搭建平台,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交流合作。并且积极协助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该中心实时关注中国科技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布信息,免费向公众提供中

国的科技政策、统计数据和中文文献资料等^[2]。

1.1.3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是日本最大的地域研究机关。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基地,该机构收集和整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出版物、期刊、地图、法律和统计数据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外推广其研究成果。同时,积极开展海内外交流与合作,建立日本和国际社会合作发展的学术基础;公布研究人员及其学术成果,促成相关学者之间的共享与合作。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季刊《亚洲经济》《亚洲动向年报》,以及单行本、论文集、报告等。网站提供日、英两种语言浏览,报告和过刊全文可被免费下载使用。

亚洲经济研究所下设图书馆收藏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文献,向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开放,文献种类为基础资料、一手新闻、书籍、报纸、期刊、缩微文献、CD-ROM、录像等。网站设置地域搜索窗口,便于读者按地区访问浏览日本及海外出版的关于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的文献。其中比较详细的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领域的资料,含图书、百科事典、年鉴、便览、文献目录、地方志、法规、政府报告等多种文献类型^[3]。

1.1.4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是日本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也是自卫队高级干部的教育机构和日本最大的战争史中心。其研究成果对日本政府制定军事、外交等决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防卫研究所下设史料阅览室,公开的资料中包括侵华战争的资料。从1997年开始用日、英两种语言每年出版的《东亚战略概览》,是该所的核心出版物。防卫研究所自2011年起,每年用中、日、英3种语言推出一份综合性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并于2016年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室^[4]。

1.2 法人代表或学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

这些民间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了传统汉学及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研究所是战后日本最早设立的研究当代中国的专门机构,“亚洲政经学会和现代中国学会可以说是日本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学会”^[5]。

1.2.1 一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

一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是于1946年开始筹建、

1947年3月正式成立的民间机构。中国研究所是首家将有关中国的研究称为“中国研究”的机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日本的中国研究被称作“支那研究”^[6]。其研究领域涵盖当代中国及亚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历史等诸多领域。中国研究所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一直出版发行《中国研究所报》(后更名为《中国研究月报》)和《中国年鉴》等出版物,向相关学者提供中国学学术信息。中国研究所下设定例学术研究会、日中经济交流史研究会和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会3个研究小组^[7]。

1.2.2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源自中国研究所。1951年5月,中国研究所第六次大会讨论决定,把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机能和学会机能分开,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现代中国学会于1951年10月正式成立,1993年更名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下设关东、关西、西日本和东海4个分会,以现代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学术研究。学会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之外,各分会还召开1~3次学术研讨会。该机构通过出版物《现代中国学会报》(后改名《现代中国》)和《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通讯》,发布中国学相关信息、研究动向和学术成果^[8]。

1.2.3 日本中国学会

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是以中国相关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全国性综合学会,以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及语言学学者为主,现有会员2 000多名。日本中国学会出版发行《日本中国学会报》和《日本中国学会通讯》,向用户提供中国学相关学术信息和学会动向。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和不定期的研讨会,基于网站向用户提供2012年度和2017年度专题研讨会研究集录的全文浏览,提供中、日、英、韩4种语言的浏览方式^[9]。

1.2.4 一般财团法人东方学会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外务省于1947年成立“东方学术协会”替代“日华学会”。1948年3月11日,“东方学术协会”更名为“东方学会”。2013年4月1日,东方学会经日本公益法人改革被归属于内阁府所管的一般财团法人,成为民间的纯学术团体。其在东京和京都设两个支部,现有会员1 530名,会员由各大学、研究院所中研究东方国家历史、社会、经济、民族、民

俗、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等方面的学者组成,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占多数。

东方学会自1951年起陆续出版发行《东方学》、《东方学会报》、《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ACTA ASIATICA*、《东方学关系著书论文目录》等日文、英文中国学相关学术期刊。此外还不定期出版单行本和纪念论文集等,网站提供出版物的目录检索^[10]。

1.2.5 一般财团法人亚洲政经学会

一般财团法人亚洲政经学会于1953年成立,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会员已超过1 000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其中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超过50%以上,研究东南亚问题的约占30%,研究南亚问题的约占7%。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和东日本、西日本的区域大会。一般财团法人亚洲政经学会出版发行《亚洲研究》《新闻通讯》《现代亚洲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丛书》《现代亚洲讲座》等期刊和丛书,通过学会网站供用户浏览目录^[11]。

1.2.6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拥有近百年历史,是亚洲最大的东洋学中心、全球第五大亚洲研究图书馆。东洋文库的前身是澳大利亚人乔治·厄恩斯特·莫理循在北京的私人藏书,又称“莫理循文库”,它收藏大量的东方学文献。1917年,日本三菱财阀收购了莫理循文库,1924年正式成立东洋文库^[12]。

东洋文库现有藏书约95万册。收藏的文献分为3大类别:汉籍及亚洲其他语言的地域历史文献、西文文献和日文文献。其中有5种汉籍被列为“日本国宝”,贵重资料有甲骨文字片635件、中国地方志3 000部、中国族谱860部、西藏和蒙古大藏经13 000件。1948年东洋文库成为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主要分支机构之一。

东洋文库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设有庞大的研究机构,下设6个研究部门、13个研究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图书馆兼研究所。1961—2003年期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东洋文库下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介绍亚洲文化和世界各国关于亚洲研究的最新信息^[12]。

东洋文库出版发行*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东洋文库欧文纪要》、《新欧文论丛》等西文出版物和《东洋文

库和文纪要》(即《东洋学报》)、《近代中国研究报告》、《东洋文库书报》、《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东洋文库论丛》等日文出版物。所有出版物被收录在东洋文库的网络电子资源库——ERNEST (E-RESOURCE NETWORK STORAGE)^[13]。东洋文库还定期为日本学者举办“东洋学讲座”,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举办“特别讲演会”。

东洋文库一直致力于广泛收集近现代中国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同时推动基于这些资料的实证研究。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研究方面,于1954年和2003年分别成立“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和“超地域亚洲研究部门现代中国研究班”,整合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研究人员,着力开展关于现代中国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为了能够在信息过载时代精准收集资料,更好地开展史学视点的现代中国研究,2007年东洋文库专门设立了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该资料室通过举办讲座和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与海内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加入海外数据库建设项目,以联合采购的方式科学系统地收集现代中国学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通过机构网站向外界揭示,提供中、日、英3种语言的浏览方式。2007年,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成为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设立的6所现代中国地域研究基地之一^[14]。

1.3 大学设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具有悠久的中国学研究历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两大汉学研究重镇。2007年,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设立“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以早稻田大学为核心,联合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等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建研究基地开展当代中国的研究。

1.3.1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是综合性研究东方文化的机构^[15]。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其中不乏珍贵的典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洋文化研究所开始建立古籍目录数据库《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目录》,自2002年起开始建立古籍全文影像数据库《珍贵汉籍善本全文画像》数据库等,在互联网上提供免费开放获取服务。

东洋文化研究所积极开展海内外的交流与合作,

“2009年11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访日期间,双方签署合作意向书。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藏中文古籍4 000余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供读者服务”^[16]。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洋文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现代中国书分类目录》等文献,向用户提供该机构研究动向与学术信息。

1.3.2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在外务省援助下成立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中日战争爆发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于1938年更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39年成立,1949年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旧)人文科学研究所和西洋文化研究所3所合并重组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7]。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文献,其中有殷代甲骨文、敦煌遗书、青铜器等珍稀考古资料。战后初期,主要的研究仍是继续原来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中国古典研究及考古学调查。主要出版物有《东方学报》《人文学报》、*Zinbun*研究纪要期刊和研究报告书、所报《人文》等。用户可以用日文、英文2种语言进行检索和目录浏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65年成立的附属机构“东洋学文献中心”,在2009年更名为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该中心除了把研究所收藏的丰富的汉学资料编纂成目录、建立数据库之外,还将文献提供给国内外研究学者使用。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史研究索引之一,目前最新版本是2017年2月出版的2014年度《东洋学文献类目》,最新网络版是7.4 α版^[18]。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机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2007年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设立的6所现代中国地域研究基地之一。

1.3.3 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

2007年日本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设立了“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19],一期(2007年—2012年3月)以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20]为此项目的核心基地,联合京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21]、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2]、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3]、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共6所机构共建研究基地,着力创建网络型学术组织,开展研究活动并在出版物上发布研究成果。

早稻田大学作为核心基地负责编辑发行中文、英文学术刊物各一种,即2009年开始创办的中文期刊《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和从2012年创办的英文期刊*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把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此外,该基地还出版日文期刊《NIHU现代中国早稻田大学基地WICCS研究系列》和日文单行本。官网提供目录及全文^[20]。

“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被集结成书,是由劲草书房出版的日文图书《现代中国地域研究丛书》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图书《当代日本中国研究》丛书。此书曾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度“优秀新创集刊奖”,丛书刊载的论文被收录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自第2期(2012年4月—2017年3月)开始,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增建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24]、法政大学大学院中国基础政治研究所^[25]、神户大学先端融合研究环^[26]3个合作研究基地。目前第3期研究工作已经展开。

2 日本中国学的研究特色

2.1 历史悠久,学术积淀深厚

据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1700年前应神天皇时代(公元270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典籍就已传到日本^[6]。到公元600年日本的飞鸟时代,中日之间开始了正式的文化交流。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学习语言、文化、法律等先进的中华文明。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江户时代,逐渐发展成为汉学体系,被认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起源^[27]。日本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学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其中包括殷商甲骨文片、敦煌遗书等古代珍稀历史资料等。由于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学术积累,从而培育出了荻生徂徕、伊藤仁斋、林泰辅等众多的著名汉学家。

2.2 资料收集精准,文献整理与组织细致

日本学者长于广泛而又精准收集大量数据和信

息。东洋文库为了应对当下信息泛滥、出版界和媒体环境的变化,专门设立了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科学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机构重视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例如爱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珍贵文献《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报告书》^[28]。善于资料的归纳、整理、分析和总结,在研究的同时,编制了众多方便使用的工具书。譬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纂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此书分类题录所收文献,按一般史、地理、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等十八类排列。每类之下又各分细目。本书收集资料较多,较全,为研究亚洲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科学之重要工具书”^[29]。研究机构高度开放,极大地盘活了资源,为顺利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研究深入,专业性强

术业有专攻,日本中国学研究机构拥有优秀的人才队伍。研究人员常年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从而诞生了精品著作。例如,从事《五经正义》研究的日本学者野间文史,出版了《五经正义校勘研究》,“他还依据自己研究的成果对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十三经注疏》新版本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一些批评,他的意见写成长文发表在《中国哲学》第24辑上”^[30]。

2.4 研究领域广泛,现代中国研究方兴未艾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出现有组织地进行现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政府投入了巨额扶持资金^[6]。研究内容延伸至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宗教、外交与国际关系、文化、艺术、教育、地理、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具备深厚汉学功底和国际视野的研究人员,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多角度开展当代中国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2012年,面对两国关系空前恶化的困境,现代中国地区研究项目倾尽全力在东京、京都、名古屋、福冈四大城市举办了4次大规模公开研讨会,从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地域间合作等角度探讨陷入困境中的中日

关系。大量普通市民反应踊跃,积极参加,与学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5]

2.5 协同合作,走向世界

加强研究人员与海内外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建研究基地,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资料互换等方式形成优势互补。研究人员目光长远,计划周详缜密,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开展研究。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毛里和子说:“当代、现代以及近代史的研究者之间进行横向的合作研究不断增多,用百年的长时段来观察现代中国,这方面的成果要比欧美多。”^[31]“近几年,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高达数千乃至上万册,这固然是中国影响力增强的体现,但也是日本政府、民间、学界高度重视中国研究的结果和日本研究方法创新带来的现象。”^[6]研究机构依托互联网,将学术成果和数据相互共享。通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建设多语言浏览的网站和发行多语种出版物等形式,积极对外推介学术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力。

3 结语

日本以研究古代中国“传统汉学研究”见长,历史悠久,成果丰硕。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日本中国学研究内容发生了演变,从传统的文、史、哲领域延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现实领域。政府、学术界和民间都高度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力求把握中国的发展方向及其对日本乃至对世界的影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折射出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中可以洞见政界、学术界的中国视角。我们在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价值理念的同时,更需要开辟视野,不断深化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了解和认识,跟进其研究动向,加强对其出版文献的收集力度,扩大交流,实现互知、合作、分享、共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 研究介绍[EB/OL].[2018-03-06]. <https://www.mof.go.jp/pri/research/conference.htm>.
- [2] 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EB/OL].[2018-03-06]. <http://www.jst.go.jp/crccl/>.

- [3]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图书馆[EB/OL].[2018-03-06].<http://www.ide.go.jp/Japanese/Library.html>.
- [4]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www.nids.mod.go.jp/>.
- [5] 天儿慧.通过“现代中国地区研究”项目看日本的中国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别策划海外中国学).2013-09-06(A05).
- [6] 何培忠.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2014(5):104-110.
- [7] 一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www.chuken1946.or.jp/Gaiyo.htm>.
- [8]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EB/OL].[2018-03-06].<http://www.genchugakkai.com/>.
- [9] 日本中国学会[EB/OL].[2018-04-06].<http://nippon-chugoku-gakkai.org/gb2312/index-c.html>.
- [10] 一般财团法人东方学会[EB/OL].[2018-03-06].<http://www.tohogakkai.com/enkaku.html>.
- [11] 一般财团法人亚洲政经学会[EB/OL].[2018-03-06].<http://www.jaas.or.jp/>.
- [12]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EB/OL].[2018-03-06].<http://www.toyo-bunko.or.jp/about/enkaku.html/>.
- [13]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网络电子资源库[DB/OL].[2018-03-06].http://www.i-repository.net/il/meta_pub/G0000171kenkyu.
- [14]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EB/OL].[2018-03-06].<http://www.tbcas.jp/sc/org.html>.
- [15]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www.ioc.u-tokyo.ac.jp/cn/intro/intro.html>.
- [16] 中国国家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DB/OL].[2018-03-06].<http://mylib.nlc.cn/web/guest/dongwenyanhanjiyingxiangku>.
- [17]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www.zinbun.kyoto-u.ac.jp/zinbun/about/history.htm>.
- [18]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类目》数据库[DB/OL].[2018-03-06].<http://ruimoku.zinbun.kyoto-u.ac.jp/ruimoku/index.html.ja>.
- [19] 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EB/OL].[2018-03-06].<https://www.nihu.jp/ja/research/areastudies/china>.
- [20] 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s://www.waseda.jp/prj-wiccs/>.
- [21]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EB/OL].[2018-03-06].<http://cccs.kieas.keio.ac.jp/>.
- [22] 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基地[EB/OL].[2018-05-26].<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
- [23]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EB/OL].[2018-03-06].<http://www.chikyu.ac.jp/rihn-china/>.
- [24]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EB/OL].[2018-03-06].<http://iccs.aichi-u.ac.jp/>.
- [25] 法政大学大学院.中国基础政治研究所[EB/OL].[2018-03-06].http://kenkai.ws.hosei.ac.jp/tokutei_chugokukisou.html.
- [26] 神戸大学先端融合研究环人文社会科学系融合研究领域(神戸大学社会科学系教育研究府)现代中国研究[EB/OL].[2018-03-06].<http://www.oair.kobe-u.ac.jp/ssh/project/04.html>.
- [27] 维基百科[EB/OL].[2018-04-03].<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D%A6>.
- [28] 爱知大学.图书馆[EB/OL].[2018-03-06].<http://www2.aichi-u.ac.jp/profile/campus/library>.
- [29] 冯蒸.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3-194.
- [30] 周桂钿.日本的中国学研究[J].哲学动态,2004(1):45-46.
- [31] 毛里和子.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赠书仪式致谢辞[EB/OL].[2018-03-15].<http://www.jsc.fudan.edu.cn/view.php?id=990>.

作者简介: 刘立群(1969—),女,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外文期刊资源管理、海外中国学;李吉子(1969—),女,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日、韩文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海外中国学。

收稿日期: 2018-06-29

· 学术论坛 ·

建国初期浙江省对私家藏书的保护研究*

钱文艳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浙江的私家藏书历史渊源流长。自三国两晋至清代中叶,浙江的私家藏书文化对其地方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建国初期,浙江地方的私家藏书被损毁事件时有发生。为“保护祖国文物与典籍”,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相关政令条例进而通过收购、接收及保管三种途径实施保护,成绩斐然。对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的收购保护可为佐证。

关键词: 私家藏书;衍芬草堂;建国初期;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G259.2755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PRC

Abstract Zhejiang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and Jin to the Qing Dynasty,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exerted a grea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day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amage to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Zhejiang was heard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to protect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books of China, Zhen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issued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It achieved brilliant results by the three ways of purchase, reception and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of Jiang's Yanfen Thatched Cottage in Haining can provide evidences.

Key words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Yanfen Thatched Cottage; the early day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的私家藏书历史渊远流长。自三国两晋以降,经两宋至明清,纵览浙籍藏书家名录,灿若繁星,绵延不绝。据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明代知名藏书家计有358人,其中浙江占114家^①。又据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史》统计,浙江的重要私人藏书家,明代计有49家;清代计有101家;民国计有79家^②。著名浙籍书商王松泉则记载,“民国时期杭州籍或寓居杭州的藏书家,藏书均在二十只书籍以上,计达七十五人。”^③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江浙地区私家藏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④。但总体看较少涉及建国初期国

家对私家藏书实施保护的内容。本文拟以浙江省档案史料为据,对这一方面作一探讨,以奏拾遗补阙之功。

1 建国初期浙江省人民政府通令保护私家藏书

浙江的私家藏书风尚鼎盛于清代中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朝廷修《四库全书》,通令地方捐书。规定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国获此殊荣的私人藏书家仅4家。浙江鲍氏的“知不足斋”、汪氏的“开万楼”及范氏的“天一阁”3家有幸入围,一时名动全国。乾隆并将宁波天

* 本文系2016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全额重点资助”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文物保护研究(1950—1965)”(项目编号:2016CB208)的成果之一。

一阁作为宫廷、官府藏书阁建筑的范本^[3]。

自三国两晋,经两宋至清中叶,浙江私家藏书文化的演进对浙江地方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梁启超说:明“万历末年以来,风气渐变了”,“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4]蔡尚思在谈及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鼻祖黄宗羲时,也称:明末“藏书风气大盛”,“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5]

建国伊始,浙江地方“一般群众,不了解国家保护图书文物之政策,竟有讹传今后古籍旧书为无用者,人心未定,乃有纸业生产者运取名贵旧书毁为造纸与伞扇原料之事。”^[6]为保护祖国文物与典籍,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系列政令条例实施保护。

1950年5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谭震林主席签署命令保护古旧书刊等各类文物。其中命令3规定:“凡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碑版、甲骨、金石文字及其他拓本,图书版片、简牍、档案文书、字画、佛像以及近代的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命令6规定:“私人收藏之历代文物,仍为私人所有,任何人不得侵毁,政府应加以保护。如搬移、转让时,须呈报政府或当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如无力收藏,可洽商当地政府,由文物管理机关代为保护陈列,其主权仍属私人。”^[7]

1951年6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转发文化部代电至各区专员公署、各县、市人民政府。文件指出:“查华东各地区,因土改后所保存各项文物及书籍等件,为免于散佚,以资保护起见,应由各地文化机构集中封存保管,或就近交由当地文化馆封存,并报由我部处理。”^[8]

1952年2月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三点命令。其中第2点指出:“对于各地私家藏书,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加以调查,分报省文教厅与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备查。并应随时注意保护,勿使遭遇损毁。如遇物主无力保存时,应鼓励其捐献国家。其中如有名贵文物图书,亦可酌予实物奖励。严禁售予纸厂化作纸浆原料,或零星售予杂货店铺作包扎用纸。”^[9]

1955年6月22日,浙江省文化局发文至各县市人民政府、浙江省文管会、浙江图书馆,就浙江省今后

如何改进和加强古书保护工作提出五点意见。其中第一和第二点意见强调指出:“各地文教部门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文物法令知识的学习,首先对当前旧书保护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将现有旧书及保藏情况告诉省文管会和浙江图书馆。”“根据当前人力及经济条件,各地旧书一般均以就地保管为原则(必要时运到就近适当地点集中保管),但须将是项书籍安置在高燥的地方,最好是楼房,用旧木箱和书架安放(根据需要,在夏秋间进行暴晒),防止霉烂和虫蛀。”^[10]

1961年5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下文指出: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的保护和管理,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特提出五点意见。其中第三、四、五点分别强调说:“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有关保管部门必须切实负责保管好所藏的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订出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对藏书较多的镇和人民公社,各市、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协助和指导他们做好保管工作。积存在政法、财政等部门的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应当移交给文化行政部门统一保管。在文化行政部门尚未接受之前,各部门应指定专人妥为保管,准备移交。”“各地收藏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严禁擅自出卖。”“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该经常注意收集本地的府、县、乡、镇、寺庙等各种志书、家谱、本地人的著作等地方文献和资料。”^[11]

上述政令条例在浙江地方被迅速贯彻实施。建国初期,浙江省对私家藏书的保护主要通过收购、接收及保管3种途径。“世治藏于国”终成为浙江众多私家藏书的良好归宿。

2 浙江省对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实施收购保护

海宁硖石衍芬草堂为清代藏书家蒋光焯^③藏书处,衍芬草堂自诩“九侯望族;万卷藏书”,是清末浙江规模较大、藏书较丰富的藏书楼之一。

1951年5月11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致函浙江省文管会主任邵裴子,称:“硖石蒋家的书,怕有散失,亟需先行接管。”“请早日派几个人(或与浙江图书馆联系,请他们也派一、二人同去)。所有费用,华东文化部或文物局可以筹出。”^[12]

5月14日,浙江省文管会将此事报告浙江省文教厅。经与省图书馆联系,称其因忙于接收南浔嘉业堂书籍,已派出4人,目前无法再派出人来。“兹经本会第卅五常委会决定:拟先派本会张任政委员赴硖石了解蒋氏藏书情况。”“为求工作上便利起见,拟请钧厅令行海宁县人民政府知照并随予协助照料。”^[13]

8月12日,浙江省文管会张任政委员赴海宁调查后报告称:“八月八日上午了解蒋家藏书,地点在硖石西关厢蒋氏祠堂内之藏书楼。计有大小书箱六十只,内明刻本书约百种左右,每箱编定字号,箱门内粘有目录一纸,形式尚整齐。下午了解蒋家住宅内之藏书楼,计有大小书箱四十只(内有一、二箱未满),内有宋刻复印本三种(柳文音义、五代史详节、吕氏家塾读书记),明刻本百种左右,诗集传音释板片全部。所有书籍均编定字号,箱门内亦粘有目录。总计两处所藏约在一万册以上。”^[14]

10月13日,浙江省文管会报告省文教厅,称:“对于蒋家藏书,中央文物局郑局长原主张一部分由政府收购,现郑局长在国外,是否须俟郑局长回国后由本会通知进行。目前暂照现状由蒋氏自行保管,县府随时监察。至是否可以没收一节,按本会初步了解,该批藏书并不专属于已经判刑之蒋雅举,又难以提出其中某一部分为蒋雅举所独有,似未能如此处理。”^[15]

10月17日,浙江省文教厅下文浙江省文管会:“附送海宁县人民政府对该县藏书处理意见一份。”^[16]海宁县人民政府关于“硖石镇蒋家藏书”处理意见称:“蒋家原地主成份,因后裔六房,分家时由六房分散保藏,现多完整,并未散失,县里一再派人调查并通知不得损失。存硖石蒋家的约壹百箱,大都是清版书,明版书百余部,宋版书拾余部,据地方人士说,藏书中有全部老子道德经,是很名贵的。前蒋家代表人蒋雅举已病故,现代代表人蒋鹭涛居上海愚园路。蒋家的书仍由自己保管,但由我们经常检查,以防散失。前据云中央文物局郑振铎局长有由国家收买的说法,终未见明文指示,至今搁置。”“蒋家的书还是属于私人所有,如果由政府收买请即指示。款项来源,购买的书名最好由上级派来专家统一办理。”

1953年6月16日,浙江省文管会报告浙江省人民政府:“查海宁硖石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已有近二百年历史,其中宋刊孤本、名人抄校之本,名闻全国者为数不少。自一九五一年以来,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

理局曾派员先后向蒋家洽购,至本月(六月)初,钧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宋云彬副主任自北京致函本会鄯承铨副主任,略谓中央社管局郑振铎局长拟以一亿元收购蒋氏藏书归国家所有,嘱代为接洽。旋又得宋副主任第二次信,谓社管局决定派赵万里南来办理此事,嘱我会与省立图书馆各派干部前往硖石协助点接。并云该批图书将来分别以一部分留浙江,一部分留华东,一部分归中央等语。”

6月1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并请省文化局予以协助^[17]。

6月23日,浙江省文化局下文海宁县人民政府,称:“接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函,关于代中央社管局接洽收购海宁蒋家藏书事,该会即派一干部陪同中央文化部赵万里前来你处。查硖石镇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已有近二百年历史。其中宋刻孤本、名人抄校之本,名闻全国者为数不少。希你县了解该蒋氏的情况,如无问题,则请协助赵万里同志等与其洽购。”^[18]

6月30日,浙江省文委指示浙江省文化局:“请你局对该项藏书收购工作予以协助。”^[19]

7月1日,浙江省文管会张任政、王士伦对此次协助中央文化部社管局点运硖石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工作向浙江省文管会作出汇报。称:“此次我们奉派协助中央文化部赵万里同志去硖石点运蒋家之藏书前后共计四天。运往杭州部分的书籍全部由我们负责贴封,然后由浙江图书馆负责装运。”六月“廿四日上午出发至硖石,下午即开始工作。廿四日下午与廿五日上午,主要是清点工作,地点在蒋家。张任政同志协助清点,接洽有关装运方面等问题。王士伦同志帮助将书及书箱由楼上搬至楼下,并稍参加一些造册工作。廿六、七日开始转至藏书在蒋家祠堂部分的清点装箱工作。廿六日我们两人全部参加清点蒋氏祠堂部分的藏书。视当时具体情况,因时间急促,由赵万里同志决定,除运往中央十二箱外,根据蒋氏原标字号,分成甲、乙两组,然后召集蒋氏原主及参加工作的同志当众抽签。华东部分由上海文管会孙同志代表抽签,杭州部分由张任政同志代表抽签。最后将抽得之‘甲’或‘乙’,即在书箱上写上,并编定号码,以便分别进行拼箱启运。廿七日张任政同志负责接洽有关装运等方面事情,王士伦同志负责运往杭州部分之书籍的造册工作,廿八日将运往杭州部分书籍全部贴封完毕。”^[20]

10月10日,中央文化部社管局下文浙江省文管会,称:“我局前收购硖石蒋氏衍芬草堂藏书一批,其中一部分书籍计641种,共9 600册,另附详目一份,已由赵万里同志点交你会。”^[21]嘱补办正式拨交手续。此批拨交书籍,经浙江图书馆点验如下:“特藏,126种,1 336册。普藏,513种,8 020册。总计649种,9 656册。”^[22]至此,对海宁硖石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的收购工作基本完成。

3 浙江省对其他重要私家藏书进行接收保护

建国初期,浙江省除对部分名家藏书实施收购保护外,还对其他重要私家藏书进行接收保护。典型案例如下:

1950年2月,浙江图书馆接收余翼、余遂捐赠其先人余绍宋^④寒柯堂藏书14 600余册,其中善本书1 882册。

1951年3月,海宁管大雄捐赠家藏6 000余册,浙江图书馆选藏2 338册,其中《管庭芬日谱》^⑤手稿47册尤其宝贵。

1951年4月,象山陈庆麟捐赠其父陈汉章^⑥遗藏,浙江图书馆选藏836册。其中包括陈汉章手稿《缀学堂丛著》等188册。

1951年4月,浙江图书馆接收诸暨余重耀^⑦捐赠藏书1 377册,其中自著《遁庐丛著》手稿88册尤具价值。

1951年4月,富阳夏震武^⑧家属捐赠藏书,浙江图书馆选藏106种443册,其中称善者朝鲜刊本、明刊本共21种189册。

1951年5月,宁波李庆城^⑨捐赠其萱荫楼藏书3万余册,其中《明实录》等7种508册由中央文化部提走。

1951年12月,浙江图书馆接收湖州刘承幹^⑩捐赠其南浔嘉业堂藏书112 700余册,另自印书2万余册^[23]。

1951至1952年浙江图书馆接收海宁硖石朱氏^⑪藏书“约10 000册左右”。朱家藏书中有不少善本,其中尤以明写本《明穆宗实录》70卷12册,世所罕见^[24]。

1952年4月,浙江图书馆接收王新捐赠原长兴王修^⑫诒庄楼寄存浙江图书馆的书籍计667种371册,中多善本。计有宋元刊本5种12册,明刊本298种2 272册,稿本、抄本149种463册,日本刻本50种262册,朝鲜刻本、活字本66种297册。

1952年12月,余姚朱公束^⑬捐赠其四明楼藏书数

万册,浙江图书馆选藏其中的101种914册,等等^[23]。

1954年接收保护绍兴祁彪佳^⑭遗稿遗书。其中浙江省文管会点收绍兴祁氏稿本书籍目录如下:“右祁忠敏遗稿二十三种,内手稿十六种,旧抄本六种,刻本一种,共三十四册。各家撰述祁忠敏传状行实及祁氏三世著稿二十二种,共二十三册。祁氏藏明清刻本十九种,共五十九册,又朱卷一包,杂件二包,绢地画像二件:祁忠敏像一幅,商夫人像一幅。”^[25]

1954年接收奉化县孙鹤皋^⑮私家藏书。由浙江图书馆接收的此批藏书计特藏书籍2 648册,普通书籍3 106册,总计5 754册^[26]。

1955年接收绍兴安昌镇天官第沈家^⑯藏书。由浙江省图书馆丁慰长、张正夫赴绍兴接收,共一万二千二百册^[27]。

4 结语

征集、管理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是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后,在各级党委的重视领导下,浙江省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政府文化部门、公共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古旧图书,并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利用。浙江图书馆古旧图书已从解放前30万册增加到70万册。温州、绍兴、嘉兴、宁波、余姚,临海、瑞安等十一个县、市收藏古书达60余万册,其中20余万册已经过初步整理,有的已编目造册,妥为保管^[1]。

今后,浙江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有关保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继续损坏,认真做好防火、防风、防洪、防虫、防霉工作。”“对于其中的善本和珍品,尤应加强保管。”^[11]浙江省并向全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有关保管部门下发由浙江省文化局制定的《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保管简则》一份,通令执行。

195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古典文籍是我们历代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录,是发扬中国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估计的。每一人都有爱护保存的责任,而无损毁破坏的权利。”“中国人民是热爱文化的人民,当他们认识到爱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之后,他们就会自觉地加以爱护,也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消除损毁古旧图书的现象。”^[28]

注释:

- ①本文引用数据由笔者根据辞典统计得出。
- ②主要研究成果有: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傅璇宗、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顾志兴《浙江藏书史》,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等。
- ③蒋光焄(1825—1895年),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其祖父蒋开基性喜聚书,建有“衍芬草堂”“渊芬草堂”藏书楼。延至光焄时,收罗尤勤。祖孙三代,共得图书珍籍数十万卷,藏于“衍芬草堂”,与从兄蒋光照之“别下斋”藏书楼齐名。
- ④余绍宋(1882—1949年),浙江龙游人。1930年,余绍宋于杭州菩提寺附近(今浙江杭州上城区萱寿里)买地建“寒柯堂”作为私人藏书处。“寒柯堂”占地约500平方米,藏书逾十万卷。
- ⑤管庭芬(1797—1880年),浙江海宁人。《管廷芬日谱》是管氏记载其日常生活的日记。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终于同治四年(1865年)。每年各成一册,共47册。日记除了记载管氏的日常活动和学术交流外,对于天气现象、自然灾害的描述非常详尽,为后人留下一批研究海宁历史气候与灾害的珍贵资料。
- ⑥陈汉章(1864—1938年),浙江宁波人。青年时代曾师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大师。
- ⑦余重耀(1876—1954年),浙江诸暨人。“文宗两汉,诗学唐宋,以书法名”。
- ⑧夏震武(1854—1930年),浙江富阳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曾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并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 ⑨李氏“萱荫楼”由李植本遗孀方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成。李氏“萱荫楼”藏书计有宋元本25种,明本556种,抄本189种,清本2109种,共计3000余种,34031册。1951年,“萱荫楼”所有藏书由李氏后人李庆城捐赠给国家。
- ⑩刘承幹(1881—1963年),浙江湖州南浔人。1920年在南浔故居建造藏书楼,号“嘉业堂”。“嘉业堂”鼎盛时期号称藏书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嘉业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
- ⑪朱氏为海宁望族,家富藏书,其后裔有朱至、朱昌燕等,为海宁藏书名家。朱昌燕藏书处计有“朝经暮史昼子夜集之楼”“沙浜草堂”“学易斋”“衍庐”“椒花后舫”“拜竹龛”等多处。卒后,其藏书散佚。
- ⑫王修(1898—1936年),浙江长兴人。王修素喜藏书,其祖居长兴仁寿堂旧藏甚富。后因购得七世祖王继贤知蒙城时所刻《古蒙庄子》一书,将藏书楼改名“治庄楼”,以示不忘先祖之志。
- ⑬朱兰(1800—1873年),浙江余姚人。清道光九年乙丑科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编修,迁侍讲学士。同治年曾出任安徽学政,期满归里后筑四明阁(约1866年)以藏书。朱公束为其玄孙。曾任无锡国专教授等职。
- ⑭祁彪佳(1602—1645年),浙江绍兴梅墅村人,明代政治家、戏曲家、藏书家。明天启二年进士,崇祯时曾任右佥都御史。清兵入关,力主抗清,任苏松总督。清兵攻占杭州后,自沉殉国,卒谥忠敏。祁家“澹生堂”藏书楼名满浙江。
- ⑮孙鹤皋(1888—1970年),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事业。民国时期,孙鹤皋在家乡办奉北小学,并购书藏故宅天孙阁,有书37箱。
- ⑯浙江绍兴安昌镇天官第沈家,其先祖沈以痒将装有甍愕碧瓦、砖璜粗椽、双层楼板、细木花窗的五间200余平方米大楼辟为藏书楼。后裔沈永钦继承祖辈藏书世业,续又广泛罗致更加充实。藏书楼上悬“抱遗阁”匾额,内置大小木质专用书箱211只和画箱多只。楼中珍藏《四库全书》珍本1957册,《四部丛书》215册,《四部丛刊》132册,《宛委别藏》150册,《昭代丛书》173册及《楚辞》等。

参考文献:

- [1]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下[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67,308,639.
- [2]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M]//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杭州文史资料:第25辑 杭垣旧事.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自序.
- [3] 傅璇宗,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下[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847.
-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8-9.

- [5] 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 人物·图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82.
- [6] 陈训慈.贩书经眼录序[M]//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序.
- [7] 浙江省人民政府命令.为保护我民族文化遗产特颁发“关于保护历代文物的决定”仰各遵照此令[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50-05-20(J039-003-004).
- [8] 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代电.转知各地因土改所保存各项文物及书籍应封存报文化部由[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1-06-01.
- [9] 浙江省人民政府命令.通报重视在土地改革中收集的文物图书不使损坏及禁用旧版书作造纸原料,法定三项,希切实执行由[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52-02-06(J101-003-1176).
- [10] 浙江省文化局.关于改进和加强旧书保护工作的几点意见,希各地研究执行[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55-06-22(J169-007-025).
- [11]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关于古旧图书、史料和字画的保管情况和今后加强保管工作的意见[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61-05-15(J169-013-013).
- [12] 郑振铎致邵斐子函[A].杭州:浙江博物馆,1951-05-11.
- [13] 浙江省文管会报告浙江省文教厅.为奉郑局长函对海宁蒋朱家两家藏书问题拟先派员了解请令知海宁县政府电[A].杭州:浙江博物馆,1951-05-14.
- [14] 浙江省文管会张任政委员赴海宁调查藏书报告[A].杭州:浙江博物馆,1951-08-12.
- [15] 浙江省文管会报告浙江省文教厅.为奉示对海宁朱蒋两家藏书令提意见以备讨论由[A].杭州:浙江博物馆,1951-10-13.
- [16] 浙江省文教厅附送海宁县人民政府对该县藏书处理意见一份[A].杭州:浙江博物馆,1951-10-17.
- [17] 浙江省文管会报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为代中央社管局接洽收购海宁蒋家藏书一事报请核备由[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53-06-16(J159-003-044).
- [18] 浙江省文化局致函海宁县人民政府[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3-06-23.
- [19] 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对浙江省文化局的指示[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3-06-30.
- [20] 浙江省文管会张任政、王士伦.协助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点运硃石蒋氏衍芬堂藏书工作简报[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3-07-01.
- [21] 中央文化部社管局来函[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3-10-10.
- [22] 浙江图书馆收到中央文化事业管理局拨给硃石蒋氏衍芬堂书籍清册[A].杭州:浙江省博物馆,1953-07.
- [23] 《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93-94.
- [24] 李性忠.浙江图书馆捐赠史述略[J].杭州: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4):2-8.
- [25] 浙江省文管会报告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为查报祁彪佳遗稿遗书情况并将捐献我会接收之手稿及书籍缮具清单报请查核[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1954-05-12(J169-006-029).
- [26] 浙江图书馆接收奉化县萧镇没收孙鹤皋特藏、普藏书籍合册[A].杭州:浙江省档案馆,[年月不详](J169-006-029).
- [27] 绍兴市文物管理处.绍兴文博大事记(1949—1989)[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出版年月不详]:22.
- [28] 古旧图书不应再任令损毁[N].光明日报,1956-10-25(1).

作者简介: 钱文艳(1960—),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浙江近现代史。

收稿日期: 2018-08-09

我国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综述*

楼海萍¹ 潘杏梅² 方红² 胡海翔¹ 袁明捷¹

(1.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3)

(2.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浙江杭州 310006)

摘要: 随着学术资源数字化的普及以及期刊网络出版和开放获取的发展, 学术论文的下载指标逐渐进入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的视角, 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中国知网 (CNKI) 总库为数据源, 对国内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专文献进行分析梳理, 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了我国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学术论文; 下载频次; 被引频次; 布拉德福定律; 齐普夫定律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A Research Summary on Downloading Indexes of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ublishing and open access of journals, the download index of academic papers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perspectives in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 academic papers,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hackles the literatures on downloading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It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es on downloading index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points ou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academic papers; download frequency; cited frequency; Law of Bradford; Zipf's Law

学术论文的影响力评价一直深受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部门的关注。被引频次是最常用的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指标, 数据易得、经典直观, 但由于其评价不够全面、不能合理反映隐性引用论文的学术价值, 且存在较长的时滞性及固有的引用缺陷, 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学术论文影响力单一评价指标的严重不足和局限。随着学术资源数字化的普及以及期刊网络出版和开放存取的发展, 学术论文的下载类指标 (下载频次) 逐渐进入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的视角,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研究, 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已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本文通过文献调研, 对我国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进行

分析、梳理和总结, 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1 国内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概况

1.1 文献来源

选择中国知网总库作为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库, 根据预检结果确定检索策略为: (篇名=论文OR文献OR文章OR全文OR载文OR刊文OR期刊OR杂志OR学报) AND (篇名=下载), 检索时间为2018年5月6日, 得316条记录。对数据进行整合、清洗, 最后得到121篇专论文献进入分析。

1.2 文献年代分布

* 本文系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一般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医学领域学术论文下载信息的科研新趋势实时监测分析与研究” (项目编号: 2016C35018) 的成果之一。

年代分布反映了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主题在我国的研究起源和发展轨迹。图1可见,我国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报道于2005年,这与2004年12月《中国学术期刊网络计量测试报告(2004版)》(简称《报告》)相一致^[1]。2005—2017年发文量呈上下波动,年发文量不一,从2005—2014年成递增趋势,2014年达到最高值,随后呈现出递减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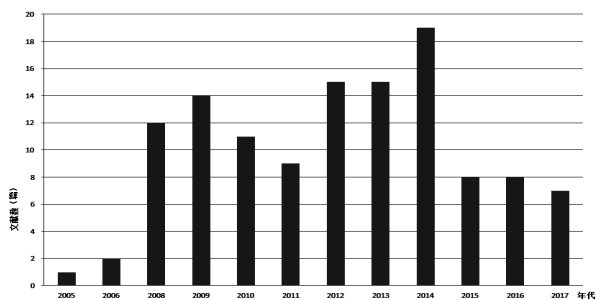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1.3 文献的作者分布

对121篇文献作者进行分析,按第一作者发文量统计,排名前10名的作者如表1所示。这些作者为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活跃作者。

表1 发文量排名前10名的作者

序号	作者	作者单位	发文篇数	发文篇数*
1	郭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系	7	1(指导)
2	林佳瑜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4	
3	刘雪立	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	3	
4	刘思源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系	2	5
5	方红玲	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	2	2
6	马敬	南京大学社会学处	2	
6	曹艺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6	刘芳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	2	
6	毛国敏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2	
6	许鑫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2	

注: *为第二作者以上(含第二作者)的发文篇数或者指导学位论文的篇数。

1.4 文献的机构分布

根据作者所属单位的统计分析,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机构如表2所示。

表2 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机构

序号	作者单位	论文数/篇
1	南京大学	15
2	郑州大学	10
3	大连理工大学	6
4	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	5
5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4
6	南京理工大学	3
6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3
7	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	2
7	河南师范大学	2
7	华东师范大学	2
7	南京医科大学	2

表2数据显示,来自大学、期刊研究中心和编辑部以及研究所,尤其是南京大学、郑州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作者是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主力军。

1.5 文献的期刊分布

按学科类别的统计结果显示,对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出版、医学、科研管理、计算机应用等领域,存在学科交叉渗透现象。121篇文献中除有8篇硕士学位论文外,其余113篇期刊论文分布于68种期刊中,表3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10名的期刊。

表3 发文量排名前10名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论文数/篇
1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11
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1
3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6
4	情报杂志	5
4	编辑学报	5
6	情报科学	4
6	包头医学	4
8	图书情报工作	3
8	情报探索	3
8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3

从表3可见,发文量排名前10名的期刊中,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5种(其中4种为核心期刊),期刊类和医药类期刊各2种,大学学报1种。

1.6 高下载论文排名

按下载频次从高到低对121篇文献进行排序,排名前10位文献见表4。

表4 下载频次排名前10的学术论文

序号	题名	第一作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下载频次	被引频次
1	开放存取论文下载与引用情况计量研究	牛昱昕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02-27	1574	15
2	期刊Web下载总频次的布拉德福分布研究	张洋	图书情报知识	2006-11-10	964	57
3	期刊论文被引用及其Web全文下载的文献计量分析	万锦望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5-04-25	898	75
4	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分析	丁佐奇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0-07-15	748	64
5	数字资源获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电子期刊全文下载与引用分析	刘筱敏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01-21	722	29
6	期刊h指数、Web即年下载率与影响因子相关性研究——以CSSCI收录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样本	陈巍	情报科学	2010-12-15	669	13
7	期刊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相关性——以中国知网CSCD与CHSSCD刊物为样本的计量分析	张小强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08-30	659	18
8	科技论文下载次数的统计性质研究	刘思源	郑州大学学位论文	2009-05-20	576	27
9	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研究——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	陆伟	情报科学	2016-01-05	540	12
10	2005~2009年图书情报核心期刊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计量分析	周燕子	情报探索	2011-02-15	506	38

这组文献篇均下载786次,篇均被引35次,下载次数是被引次数的22.5倍。其中《开放存取论文下载与引用情况计量研究》一文的下载频次是被引频次的105倍,其下载频次偏高可能跟“开放存取”是热门主题以及发文期刊有关。该组论文除1篇学位论文外,其余9篇论文有8篇发表于核心期刊。

1.7 高被引文论文排名

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对121篇文献进行排序,排名前10位文献见表5。

表5 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学术论文

序号	题名	第一作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1	期刊论文被引用及其Web全文下载的文献计量分析	万锦堃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5-04-25	898	75
2	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分析	丁佐奇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0-07-15	748	64
3	我国科技期刊论文被引量与下载量峰值年代——多学科比较研究	方红玲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1-09-15	469	63
4	期刊Web下载总频次的布拉德福分布研究	张洋	图书情报知识	2006-11-10	964	57
5	学术论文的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分析	杜秀杰	编辑学报	2009-12-25	496	41
6	中文科技期刊下载计量指标与引用计量指标的比较研究	庞景安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6-01-30	478	40
7	五种综合性眼科学期刊论文下载量与被引量的关系及部分论文的量引背离现象	刘雪立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0-09-15	253	39
8	2005~2009年图书情报核心期刊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计量分析	周燕子	情报探索	2011-02-15	506	38
9	我国5种眼科学核心期刊2004~2008年高下载量论文统计与分析	刘雪立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0-07-15	228	33
10	数字资源获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电子期刊全文下载与引用分析	刘筱敏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01-21	722	29

这组文献篇均被引用48次,篇均下载576次,下载次数是被引次数的12倍。其中《数字资源获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电子期刊全文下载与引用分析》一文的下载频次是被引频次的25倍,其下载频次偏高可能跟作者机构和发文期刊有关。该组论文除1篇为学位论文外,9篇论文有8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2 国内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主题

通过对上述论文的研读分析可知,论文下载指标研究主要涉及下载指标的基本特征、下载与被引的关系、下载指标的应用、代表实时下载情况的下载数据

的研究及应用等主题。

学术论文在引用前被下载和研读,体现了其社会价值和影响力。因此,学术论文的下载指标也可作为论文评价的外部指标,那么其具有什么特性、与其他指标的关系如何、能否用它来预测并替代引用指标结果以及用于论文和期刊的评价时的适用性如何?学者们利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Web下载统计报告》大样本数据或中国知网总库或其镜像站数据以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进行了相关研究。

2.1 论文下载指标的基本特征研究

2.1.1 下载频次的分布特征研究

为考察学术论文下载频次的随机变量分布特征,学者们从学科、期刊、机构或论文等不同层次开展了相关研究。

其中一项利用《总库》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下载次数在期刊中呈负指数分布,而非正态分布,认为将下载次数视为连续型随机变量会更为合适^[2]。

另一研究结果显示:论文、期刊和机构层次的下载次数均不符合负指数或幂律分布,呈现向右偏斜的尖顶峰形曲线形态,且以期刊层次为最,所有曲线与正态分布的差异都很大^[3]。

针对《总库》数据开展大样本抽样的统计结果表明:期刊论文的网络下载频次分布均遵循负对数函数衰减,衰减速率由最高下载次数、篇均下载次数与载文量3因素决定^[4]。

另有研究显示:随着下载量的增多,论文数比例较快地增大,增大到某一最大值后再缓慢减小直至最小,认为学科论文的下载次数分布可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表征。基于该分布特征,提出学科最可几下载量,用以表征学科论文的下载量水平^[5]。

毛国敏等运用非线性迭代算法,模拟得出期刊论文下载指标的概率密度服从对数正态分布^[6]。

上述基于不同层面的研究均一致表明:学术论文下载频次的随机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1.2 期刊论文下载频次的布拉德福分布研究

作为文献计量学经典定律之一的布拉德福定律,最早是用来描述科技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的,其是“期刊载文量累积数”与“期刊累积数”之间的函数关系,体现了文献在相应期刊中的集中与分散的对

立与统一。为探讨论文下载指标是否也遵循布拉德福分布,学者们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布拉德福定律在网络环境下也可适用。

张洋的研究表明:期刊“Web下载总频次”在期刊中的分布符合布拉德福分布规律,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新特点。认为专业论文的纯度是影响布拉德福定律相关数学表达式准确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1]。

曹艺等通过考察发现,集中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机构>期刊>论文,在期刊和机构层次,相邻分区的集中系数差异很大,说明分区效果很差,其中还呈现格鲁斯(Gross)下垂现象^[3]。

郭强等研究显示:不同学科属性的期刊下载次数从直观上都能较为显著地表现出布拉德福分布的特征,当然学科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针对下载次数在期刊中分布的聚类现象以及分散程度进行了解释或是比较,对下载次数与学科属性之间的关系能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为建立期刊下载频次的统计性质与学科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作了准备^[2]。

2.1.3 论文下载次数在论文关键词中的齐普夫分布

传统的齐普夫定律描述的是,若将文章中的词按照出现的频次降序排列,则词频与对应排序值的乘积保持不变。有研究将传统齐普夫定律中的研究对象转换为论文关键词与下载次数,从新的视角对论文下载频次的统计性质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对于下载次数在关键词中的齐普夫分布,其意义从直观上与传统的齐普夫定律的含义也是相吻合的^[7]。

论文下载次数在论文关键词中的齐普夫分布,也是下载次数统计分布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用户信息需求的偏好,并可用来探讨用户下载行为及其知识利用的规律性特征,为文献老化的解释性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

2.2 学术论文下载指标和被引指标的关系研究

2.2.1 下载指标和被引指标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周燕子等^[8]和刘影梅等^[9]通过10篇高频论文分别考察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间的相关性,直观比较后得出:同一篇论文的下下载次数远远高于被引频次,高下载的论文不一定是高被引,高被引的论文不一定是高下载。

2.2.2 学术论文下载指标和被引指标相关性的定量统计研究

主要涉及机构、期刊、作者、论文等不同层次上的论文下载和被引指标的相关性研究。其中涉及期刊层次的研究较多,样本量也较庞大,并较多地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进行分析。其中有学者考虑到中文科技期刊文献计量指标与网络计量指标间的线性关系较弱,且大多不服从正态分布,直接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分别对期刊和机构层次的下下载次数和下载次数^[3]、期刊的下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10]等开展研究。也有学者先采用正态性检验(如直方图、QQ散点图、K-S检验)、曲线估计确认后再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从期刊^[11]、论文+期刊^[12]以及论文+作者+期刊^[13]等不同层面上规范地考察了论文下载次数、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间的相关性。另有学者在期刊层面上采用线性相关法开展了相关研究^[4, 14]。而在单篇论文层面,可见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法、回归分析法考察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间的相关性^[15-17]。

从相关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较典型的问题:如取样的合理性欠佳,样本量过小导致结论不具有普遍性;样本出版年限不够长使得被引行为尚未发生;分析方法不合理,如没有经过正态性检验而直接采用线性相关分析,使得结果不具科学性。通过研究发现,高下载或高频被引论文,在QQ概率图中是一些远离簇位置的散点^[3],亦即离群数据^[18],容易造成单篇论文整体的相关系数降低,因此以高频论文作为样本,样本量较少,并且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存在时间差,以及还有论文的学科差异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可信度降低。

综上,由于数据来源、样本大小、学科领域、分析层次、统计方法、观察时段等的不同,针对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频次的相关性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基于期刊、作者、机构层次,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在单篇论文层面,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不具有相关性或相关性偏弱,因此可作为两个独立指标,至于其权重如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2.3 学术论文下载次数应用研究

2.3.1 在期刊、机构、作者层次上论文下载次数对被引频次预测的可行性及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持肯定意见,如有研究基于期刊和机构层次的下下载次数和被引频次之间关联性显著较强,认

为从其中一个指标来推测另一指标是较为可靠的^[3]。另有研究认为从作者或期刊粒度利用下载频次预测被引频次是可行的^[13]。郭强等则利用期刊的前期下载总频次对其后期的被引总频次进行了估算,并在线性假设基础上,对后期的被引半衰期以及最大引文年限也进行了考察^[19]。

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能利用期刊论文下载频次对被引频次进行预测,如王雅祺指出被引量 and 下载数之间的关系较复杂,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12]。

2.3.2 在单篇论文层次上论文下载频次对被引频次预测的可行性

周骥等通过研究认为:根据论文早期的下载频次可对后期的被引频次进行预测^[17]。而有几位学者通过高频论文的直观比较或者线性相关分析,认为论文下载频次不能对被引频次进行预测^[8-9, 16]。另有研究明确指出,从单篇论文粒度利用下载频次预测被引频次并不可行。也有学者提出,下载指标能否用于评价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还需深入研究^[7]。

2.3.3 建议将学术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都作为学术期刊综合评价的指标之一

张洋^[1]、王雅祺^[12]等认为文献与期刊的下载频次、被引频次这两个指标都应该在评估中相互参照并综合考虑其影响力。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1版)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13-2014)》中已经分别将“Web下载量”和“即年下载率”纳入期刊评价指标,与引文指标相比,权重系数偏小,分别为1%和5%^[17],但也显示了将论文下载频次作为单独一种指标进入期刊综合评价体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2.3.4 论文下载频次加入 Altmetrics 体系参与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

Altmetrics,一种新型的学术成果评价方法,强调用面向学术成果全面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来替代传统片面依靠引文指标的定量科研评价体系,其包含了被引量以外的被使用情况、被获取情况、被提及情况和社交媒介等^[20]。

国内的研究结果验证了Altmetrics将论文下载指标作为独立的单篇论文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目前已有研究者建立了类似Altmetrics的并将论文下载频次纳入单篇英文论文的动态评价体系^[21]。

3 基于论文下载频次应用的潜在研究方向

3.1 基于下载频次的期刊 h 指数研究

龚舒野基于下载角度提出了评价期刊的hd指数,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hd指数在学术期刊评价方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探讨了影响期刊hd指数的因素^[22]。学界可对hd指数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3.2 基于学术论文下载频次的图书馆服务新需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杨春华等认为下载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论文对用户的贡献即应用价值,应作为考量论文质量的标准之一;对高下载论文所揭示的用户需求,应充分重视并给予足够的关注,鼓励服务导向的研究^[23]。

郭强等认为期刊下载次数反映的是期刊的受利用程度,电子资源的购买与维护等成本需要与它的受利用程度相匹配,在不严格意义下可用下载次数来表征^[2]。

3.3 基于论文下载频次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研究

期刊论文在出版的早期会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突出表现为在短期内被大量下载^[22]。拥有高下载频次的论文,一般情况下能够说明该论文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从而能够从侧面体现学科目前的热点甚至是发展方向^[24]。高下载论文的研究主题属于研究热点及前沿话题,代表学科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最高的研究水平,因此获得了较高的用户关注度^[12]。如基于高下载论文的高关注即“热点”的特性,大连理工大学王贤文研究组利用论文下载数据辅以论文在社交媒体中的被关注信息,实时追踪探测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获得了满意的效果^[25]。

4 结语

通过对近10多年来国内有关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文献的分析,表明学术论文下载频次并非服从正态分布,将其视为连续型随机变量更为合适;论文下载指标也遵循布拉德福分布和齐普夫分布。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在期刊、机构、作者层次,论文下载频次与引用频次存在正相关,但在单篇论文层次上,较多的研究倾向于论文下载频次与引用频次间不存在

正相关或仅有弱相关;因此建议将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都作为学术论文综合评价的指标。

对学术论文下载指标研究方面,可考虑对不同数据源中下载数据特点与性质的实证研究、不同质量论文间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基于

高下载论文的“热点”特性,也可开展基于学术论文下载频次的图书馆服务新需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研究;基于全球科技竞争的需要,更可以开展基于论文下载频次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的新趋势探测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超值的知识服务。

参考文献:

- [1] 张洋.期刊Web下载总频次的布拉德福分布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6(6):38-42,60.
- [2] 郭强,赵瑾,刘思源,等.期刊下载次数的布拉德福分布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2):40-45.
- [3] 曹艺,王曰芬,丁洁.面向学术影响力评价的科技文献引用与下载的相关性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8):56-64.
- [4] 胡敏.期刊论文网络下载规律及与引文指标相关性研究[J].情报杂志,2012,31(4):14-18.
- [5] 王超,李书宁,李晓娟.期刊论文下载分布特征及其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2016,34(12):59-63.
- [6] 毛国敏,吴何珍,生冬梅.期刊论文下载次数的概率密度服从对数正态分布[J].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100-105.
- [7] 郭强,赵瑾,刘思源,等.科技论文下载次数的齐普夫分布特性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2):20-24,76.
- [8] 周燕子,平静波,胡德华.2005~2009年图书情报核心期刊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计量分析[J].情报探索,2011(2):40-43.
- [9] 刘影梅,万园园.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对比分析[J].情报探索,2015(7):42-46.
- [10] 庞景安.中文科技期刊下载计量指标与引用计量指标的比较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6(1):44-48.
- [11] 张小强.期刊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相关性:以中国知网CSCD与CHSSCD刊物为样本的计量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8):36-40.
- [12] 王雅祺.下载数与被引量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16.
- [13] 陆伟,钱坤,唐祥彬.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研究: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J].情报科学,2016(1):3-8.
- [14] 刘筱敏,张建勇.数字资源获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电子期刊全文下载与引用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1):60-63.
- [15] 杜秀杰,赵大良,葛赵青.学术论文的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分析[J].编辑学报,2009,21(6):551-553.
- [16] 丁佐奇,郑晓南,吴晓明.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4):467-470.
- [17] 周骥,余筱瑶,侯海燕.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相关性研究[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4):74-80.
- [18] 赵一权,王振民,熊文炳.科学论文的下载与引用关系研究:以ACM数字图书馆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6):818-823.
- [19] 郭强,等.利用期刊下载次数估计后期被引次数的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11):45-49.
- [20] 邱均平,余厚强.论推动替代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1):4-15.
- [21] 王贤文,等.连续、动态和复合的单篇论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8):37-48.
- [22] 龚舒野.下载频次角度的h指数研究:以图书馆情报学核心期刊为例[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98-101.
- [23] 杨春华,等.换个角度看服务:从下载量看图书馆学论文的价值与需求[J].图书与情报,2010(4):100-103, 111
- [24] 王佳佳.竞争情报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比较研究[J].情报探索,2011(9):16-18.
- [25] 王贤文,毛文莉,王治.基于论文下载数据的科研新趋势实时探测与追踪[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6):818-823.

作者简介: 楼海萍(1968—),女,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高级实验师,研究方向为医学情报咨询与知识服务,发表论文20余篇;潘杏梅(1956—),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建设、竞争情报服务与实践研究,发表论文20多篇;方红(1976—),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竞争情报研究、文献计量分析,发表论文10余篇;胡海翔(1978—),男,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情报、信息化;袁明捷(1984—),男,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数据分析。

收稿日期: 2018-06-29

基于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研究*

严贝妮 米雪 刘青青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文章在分析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应用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用户参与的数字图书馆馆员激励机制, 探讨了对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采用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意义, 提出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采用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具体措施: 拓宽渠道, 为用户与馆员交流提供平台; 给予用户实际评价权, 提高用户参与度; 设置专门意见栏, 为用户反馈信息提供便利; 设置用户分享功能, 将优质服务推荐给其他用户; 效仿微博功能, 为馆员建立粉丝群体。

关键词: 用户参与; 激励机制; 数字图书馆; 馆员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76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Evaluation of Digital Library Librarians based on Users Incentive Mechanism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s of user-involved incentive mechanis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librarians in digital library based on users participation.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user-participating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digital library librarians. Finally, suggestions on the use of user-participating incentive mechanism in digital libraries are offered. Channels are broaden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users to communicate with librarians. Actual evaluation rights are vested in users to increase engagement. A special comment column is set up to facilitate readers' feedback. User sharing functions are set up to spread high-quality services to other readers. Fan groups for librarians ar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microblogging.

Key words user participation; incentives mechanism; digital library; librarian evaluation

1 引言

知识经济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此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得到广泛关注, 而在数字图书馆的运营和建设过程中, 人才队伍的智力投入尤为重要。美国图书馆界认为, 在图书馆服务所发挥的作用中, 图书馆建筑占5%, 信息资源占20%, 而图书馆员工占75%^[1], 由此可见馆员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也成为图书馆运营的重

要组成部分。图书馆通过设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不断吸引人才、获取人才; 通过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激发馆员的工作热情、发掘馆员工作潜力, 使每位馆员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作才能, 从而提升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因为馆员的服务对象是用户, 用户的满意和激励是对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最大肯定。故数字图书馆可利用网络的实时性质, 将用户的反馈信息作为激励数字图书馆馆员工作热情、改善数字图书馆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本文系 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与实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6YJC870017)的研究成果之一。

2 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应用案例

随着服务行业的不断兴起,“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用户体验越来越得到重视,良好的用户评价不仅为许多服务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口碑,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直接增长。数字图书馆作为线上文化服务机构,为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积极鼓励用户参与到图书馆建设中来。但将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质量与用户评价相结合的图书馆较少,如何有效利用用户评价增强数字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黏性,可从一些现实案例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2.1 淘宝购物平台的用户评价功能

数据显示,淘宝网的用户高达近5亿,其平台一天购物的消费人员约有6 000万人,销售在线商品超过8亿元^[2]。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最重视的因素之一就是商品的用户评价,用户评价可以反映出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真实感观,从而体现商品各方面的综合性能,若商品各方面性能及性价比等均符合消费者的预期则会促成购买行为的发生。反之,消费者则不会购买该商品。

淘宝平台的商品推荐系统拥有较高的实用性,由于淘宝平台上商家的认证门槛较低、入驻商家良莠不齐,因而该系统致力于帮助用户快速挑选优质商品。它主要是通过淘宝后台操作,综合分析商品销量、人气、用户评价等要素^[3],以期帮助消费者快速挑选心仪商品。在该推荐系统下,评价好、销量高的店铺商品会优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故商品卖家尤其重视用户评价。为不断提升并保持好评率,卖家不仅要提高商品性价比,更要做好物流、使用说明、问题答疑等一系列售后工作。

2.2 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点赞、打赏、推荐功能

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有一技之长的用户通过视频等在线展示即可得到他人的关注,关注的人越多粉丝群体就越庞大。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平台拥有大批粉丝。

点赞、打赏、推荐等是网络客户端用户使用较多的功能,对自己欣赏的人、视频等都可以点赞、打赏,还可以推荐给好友共享。获得点赞、打赏未必会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但人们内心会迸发出被多数人肯定的自豪感,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2.3 滴滴出行平台用户评价功能

滴滴出行平台集多项业务于一身,其功能涵盖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及大巴等,它变革了人们传统的出行方式,为互联网时代下现代化出行提供创新思维方式。随着用户与入驻司机的不断增多,该平台已成为人们最常用的客户端软件之一。

滴滴平台十分重视用户体验,当乘客发出订单信息时会有多名司机同时抢单,系统会根据司机的接单量、用户评价等信息综合对比后优先将订单派发给服务水平较高的司机。因此,司机尤其重视用户评价。为获得乘客的五星好评,司机需努力做到车内整洁无异味、驾驶平稳、服务态度和善、行驶路线了然于胸等。

以上3个案例涉及网络购物、社交、出行等不同领域,但都非常注重用户评价。文化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更应该最大限度地优化用户体验。

数字图书馆服务虚拟性特点的存在会使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的态度、能力、质量的评估存在一定难度。其中,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存在实时服务效率低下、网页FAQ更新慢、馆员服务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图书馆管理者要想改变现状,必须积极采取应对策略。数字图书馆馆员的服务对象是用户,用户的满意和激励是对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最大肯定。图书馆对馆员的评价若能适当吸纳淘宝购物平台的商品评价机制以及微博、微信中的点赞、打赏、推荐功能,建立一套合理的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评价机制,那么该服务评价机制对激励数字图书馆馆员积极认真工作、提升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 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采用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意义

3.1 加深馆员与用户交流程度,提升服务水平

图书馆是为用户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的阵地,优质的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社会效益的集中体现。图书馆除了要定期对馆员进行思想教育外,还要增加用户与馆员之间的联系互动。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增强了用户对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的监督作用,用户通过自己体验到的服务对馆员服务质量进行中肯的评价。其中,积极肯定的评价是对馆员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鼓励,能够激励馆员为了维持服务质量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消极否定的评价则是对馆员的警示,提

醒馆员对工作进行反思,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储备,紧跟时代步伐,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用户对馆员服务的量化评价也有利于在馆员之间形成一种竞争机制。用户若能自行选择为其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员,自然会选择相对评分较高的馆员。这种竞争机制一旦形成,会成为提升馆员服务质量的巨大动力。

3.2 增加用户对馆员影响力度,切实区分馆员服务水平

图书馆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也不例外。数字图书馆免费为用户提供各项服务,服务的质量大都取决于该类馆员对工作的热情及其自身素质。长此以往,馆员的积极性和耐心容易被琐碎繁杂的工作所消磨,不利于图书馆的发展。若能将用户的作用合理纳入数字图书馆馆员激励机制体系中,增加用户与馆员之间的直接沟通与交流,一方面能够减少图书馆协调馆员与用户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能实实在在地改变馆员绩效考核现状,区分不同馆员的服务能力。这无疑有助于数字图书馆馆员激励工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绩效考核流于形式的状况,为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奖功罚过贡献一份力量^[4]。

3.3 为图书馆进行绩效考核提供参考,提升馆员服务积极性

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其内部职工结构较为稳定,较少因人事变动影响既定工作的实施,保证了图书馆工作的延续性。但同时也容易导致部分员工滋生懒惰怠工的情绪,工作效率较低,员工自我提升意识淡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图书馆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服务范围都在不断变化,对图书馆员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在此情形下,图书馆除定期对馆员进行培训外,还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不断挖掘馆员潜能、完善服务、提高绩效,推动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虽形态各异,能明确相关工作具体要求的为量化指标,但诸如思想品质、工作态度等抽象内在的个人特质则难以衡量^[5]。数字图书馆通过网络为用户和馆员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用户对馆员的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馆员的服务质量及工作态度。若计算出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的好评比例,将其纳入到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通过一定的加权运算,将其作为衡量馆员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一个量化指标,可以为图书馆考核馆员绩效提供参考,提升馆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4 不断改进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形成竞争优势

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组织,其服务对象——用户的意见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用户对馆员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不仅显现出馆员的问题,也折射出图书馆数字资源本身的问题。数字图书馆自身的建设问题不是某个馆员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对数字图书馆发展作总体规划。故图书馆不可将用户的差评全部归咎于馆员,要认真对待用户的每一条评价,分析差评产生的原因,查清问题的根源。图书馆应听取用户建议,不断改进和调整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人力、资金和精力投入。首先,用户向馆员反映数字图书馆相关问题,馆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其次,相关部门共同商讨图书馆资源构成;最后,得出应对措施,以期改进和完善数字图书馆馆藏结构和服务功能^[6]。以此来扩大资源来源、优化服务体系,使图书馆服务不断满足用户的预期,即在用户心中留下认真、负责、用心的良好形象,则可在服务、口碑、硬件设施上领先其他数字图书馆,形成竞争优势。

3.5 提升数字图书馆在用户心中的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迫切要求,也是馆员做好服务工作的关键。数字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可能因馆藏或技术等原因一时无法达到满足所有用户信息需求的水平,但馆员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由于理念和决心是指导馆员行为的动力。技术、馆藏等硬件上的问题存在多方面的制约因素,虽不可能立刻解决,但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丰富、优化和完善。图书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吸纳和接受用户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使用户得到心理满足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双重自豪感,以此来提高用户献计献策的热情。数字图书馆重视用户评价,努力提升馆员的综合能力,不断满足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期待,从而增加图书馆服务在用户心中的好感,提升数字图书馆在用户心中的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4 数字图书馆馆员评价实施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的具体措施

4.1 拓宽渠道,为用户与馆员交流提供平台

数字图书馆馆员通过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服务,

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特征容易导致用户与馆员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馆员与用户均是通过网络联系彼此,前者了解用户提出的问题,后者获得馆员给出的解决方案,但不管哪一方,在从网络上获取信息时都对信息进行了基于自身知识储备的加工理解。双方的教育背景、对图书馆使用信息的了解情况等不尽相同,就容易产生理解上的误差,这就是用户需求得不到及时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图书馆有必要加强馆员与用户的沟通。图书馆可在官方网站上提供馆员实时在线服务,通过点击弹出对话框进行语言交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若馆员无法明确用户所陈述的问题时可由馆员发起语音视频通话,通过网络“面对面”交流明晰用户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此外,图书馆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升级微博、微信等“微服务”平台的功能,确保用户能够通过“微”平台提出问题,也能通过“微”平台轻松获得反馈。考虑到网络反馈具有难以避免的时延性,数字图书馆可在特定时间段内为用户提供热线电话服务,以便及时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4.2 给予用户实际评价权,提高用户参与度

若要通过用户参与的办法激励数字图书馆馆员服务的积极性,就要增加用户参与的力度给予用户更多的权利。图书馆可从两个方面提高用户的参与度:①评价。用户在体验馆员提供的服务之后可对馆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进行打分,最高10分,最低1分,并可追加评语、阐明打分的依据及给出的建议。②筛选。在有一定评价量的基础上,每一位馆员的得分情况都不会完全相同,用户可根据馆员的得分情况及用户评价情况选择自己心仪的馆员为其提供服务。图书馆可以月份为单位,对在一个月服务用户次数较多的馆员进行额外奖励,而对在一个月服务用户次数较少的馆员给予适度的惩罚。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能够改善用户在图书馆服务中的被动地位,督促馆员不断创新,为获得用户的满意与肯定而积极认真工作。

4.3 设置专门意见栏,为用户反馈信息提供便利

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多种多样,向用户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一直是各图书馆的服务宗旨。若服务主体无法明确用户需要什么,则不能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而用户的反馈能够为图书馆未来发展提供参考,符合图书馆自身发展需要。通过用户的反馈,图书馆可以清晰了解用户需求、现存的问题及不足等,从

而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放矢地为用户提供服务。此外,由于用户获取电子资源越来越便捷,在与众多的电子书运营商进行竞争时,数字图书馆并无绝对优势。数字图书馆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只有主动服务并了解用户相关的信息需求^[7]。因此,数字图书馆有必要设置专门的反馈意见栏以倾听用户心声,鼓励用户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献策。若图书馆建设能够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用户需求,则图书馆员也能形成一种组织上的认同感、职业上的自豪感,激发馆员为维护组织声誉而尽心尽责工作。

4.4 设置用户分享功能,将优质服务推荐给其他用户

数字图书馆需要向用户推荐图书馆的优质服务 and 优质资源。单纯以图书馆作为推荐主体,用户的重视程度较低且推荐效果不够明显。图书馆对于推荐时间和推荐频率的把握尤其重要,推荐的时间与频率不当会使推荐的内容被用户忽视或遗忘,推荐频率过高又容易引起用户反感。图书馆可引用微博、微信、QQ等的推荐分享功能,由用户将心仪的产品、服务甚至优秀的图书馆员推荐给其他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进行分享的优势就在于用户间的分享是建立在亲朋好友之间的,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做依托,很容易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也更容易接受。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智力产品,可以设置一键分享功能向其他用户进行推荐。

4.5 效仿微博功能,为馆员建立粉丝群体

移动社交平台的发展为粉丝群体提供言论空间,由于其言论自由、交流方便,大大增强了粉丝群体的影响力,粉丝群体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群体^[8]。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虽不需要通过粉丝获得一定收益,却可以通过粉丝的数量提升图书馆的声誉。尤其对于数字图书馆馆员而言,可以通过网络吸引用户群体,通过自身服务质量及人格魅力使用户成为自己的忠实粉丝。用户可以通过成为馆员的粉丝关注馆员动态,随时向馆员咨询图书馆相关信息。对于馆员来说,粉丝的数量是馆员服务质量的一种体现,馆员可以由此获得职业认同感,从而增强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以及职业自豪感。这对于数字图书馆馆员尤其是进行公益性服务的馆员来说会是相当大的激励。

5 结语

用户参与的激励机制对开展数字图书馆馆员激励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书馆可根据自身实际运营情况尝试将用户的意见纳入对馆员进行考核、评价及激励的体系中。但图书馆在运用过程中必须明确意识到图书馆拥有众多服务部门,而各服务部门未必都有机会接触到用户,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

适合采用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所以,图书馆要根据馆员工作部门和工作职能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同时,图书馆在实施用户参与式激励机制时要提前做好统筹规划,考虑到方案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做好预案,为方案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陈文.北京数字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J].商场现代化,2011(10):101-102.
- [2] 王惟源.结合网络口碑相关理论探究“网红+淘宝”的营销模式[J].现代商业,2018(2):29-30.
- [3] 李永胜.基于淘宝网的用户评价的商品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长春:吉林大学,2015.
- [4] 黄俊婷.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的绩效评估[J].黑龙江档案,2013(3):158.
- [5] 张倩颖,马路.高校图书馆员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4(2):11-15.
- [6] 姜博.移动数字图书馆馆藏特色信息资源知识库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7(1):12-14.
- [7] 王义翠,杨萍.公共图书馆读者需求反馈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论坛,2014(2):7-10.
- [8] 欧阳星.浅析粉丝经济对电视媒体的影响力[J].新闻研究导刊,2017(2):86

作者简介: 严贝妮(1980—),女,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米雪(1992—),女,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刘青青(1995—),女,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 2018-08-09

(上接第16页)

个公共图书馆体系,按照统一的标准建设并提供服务,让农村的居民可以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图书馆服务。在标准的指导下,嘉兴不仅实现了乡镇分馆的全覆盖,而且从2014年开始乡镇分馆改造升级工程,落实经费、提升空间舒适性,并形成专门的儿童阅读空间。同时升级硬件设备,以数字化为核心,增设

RFID自助借还系统、电子书借阅机及数字阅读体验区、触摸式电子屏、小舞台及音响设备等。在场馆、设施设备升级改造的基础上,乡镇图书馆实现了服务功能升级,总分馆联动开展了儿童阅读推广、数字阅读体验等活动,真正做到了以标准化促均等化,切实推动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国家示范区创建的实施意见:嘉委发[2015]15号[A/OL].(2015-10-10)[2018-08-28].http://www.cnjxol.com/gov/jxwhw/sfqcj/content/2015-10/10/content_2587326.htm.
- [2] 嘉兴市文广新局.关于印发《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的通知:嘉文[2015]43号[A/OL].(2015-06-04)[2018-08-28].http://www.jiaxing.gov.cn/swhj/zewj_6120/gfxwj_6121/201506/t20150604_497844.html.
- [3] 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服务规范:DB3304/T032-2017[S/OL].(2017-05-15)[2018-08-28].<http://www.doc88.com/p-4425004383920.html>.

作者简介: 孙云倩(1989—),女,嘉兴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图书馆标准化建设。

收稿日期: 2018-05-04

· 探索与创新 ·

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及激励策略研究

袁 焯 孙瑞英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通过对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找出在无激励条件下信息资源供给产生的问题。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囚徒困境”模型,对图书馆联盟资源供给中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进行博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发展的激励策略。

关键词: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博弈分析;激励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9.23

文献标识码:A

Game Analysis and Incentive Strategy Research on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Library Alliance

Abstract Through the game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of library alliance, the paper finds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supp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incentive. The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of public goods supply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game choice of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in the library alliance resource supply. On this basis, the incentiv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lliance are proposed.

Key words library allianc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game analysis; incentive strategy

1 引言

图书馆联盟是指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受共同认可的协议和合同制约的图书馆合作组织与机构^[1]。该机构于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20世纪在我国得到飞速发展,综合性、区域性、行业性图书馆联盟相继成立。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图书馆联盟已成为各类型图书馆(高校、公共、专业)之间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最有效的方式^[2]。依据齐普夫定律的“最省力法则”^[3]可知:图书馆联盟在信息资源共享中,联盟成员作为理性人必然希望自身最省力,更倾向于使用较少的己方资源来完成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联盟任务,联盟成员这种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作为策略选择依据的最省力的态度和做法必然造成联盟资源的缺失与浪费,与图书馆联盟成立的宗旨——信息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相违背。当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借用

博弈论理论与模型分析图书馆联盟的研究状况。如袁丽芬借助“狩猎博弈”对张家港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建立与运行进行了实证研究^[4]。张路路等利用演化博弈探讨了成本、收益、风险三要素对图书馆联盟的影响^[5]。李静等借用“囚徒困境”模型对不同规模和实力的图书馆建设进行博弈分析^[2]。本文基于前者的研究,通过建立“囚徒困境”中公共物品供给模型,来分析联盟成员在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中的矛盾,探讨联盟成员选择“最省力”策略的原因,找出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应的激励策略。

2 无激励条件下联盟成员信息资源共享的“囚徒困境”

图书馆联盟是由多个馆际自发成立的,在该机构中,虽然各图书馆共同签订联盟合约,合约规定了联盟成员的共同利益或目标,且该目标的实现会帮助成

员获得单独图书馆无法获取的利益。但由于我国图书馆联盟多采用理事会制度,联盟机构无法对联盟成员进行真正的约束,更无法强制联盟成员对联盟的贡献程度。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表明:只要群体中的某个个体不被排除在分享既存利益的范围之外,那么,他便可能缺乏为群体的利益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动机^[6]。当前我国图书馆联盟尚未根据成员的贡献程度来划分利益的归属,无法将“不作为”图书馆排除在分享联盟共同利益的范围之外。因此,每个联盟成员作为理性人始终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自己的策略,而不会考虑整个联盟的集体利益。因为无论对联盟信息资源的建设贡献大小与多少,联盟成员均会获得联盟的共同收益,而对联盟作贡献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所以,联盟成员会选择投入或投入策略。如果每个联盟成员都选择不投入或少投入策略,减少对联盟作贡献,联盟的信息资源的供给就会不足,甚至枯竭,导致整个联盟无法正常运行。这将直接降低整个联盟的收益,并同时使每个联盟成员的收益降低,出现“囚徒困境”现象,导致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法确保定期更新,严重影响联盟的正常运行,进而无法为用户提供有效和可持续的服务。

3 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在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中,联盟成员通过选择提供或不提供策略来最大化己方的收益。而博弈论作为一种对策论,正是用来分析理性人策略互动和策略选择的适用工具,应用博弈论可以探究出图书馆联盟成员选择“最省力”策略的原因,进而提出可行性的激励策略。

3.1 “囚徒困境”模型建立

“囚徒困境”,其原文为 The Prisoner's Dilemma,又译为囚犯难题、囚犯的两难困难等。该“困境”在1950年由社会心理学家梅里尔·M·弗勒德和经济学家梅尔文·德雷希尔首次提出^[2]。后来,艾伯特对这种“困境”进行了准确的阐述,该模型反映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由于公共物品(如国防、道路、桥梁等)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7],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容易出现“囚徒困境”。例如,在一个由甲、乙两家组成的村庄中要修一条路,甲、乙两家都可以选择出力修路与不出力修路两种策略。如

果两个人都出力,每人分担修路成本2,可以修好路,扣除成本后的收益为1;如果两人都不出力,则修不成路,每个人的收益为0;如果一个人出力,另一个人不出力,则出力的人由于承担全部修路成本4,其净收益为-1,不出力的净收益为3,具体收益如图1所示。

		甲	
		出力	不出力
乙	出力	1, 1	-1, 3
	不出力	3, -1	<u>0, 0</u>

图1 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矩阵

在这个修路博弈中,占优战略均衡是每个人都不出力。即,不论别人出不出力,双方都选择不出力为最优策略,(不出力,不出力)为二者的唯一纳什均衡点,且符合理性人的选择。由此我们看到:在个人意愿基础上的均衡意味着没有公共产品的提供,即公共产品供给出现“囚徒困境”。

3.2 博弈结果及启示

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非常相似。在没有联盟强有力的约束与激励政策下,联盟成员作为理性人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均会选择信息资源不提供策略。此“困境”的出现,不仅无法完成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任务,对联盟整体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对自身也造成较大的利益创伤(无法共享联盟信息资源整合后的成果)。

联盟成员间的博弈分析,具体如下:假设某图书馆联盟由实力相当且理性的图书馆1与图书馆2构成,但分析结果可以类推到n个图书馆参与的图书馆联盟的博弈中^[8]。图书馆联盟需要联盟成员向联盟供给己方已有资源以满足用户需求。如果图书馆1与图书馆2都提供智力资源,图书馆联盟可以顺利完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任务,此时,每个联盟成员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为T;如果二者均不提供智力资源,联盟调用原有资源,每个成员净收益为P;如果一方提供,另一方不提供,提供方净收益为S,不提供方净收益为R,且 $R>T>P>S$ 。图2为成员之间博弈的支付矩阵。

		图书馆1	
		提供	不提供
图书馆2	提供	T, T	S, R
	不提供	R, S	<u>P, P</u>

图2 成员提供资源的博弈矩阵

在此博弈中,对于图书馆1,无论图书馆2提供或

不提供智力资源,其选择不提供具有相对优势($R>T$, $P>S$)。同理,对于图书馆2的占优战略也为不提供。因此,占优战略均衡是每个馆际都不提供。即:(不提供,不提供)为图书馆1与图书馆2的唯一纳什均衡点,且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图书馆联盟中,在尊重联盟成员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均衡等同于没有信息资源的提供。因此,必须研究图书馆联盟资源供给的激励机制,确保联盟成员提供信息资源的收益大于不提供的收益,这样才能破解“囚徒困境”,促使图书馆联盟资源供给正常进行。

4 破解联盟成员信息资源共享“囚徒困境”的激励策略

4.1 建立利益补偿制度

帕累托最优是判断决策和评价制度的一个有效的经济学标准^[9],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10]。在图书馆联盟中,图书馆与图书馆间的博弈造成资源供给的“囚徒困境”,此时,双方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对联盟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我们需要设置一种激励制度,促使成员主动提供己方的信息资源,同时确保联盟机构整体的收益,使得联盟机构与联盟成员都达到满意的结果。“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由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提出的一种经济补偿理论,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只要所获得的收益足够补偿同一资源重新配置中受损群体的收益,而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么这种配置就是有效的^[11]。“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指导我们:可以运用有效的经济补偿方式来破解图书馆联盟资源供给的“囚徒困境”。图书馆联盟要设立利益补偿制度,对贡献大的联盟成员所做出的贡献进行利益补偿,进而调动联盟成员信息资源供给的积极性。假设某图书馆联盟设有利益补偿制度,规定:联盟成员如果能够有效地完成联盟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任务,提供信息资源,将联盟的一部分收益N奖励给参与的图书馆,只要N足够大,即补偿的力度足够大,就能确保图书馆选择提供资源策略的收益大于不提供资源策略的收益。那么,联盟成员之间的资源供给博弈就转化为图3所示的博弈矩阵。

		图书馆 1	
		提供	不提供
图书馆 2	提供	T+N, T+N	S+N, R
	不提供	R, S+N	P, P

图3 利益补偿下的博弈矩阵

在此博弈中,对于图书馆1来讲,选择提供策略为最优战略($T+N>R$, $S+N>P$)。同理,对于图书馆2选择提供策略具有战略优势。因此,(提供,提供)是纳什均衡。如果高校智库联盟能够设立完善的利益补偿制度,那么就可以缓解图书馆与联盟机构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此时,既推动了信息资源的更新,又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同时还能保证提供信息资源供给的联盟成员的利益。进而建立起良好的内部激励机制,推动图书馆联盟的可持续发展。

4.2 形成联盟内部的约束机制

图书馆联盟机构具有共建性、开放性的特征^[12]。理事会制度是当前多个图书馆联盟均采用管理模式。该模式组织结构较为灵活,但对联盟成员缺乏约束效力。通过图书馆联盟成员提供资源的“囚徒困境”分析可知:图书馆联盟成员存在提供己方信息资源收益小于不提供信息资源的收益,要避免图书馆联盟成员“不作为”,联盟机构需要建立贡献考评和约束、惩罚机制。第一,明确联盟成员的责任与义务。确定可考评的贡献绩效标准,形成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第二,建立奖励与处罚机制。对达到考评标准的联盟成员予以奖励(包括经济奖励和精神奖励等),对没有达到考评标准的联盟成员予以处罚,如物质惩罚、行政处理、舆论谴责等^[13]。通过处罚来纠正采取不参与策略的图书馆的错误行为。第三,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应包括两部分内容:①对参与联盟任务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核算。通过核算,一方面掌握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的整合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情况,另一方面为实施利益补偿制度做好信息统计工作。②对利益补偿制度进行监督。监督机制设立的作用在于:确保利益补偿制度的顺利进行,并对联盟工作中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调节。通过建立内部约束行为,诱导图书馆选择积极为联盟工作,完成联盟任务,避免出现“囚徒困境”现象。

4.3 实施严厉可信惩罚战略

图书馆联盟在我国也有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因此,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工作任务是一个长期过程,图书馆与图书馆间的博弈是一种重复博

弈。重复博弈之所以会出现合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者担心不合作带来的惩罚。综上,如何建立一种鼓励合作的惩罚战略,是破解联盟成员在重复博弈中产生“囚徒困境”的出发点。严厉可信战略是指当发现对方不合作行为时,对于对方的惩罚期限足够长、力度足够大,同时对实施处罚的人是最优的^[14]。例如,图书馆1与图书馆2共同执行联盟信息资源共享的任务,且两馆际已商定均采取提供策略。但图书馆2出现突发情况违背约定,选择不提供策略。假设图书馆1已知图书馆2在上次任务中的策略选择,那么图书馆1就可以对图书馆2以3倍的处罚力度进行惩罚。此时,馆际乙选择违背的总收益为违背一次得到的收益R加上未来的3次惩罚得到的收益 $P + P\delta^2 + P\delta^3$ (δ 为贴现因子),即 $R + P\delta + P\delta^2 + P\delta^3$;始终选择提供信息资源的馆际收益为: $T + T\delta + T\delta^2 + T\delta^3$ 。现假设该图书馆联盟

已实施严厉可信惩罚战略,并确保始终选择提供信息资源的馆际收益大于中途违背约定的馆际收益,即: $T + T\delta + T\delta^2 + T\delta^3 > R + P\delta + P\delta^2 + P\delta^3$,那么图书馆联盟成员就会始终选择提供策略,放弃中途违背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图书馆联盟严厉可信惩罚战略的实施,不一定需要无限期的惩罚,而是需要惩罚期限足够长且惩罚力度足够强。

5 结语

图书馆联盟在信息资源共享中,如果不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出现联盟成员资源供给的“囚徒困境”。通过博弈分析探究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利益补偿制度、内部约束机制以及严厉可信惩罚战略等激励策略,必将对促进我国图书馆联盟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并助力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 崔萌.图书馆联盟成员馆间信任关系的培育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5):20-23.
- [2] 李静,井水.囚徒困境视角下的图书馆联盟实施策略研究[J].情报探索,2014(6):119-121.
- [3] 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112.
- [4] 袁丽芬.博弈论视角下大学城图书馆联盟实证研究:张家港大学城图书馆联盟成功运行案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31(6):27-29.
- [5] 张路路,黄崑.基于演化博弈的图书馆联盟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6):4-7.
- [6] 奥尔森.集体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4-26.
- [7]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0.
- [8] 孙瑞英,马海群.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及管理机制设计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9(2):40-44.
- [9] 吕阳,孙瑞英.信息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囚徒困境”及其破解策略研究:以Google数字图书馆为例[J].情报科学,2016,34(11):42-48.
- [10] 曾彩凤.数字图书馆版权利益的冲突与平衡[J].图书与情报,2009(5):88-91.
- [11] 陈伟斌,张文德.基于利益平衡的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补偿原理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19):92-96.
- [12] 许军林,蒋玲.异质性区域图书馆联盟探索:基于以高校为主体的地方图书馆联盟模式[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33(8):38-41,46.
- [13] HAUSKEN K.Cooperation and Between-Group Competi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0(42):417-425.
- [14]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8.

作者简介: 袁焯(1995—),男,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分析与情报服务;孙瑞英(1970—),女,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已发表论文80余篇,研究方向为竞争情报、知识管理。

收稿日期: 2018-08-09

· 探索与创新 ·

美国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实践及启示

王占梅

(天津市滨海新区图书馆 天津 300450)

摘要: 美国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引导图书馆通过夯实馆员能力建设、提供识别虚假信息的资源与工具、实施多元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少年提升媒介信息素养, 应对虚假信息。这些实践对国内图书馆开展青少年信息服务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国内图书馆应意识到参与提升青少年媒介信息素养的必要性; 夯实图书馆员多元素养能力的培育体系; 设计针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青少年素养提升项目; 强化图书馆青少年素养培育项目的评估。

关键词: 青少年信息服务; 虚假信息; 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

中图分类号: G250.712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American Libraries' Practice on How to Protect Youth from False Information

Abstract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 Association in America leads libraries in helping teenagers improve their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dentify false information by building librarians' ability in providing resources and tools and implementing multiple projects. These practices offer domestic libraries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o develop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eenagers: libraries in China shoul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helping improve teenagers'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se libraries need to enhance the system of cultivating librarians' multiple literacies, they also need to design literacy improving projects for teenagers, which aim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finally they must 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of these projects.

Key words you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alse information;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 Association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图联”)最新发布的《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17年新进展》提出了3个问题: 图书馆如何将革命性的3D打印技术融入服务; 图书馆如何解决全民教育的迫切需求; 网络虚假信息泛滥, 图书馆如何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帮助用户应对虚假信息^[1]。同样,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盘点的美国图书馆界2017年度事件中, 图书馆打击虚假新闻再次上榜。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信息信任体系的崩塌问题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虚假信息的误导对真实世界造成巨大影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针对成年人一项调查显示, 有64%的被访者认为“完全编造的新闻”已经造成对“当前事件基本事实”的极大混淆^[2]。皮尤研究中心另一项针对科技工作者、学者、网络信息从业者和战略思想家的调查显示, 专家们对于在未来十年真相能否战胜假新闻是喜忧参半的,

但无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 所有被访专家均认为, 虚假信息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通过针对所有年龄段人群开展数字时代的新的读写能力教育, 确保公众具备新的媒介和信息的读写与识别能力, 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从而帮助公众识别虚假信息, 提高整个话语环境的基调, 是应对网络虚假信息泛滥问题的根本途径^[3]。由此, 网络虚假信息问题将媒介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带入了全球性的讨论。青少年群体是最易遭受虚假信息影响的群体之一, 因此, 美国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呼吁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分辨虚假信息, 培育其新时代的信息读写和识别能力。

1 美国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起源及发展

美国图书馆协会下设的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 Association, 简称YALSA)是专门针对青少年开展服务的机构。YALSA以培育青少年学习能力、促进个体发展为本使命,为达到该目标,YALSA呼吁公民积极响应参与青少年文化,引导图书馆了解青少年的学习过程,强调青少年素养(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育,通过信息、技术、空间、活动资源的提供,支持其在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为青少年发展创造富有成效的平台和机遇。在YALSA的引导下,美国图书馆日益形成以青少年需求为中心、重构面向青少年服务和空间的项目设计思维。2014年,YALSA发布的《青少年图书馆服务的未来:行动起来》调查报告指出,面向全球化与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青少年需要具备超越传统的一组素养技能,包括:学习和创新技能(即创造力和创新、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沟通和协作)以及信息、媒体和技术技能(即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和ICT素养)^[4]。这意味着,要实现青少年服务的战略转型,未来图书馆必须超越信息素养朝着涵盖媒介素养和其他素养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的一个最基本层面体现为人们对信息特别是网络信息的评估、识别能力,而斯坦福大学一项针对“公民在线判断”能力的调查显示,其在校本科学生很难辨认社会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and 公正性。因此,在虚假信息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日益引发全球性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图书馆界开始寻求突破。2017年2月,YALSA举办了以“利用媒介素养遏制虚假信息传播”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邀请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青少年服务馆员及其他专业人士共同探讨如何帮助青少年更好应对网络虚假信息这一问题^[5]。2017年7月,YALSA正式发布《青少年素养工具包》,帮助青少年在学习如何应对虚假信息过程中提升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及数字素养^[6]。标志着美国图书馆界正逐步建立帮助青少年筛除虚假信息、提升新素养技能的系统性、规范化路径。

2 美国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主要做法

2.1 以馆员能力建设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

信息时代的发展呼吁人们新素养、新技能的形

成,无论是从馆员个体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帮助青少年获得进入就业市场关键技能的角度来看,数字素养、媒介素养等已然成为图书馆员必备的能力素养。因此,夯实馆员关键能力素养建设是图书馆帮助青少年提升媒介素养,使其成为具有辨识能力的新闻消费者的必经之路。为强化馆员能力建设,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共项目办公室与石溪大学新闻素养中心合作培训公共图书馆员,指导馆员通过创建Media Literacy@Your Library在线学习平台培育公众新闻素养;YALSA“利用媒介素养遏制虚假信息传播”主题研讨会促使青少年服务馆员进一步认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重要性,并达成以下学习目标:①了解如何通过寻求线索和简单提问确定报告中存在的偏见;②通过虚假新闻案例学习懂得假新闻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和意见;③学习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工具和活动^[5]。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及YALSA的引导下,各图书馆纷纷开辟馆员媒介素养、数字素养建设的新途径,激励馆员在不断学习、研讨及实践过程中,深入反思青少年媒介素养培育策略,通过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的教学使得青少年学会以批判性的思维来识别信息真伪,反思媒体对其态度、信念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2.2 提供学习识别虚假信息的资源和工具

在虚假信息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今天,美国的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增设课程,教导学生如何辨别假新闻,配合学校教学,一些图书馆开始以专题资源或工具包形式向青少年传授识别虚假新闻的常见策略和技巧。以斯科基公共图书馆“了解虚假信息”专题资源为例,其向青少年推荐的虚假信息识别技巧包括:①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如搜索框下的新闻标签)来过滤结果;②警惕网站上或文章周边出现的“受赞助的内容”链接,这些广告性质的内容通常是虚假的并将你带到其他网站;③使用搜索引擎查看作者,找到资料最原始的出处,并查看源网站上其他内容;④安装能够提供附加信息帮助检索人识别新闻有效性及偏向性的浏览器插件(扩展应用程序),如AdDetector、B.S. Detector、FiB等;⑤使用图书馆购买的新闻产品或通过图书馆网站找到经图书馆认证筛查的有信誉的主题信息来源,如Factiva、Lexis-Nexis、PressReader、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⑥向馆员征询信息源可靠性的相关意见^[7]。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如何发现虚假信息”专题则全方位地从什么是虚假新闻、虚假新闻和社交媒体、如何发现虚假新闻(5W原则: Who, 针对作者或自媒体的背景调查; What, 文章是否提供全面观点和事实; When, 文章出版时间; Where, 信息是否来自官方正规网站; Why, 为何发布该信息, 出于销售、娱乐、说服或其他目的)、检测虚假新闻的专业网站、图书馆特色馆藏工具书(如《芝加哥事实检测指南》《媒介素养: 批判地思考互联网》)、附加资源6个层面出发, 向青少年提供学习识别虚假信息的资源和工具^[8]。

2.3 设计实施提升青少年信息识别能力的多元项目

理论的启迪和疏导还不足以让青少年得到信息识别、筛选能力的质的提升与锻炼。在活动中接受再培训、在实践中接受再教育是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实现信息识别能力高效提升的有力途径。因此,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及YALSA引导下, 各图书馆纷纷开始设计实施指导青少年正确应对虚假新闻的实证项目。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在其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破解系统打击虚假新闻”项目, 邀请青少年利用活动中心的电脑、数字化工具和其他资源开发建立自己的应用程序, 通过标识、过滤、警报打击虚假新闻, 使得人们更加相信其正在阅读的信息。奥克兰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合作开设“制止虚假信息”研讨会项目, 该项目邀请高校馆员及信息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导师, 在交流互动及实证演练中传授青少年检索策略和阅读策略, 通过青少年阅读素养、媒介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帮助其更好应对网络上的各种媒介信息^[5]。还有一些图书馆专门设计有面向青少年的数字素养宾果游戏, 根据YALSA《青少年图书馆服务的未来: 行动起来》报告的介绍, 游戏中的玩家将利用图书馆资源完成诸如“在推特上查找你所崇拜的人”“使用不同搜索引擎检索同一术语, 比较检索结果”“使用诸如Popplet的在线工具创建思维导图”“编辑维基百科”^[5]等游戏任务, 在适应性、趣味性的游戏过程中得到自身信息识别、筛选能力潜移默化的提升。

3 启示

3.1 国内图书馆参与提升青少年媒介信息素养的必要性

青少年是中国网民的主流群体, 网络信息对青

少年知识体系和未来工作能力构建正日积月累地产生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 青少年是否拥有认知、识别、使用、创新信息的能力, 不仅关系到其个人的发展, 更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命运^[9]。图书馆的功能在于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 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信息社会中, 公众基本文化权利和文化素养较为集中地体现为一种信息的权利以及与寻求、获取、认知、使用、创造信息活动相关的一组技能和素养。有专家认为, 在当前信息环境中, 媒介信息素养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制造者”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青少年趋向于认可和相信所有他们看到的、读到的和听到的(而缺乏对信息的辩证性思考和筛选使用的过程),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此, 通过帮助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媒介信息素养从而保证其基本文化权益和科学文化素养, 是图书馆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国内图书馆应超越信息素养朝着帮助青少年提升媒介素养、批判思维能力、创新素养、协作能力等核心素养和技能的方向迈进。

3.2 夯实图书馆员多元素养能力的培育体系

图书馆是社区重要资源, 图书馆员是帮助青少年提升包括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等在内的多元素养的重要生力军。为培育符合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具备多元素养的综合型人才, 图书馆需要通过与学校、文化机构、科研机构等社区力量合作, 通过图书馆员、教师、教育专业人士等专业技能和素养的运用, 为学生提供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融合、永续连接的学习空间。因此, 围绕馆员能力建设, 夯实馆员多元素养培育体系是图书馆首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 图书馆应通过举办图书馆论坛、主题研讨等形式引导馆员围绕多元素养开展深入而持久的学习和讨论, 在讨论中深化馆员对多元素养的理解和认知, 鼓励馆员将更新的认知运用到馆藏、空间以及青少年活动项目的设计实践中; 建立自身在社群内部强有力的联系, 通过合作开展项目为馆员提供更多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鼓励馆员在扩大范围的交流和协作中实现多元素养和技能的提升。

3.3 设计针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青少年素养提升项目

信息过剩摧毁了人们注意力持续时间, 注意力经济的巨大变化滋生的虚假新闻问题严重影响着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YALSA以社会虚假信息问题为切入点,帮助青少年通过具体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实现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提升的这一创新举措值得国内图书馆学习和深思。大量事实证明,与真实工作和生活环境联系更加紧密、更具实际操作性和现实性问题解决意义的学习体验,能够充分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性,并产生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因此,国内图书馆青少年素养培育项目同样需要为青少年创建融合实际的真实学习机遇和学习体验,以解决具体问题、创建具体内容产品等为导向,以强大的资源(包括馆藏、数字化设备/工具、导师等)为基础和保障,引发青少年自主性的学习和探究以及持续性的思考和求证。使得青少年在不断的思考、探究中构建思维体系,习得相应技能,实现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的有效提升。

3.4 强化图书馆青少年素养培育项目的评估

无论是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新闻的项目,还是其他嵌入式的图书馆培训项目,最终目的在于青少年素养能力的提升,而图书馆所实施项目是否达到既定目标,实施过程中需要何种调整和改进,都需要通过评估来实现。因此,为确保青少年素养培训工程在既定实施范畴内获得最优化的成果,图书馆需要确立完善与之相配套的素养(尤其是媒介信息素养)评价体系,并在体系的确立完善中掌握以下原则:①开发并实施一套平衡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阶段性评价的评价系统^[10],通过形成性评价和阶段性评价对青少年素养培育的全过程开展持续的观察与记录、反思与调整,不断提升青少年自我调控、主动学习的能力;通过终结性评价考核项目实施效能,向社会展现图书馆的价值。②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③建立区分评估对象、差异化的评估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 [1] IFLA. IFLA Trend Report 2017 Update[EB/OL].[2017-12-23].https://trends.ifla.org/files/trends/assets/documents/ifla_trend_report_2017.pdf.
- [2] Pew Research Center. Many Americans Believe Fake News Is Sowing Confusion[EB/OL].[2016-12-15].<http://www.journalism.org/2016/12/15/many-americans-believe-fake-news-is-sowing-confusion/>.
- [3]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Truth and Misinformation Online[EB/OL].[2017-10-19].<http://www.pewinternet.org/2017/10/19/the-future-of-truth-and-misinformation-online/>.
- [4] 图书馆阵地服务工作动态扫描2014年第1-2期[EB/OL].[2014-03-19].http://ir.las.ac.cn/handle/12502/6720?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 [5] YALSA. Using Media Literacy to Stop the Fake News Cycle[EB/OL].[2018-02-16].<http://www.ala.org/yalsa/using-media-literacy-stop-fake-news-cycle>.
- [6] YALSA. Teen Literacies Toolkit[EB/OL].[2017-07-08].http://www.ala.org/yalsa/sites/ala.org.yalsa/files/content/TeenLiteraciesToolkit_PRINT.pdf.
- [7] Skokie Public Library. Understanding Fake News[EB/OL].[2017-12-21].<https://skokielibrary.info/blog/88/understanding-fake-news/>.
- [8] Toronto Public Library. How to Spot Fake News[EB/OL].[2018-03-19].<https://www.torontopubliclibrary.ca/spotfakenews/#library-resources>.
- [9] 高钢.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EB/OL].[2017-12-16].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12/16/nw.D110000gmrb_20131216_1-16.htm.
- [10] 邓莉, 彭正梅. 通向21世纪技能的学习环境设计: 美国《21世纪学习环境路线图》述评[J]. 开放教育研究, 2016(10):11-21.

作者简介: 王占梅(1983—),女,天津市滨海新区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少儿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18-06-29

· 工作研究 ·

城乡公共文化协同发展的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研究 ——以山西省永济市为例

李子峰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太原 030021)

摘要: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的重点任务。当前我国县级总分馆制建设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山西省永济市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管理、订单服务、积极创新、提升效能的总分馆制建设思路,初步形成了上下联通、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县级总分馆运行机制,在服务效能提升、城乡协同发展方面效果良好,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县具有借鉴意义。文章还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8.22

文献标识码: A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in-branch System of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aking Yongji in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branch system of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is a key task stipulated by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are still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i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system. Yongji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government-leading, communal participation, overall planning, graded responsibility, pursu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strives to build the system. So a mechanism of good superior-subordinate cooperation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was formed.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ractice in Yongji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is of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ounties in the initial stage. For its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libraries; main-branch system; construction mode

公共图书馆县级总分馆制,是指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以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以村(社区)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为服务点,实行总馆主导下的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和人员的统一培训。总馆对分馆进行业务指导和资源调配,也可统筹管理各分馆人财物。通过整合县域内的公共文化资源,从而建立起城乡上下联通、服务优质、运转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1]。

公共图书馆县级总分馆制建设是促进城乡公共

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对于“县级总分馆制建设”作出专门规定,标志着县级总分馆制建设从政策鼓励层面转向法律强制层面,成为县级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各个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理解法律内涵,主动承担主体责任,以总分馆制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2]。

永济市是山西省运城市所辖的县级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属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全市文化阵地

主要有市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训中心、10个镇(街)综合文化站、265个村级文化活动和农家书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实现了公共文化场所全覆盖,连续三届被评为“山西省文化强县”。2017年以来,在省、市文化部门的精心指导和永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永济市文化局积极适应“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的新要求,强力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工作,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城乡联通、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总分馆机制(见表1)。

表1 永济市总分馆体系部分基本情况

总分馆体系	基本情况
总馆	1个(永济市图书馆)
分馆	21个(10个乡镇、11个人口较集中区域)
基层服务点	16个(较大行政村、社区、厂矿、军营)
村(社区)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	260个(其余行政村及社区)
分馆免费开放资金	¥50 000.00
行政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资金	¥7 600.00
开放时长规定	≥ 20小时
分馆人员编制	2人
文化志愿者总量	≥ 30人
基层服务点人员配备	1人(100元补贴)

1 永济市县级总分馆制建设过程

1.1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3],2016年12月,原文化部等5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1]。这些“意见”,均是县级总分馆制建设的国家级“顶层设计”,旨在形成城乡协同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根据国家级“顶层设计”,永济市积极完善本级“顶层设计”,文化行政部门积极推动总分馆制建设列入2017年宣传思想文化发展改革重点工作、2017年《永济市政府工作报告》,并出台《永济市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2017年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永济市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等配套方案,为总分馆制建设制定了“指南针”“时间表”“路线图”^[1]。

文化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向基层公务员等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图书馆法》《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使基层行政部门进一步认清总分馆制建设的目标要求,明确本级党委政府所担负的具体职责,为总分馆制推行做好思想准备工作。

基于总分馆制建设扎实的基础工作,永济市(运城市所辖的县级市)成为山西省17个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县之一,是运城市13个县级市(县区)中唯一的试点县。

1.2 形成统筹管理体系

1.2.1 统一组织管理,明确职责分工

针对管理人员业务交叉、多头负责问题,永济市实行片区化管理,将全市10个乡镇(街道)划分为东、西、北3个片区,每个片区即为一个工作组,每组3名成员,分别是片长、协调人、服务专干。片长由文化行政部门的分管副局长担任,总体负责工作推进、活动统筹、人员管理、资金调配等事宜;协调人由机关股长担任,负责具体协调工作;服务专干由图书馆业务人员担任,负责开展业务工作。通过统一职责分配,让片区工作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解决了重复工作、互相推诿的问题,形成了高效的三人小组工作机制。

1.2.2 整合优势资源,供给优质服务

永济市借助文化行业整体力量,推进县级总分馆制建设。联合市文化馆、美术馆、体训中心等其他文化场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整合存量资源,在人员、经费、设备、器材等方面实现统筹管理,形成规模效应,有效增强资源互补能力及服务供给能力。

实行“订单式”服务,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即公共文化服务“菜单”),形成了“分馆报单、读者点单、总馆配单、政府买单”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首先向乡镇分馆提供服务“菜单”,读者“点菜”后即时上报总馆,总馆将读者需求形成“订单”,然后向文体志愿者协会“下单”,志愿者协会根据“订单”,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定制化服务流程,实现了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

推行标准化、规范化服务。一是建立规章制度。21个分馆统一借阅规则、人事制度、阅览室管理制度,开放区域、开放时间、开放时长(每周不少于20小时)、管理人员、监督方式等信息通过公示栏公开。

二是树立服务形象。规范标识标牌,分馆均悬挂“永济市图书馆某某分馆”牌匾。同时根据人口分布情况,依托25个主要行政村(社区)的“农家书屋”,设立“图书馆村级服务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1.3 坚持服务创新理念

1.3.1 工作机制创新

创新性开展“两推进”工作方式。①设立推进日。规定每周五为“工作推进日”,文化行政部门召集各片区区长、协调人、服务专干等参加,讨论工作进度与难度,提出计划与建议,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共性问题。②召开片区推进会。由各片区协调人召集片长、服务专干、分馆馆长等不定期召开,研究解决本片区内突出问题,分馆馆长提出工作计划,服务专干对“订单”进行汇总协调,排解分馆“订单撞车”问题。

1.3.2 经费支配创新

县级总分馆制推动人、财、事统筹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①购书经费由总馆统筹支配,总馆根据总需求统一购买书籍,采取流转方式满足读者需要,每批书籍每月在各分馆及村级服务点之间流转一次。②免费开放经费实行分馆统筹,各分馆可各自支配免费开放资金,按照规定实报实销;图书馆村级服务点实行乡级统筹,根据各服务点阅读活动开展情况、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工作进行实际拨付。③专人负责各片区经费报销工作,各片区协调人定期统一收集各项活动支出票据,汇总报销。

1.3.3 人才保障创新

①成立文化志愿者组织。由文化行政部门倡议,成立永济市文体志愿者协会,通过了《永济市文化志愿者协会章程》,制定统一标识,签订协议,划拨专项资金,为协会志愿者配备统一服装,缴纳社会保险。②开展针对性人才培养。总馆对分馆从业人员、文化志愿者开展培训,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2 永济市总分馆制建设成效

永济市是山西省县级总分馆制建设的先行者,在山西省确定的17个试点县中初步建立了总分馆制建设的基本模式,在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其总分馆建设成效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永济市总分馆制建设主要成效对比

项目	建设前	建设后
资源更新	分馆图书更新率低,且复本总量大,年均更新册数不到100	复本量降低87%,年均更新近500册,翻了两番多;资源流转,种类增加460种以上
资金使用	拨付到村(社区),资金少,头绪多,支出水平低,监管难度大	直接拨付到总馆,总馆统筹,集约化分配;提高使用效能,便于监管
服务水平	无服务标准,服务内容单一;读者被动接受服务,服务质量低读者无法监督	公开规章制度及服务标准,建立服务目录“菜单”,读者享有“订单式”服务,服务水平有保障;公开监督渠道
人才培养	专业化文化服务队伍缺乏;文化行政部门组织,或综合文化站自行组织,培训成本高,反响不好	建立文化志愿者队伍,倚重能人,培养新人;总馆负责所有分馆业务指导,根据实际需要策划培训内容,效果较好
创新探索	依靠行政区划建设文化站,形式单一,服务僵化	文旅融合发展,在旅游景区建立分馆,提升景区文化品味,建设类型化分馆

2.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化

根据“顶层设计”,县级总分馆制建设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统筹实施原则。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直接影响县级总分馆制建设进度。永济市成为山西省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县以来,通过片区管理体制理顺了工作关系,疏通了工作渠道,分工趋向合理,协调更加高效快捷,充分调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读者的文化需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提升了服务供给能力。

2.2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多样化

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为出发点,通过读者“点菜”、分馆“报菜”、总馆“配菜”的订单式服务,满足了基层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总分馆试点以来,分馆和农家书屋的读者到访率日益增高,激发了群众的阅读需求。

通过图书馆资金统筹,10个分馆与25个村级服务点的资源实现了总统筹。各村农家书屋年更新图书由60余种上升至470余种,农家书屋间的图书重复率大大降低;村级服务点图书每月向周边农家书屋流转一次,每年村民可选图书种类增加了11倍,图书资源在分馆之间有效流转,有效提高了图书的使用频率,资源价值趋于最大化^[4]。

2.3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均等化

永济市县级总分馆制打破了公共图书馆行政划分的局限性,打通了县、乡、村三级文化服务壁垒,让县级较高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惠及基层各地,让县域内读者均能公正、平等地享有公共图书馆服

务,弥补了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让各分馆及服务点均能享有丰富、专业、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

3 永济市总分馆制运行中的问题

3.1 依法推行力度弱

永济市县级总分馆制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推广以及“依法行政”力度仍然相对较弱,仍停留在学习阶段,对《保障法》《图书馆法》两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责任法”的定位认识不清晰,对总分馆制建设“法律化”的意义认识不深刻,“依法办馆”理念淡薄。

3.2 保障条件不充分

3.2.1 基础性保障条件

基础性保障条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比如资金保障、人力人才资源保障等在县级总分馆制推行初期是可行的、必然的,但其他地区的实践表明,县级总分馆制建设过程中单一依靠政府投入,会有公共财政压力过大、总分馆建设后劲乏力的隐忧。永济市在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共建共享总分馆制建设方面尝试较少,因此在资金、人才等方面仍有较大缺口。这也是总分馆制推进过程中的主要难题之一。

3.2.2 稳定性保障条件

完善的评估激励机制是衡量总分馆制建设成效、影响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是争取经费预算以及争取工作主动性的重要保障,是充分调动各方工作积极性的关键。永济市在推行总分馆制建设过程中充分调动本级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的力量,与省市两级有所沟通,与基层组织协调较多,建立了初步的协调机制,但是尚未形成稳固的成文的统筹协调机制,这对未来推行总分馆制有所影响。

4 推进县级总分馆制建设的建议

4.1 依法推行县级总分馆制

《保障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根据这一条文,结合《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精神可知,总分馆制建设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贯彻《保障法》的重要举措^[5]。

《图书馆法》虽然出台较晚,但是其明确将总分馆制写入法律,对于县一级政府推进总分馆制建设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因此,对于推进县级总分馆制建设的县域而言,应当加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依法行政”自觉,并将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体系,同时将落实情况纳入文化行政部门政绩考核体系。

4.2 提升资金统筹使用能力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奖励金、免费开放资金、彩票公益金等统筹管理,坚持“专款专用”原则,合理统筹资金分配。根据永济市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规划以及预算,县级财政部门负责审定,文化行政部门将经费直接拨付县图书馆总馆,由总馆根据总分馆制建设计划支出资金。统筹使用资金,将有助于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提高资金集约化使用程度,在总分馆制建设中发挥保障作用。

4.3 强化人才队伍保障工作

人才因素是影响总分馆制建设的重要因素,对总分馆制的成败起着关键性作用。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县级各相关部门要在现有编制总量内,落实总馆、分馆人员编制政策。即根据总分馆规模、服务人口、服务方式,统筹总馆、分馆的人员配置。加强对总分馆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管理,同时也可通过社会合作方式解决总分馆人员不足的问题^[3]。培训是快速加强馆员职业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借助行业内培训项目如全国基层文化队伍示范性培训、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中国图书馆学会在线课程等公益性、零门槛渠道培养专业馆员。建立馆员成长档案,对积极参加相关培训项目、教育活动的馆员给予奖励。也可通过开展“馆员技能”交流、展示、竞赛等活动,激发馆员潜能,提升馆员职业素养。

4.4 积极推广信息技术手段

基于总馆、分馆现有的信息技术设备及系统,向读者推广利用信息技术设备查询、检索、获取信息,同时积极推广现有电子资源,提升电子资源的使用率。可以面向农村读者开设各类信息教育培训,如手

(下转第86页)

· 工作研究 ·

基于校地合作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探索^{*}

——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朱如龙 邢 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12)

摘要:当前图书馆社会服务存在着社会服务意愿不强、服务模式单一及合作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制约了图书馆社会服务的突破性进展和创新。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校地合作与社会服务既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责的要求,也是自身可持续发展、服务创新的需要。文章基于校地合作探索了提高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模式,以期发挥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校地合作;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ation on Practices of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ies based on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Local Government—Taking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So far the libraries social services also hav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weak willingness to provide social services, single service model, and weak service teamwork, which restricts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of library social services. It i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responsibility to implement social servic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 and local government, which will also facilita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So the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to explore the new service system of social service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rvice abilities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o develop the valu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braries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 and local govern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y; social service

近年来,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高职院校图书馆作为高职院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应发挥优势、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校地合作与社会服务既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责的要求,也是自身可持续发展、服务创新的需要。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层次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的

必然选择。本文分析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索校地合作基础上的社会服务体系,对提升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存在的问题

*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校地合作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研究”(项目编号: Y201738318)的成果之一。

1.1 社会服务意愿不强、模式单一

受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制约,一部分高职院校图书馆仍将传统图书馆的图书分编、图书借阅、参考咨询业务视为图书馆的主流业务,将校内师生读者视为图书馆唯一的服务对象。再者由于各种条件制约,一些图书馆担忧进一步开放社会服务会使资源和设施被占用,影响本校读者的利益。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主动开展社会服务的意愿不强,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其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的步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为例,其社会服务的重点在于推广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库,服务模式也只局限于对企业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与企业和社会共建图书室,没有完全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服务优势。

1.2 服务及合作能力不强,缺乏社会价值认同感

高职院校图书馆主要依托图书馆自身优势围绕图书馆参考咨询、文献传递等业务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服务群体有限,服务效应较小,社会影响力不大。同时,校内缺乏有效的合作和共享机制,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大多是单兵作战,与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工作结合不够紧密,没有较好地整合相关部门优势资源,社会服务成效受影响。在校外合作过程中,也存在合作单位少、合作项目少等问题,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成效、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认同感。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资源库企业推广服务是重点工作,提供资源服务都是以图书馆为主,校内外合作单位少,参与的力度不够,企业服务也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制约了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拓展和成效。

2 基于校地合作开展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必要性

2.1 校地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使命的要求

高职教育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来对职业教育布局,属于地方或者行业管理,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行业性特征,也体现高职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立足行业求发展,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1]。高职院校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学校的发展与它所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学校发展与地方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经融为一体,只能走校地互惠互利、良性互动、合作双赢的共同发展之路。

2.2 校地合作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体现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地域特征,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通过与政府、行业、企业对接,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设置及发展方向、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实训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等方面合作研究、共同完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校地合作,实现与政府、行业、企业、社区的多元化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才能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2.3 校地合作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拓展社会服务的需要

近些年图书馆社会服务得到了高度重视,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第三条提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第四条提出:“图书馆主要任务是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第三十七条提出:“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2]社会服务已经进入图书馆核心工作。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全民素质提高的战略任务,对图书馆社会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图书馆只有以校地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为支撑,积极开展校内外合作,才能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服务。

3 基于校地合作开展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探索

3.1 加强使命感,强化社会服务意识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机构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特定的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及社会服务对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增强社会服务使命感。美国德鲁克基金会主席弗朗西斯·赫塞尔本提出了“使命管理”的新理念,她强调“一切工

作都源于使命,并与使命密切相关”。赫塞尔本认为,使命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表达了我们“为什么做”。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组织的驱动力本质上是来自人的驱动力,而人的驱动力又源自人内心深处的激情,所以一个组织必须首先弄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从完成使命的角度去制定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3]。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必须要从发挥图书馆资源服务优势、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的目标去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与功能,积极主动变革服务模式和体系,再造图书馆新生命,发挥高职院校图书馆在区域信息交流以及文化传承与教育的作用。

3.2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做好社会服务顶层设计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对图书馆社会服务重新定位,将图书馆校地合作开展社会服务纳入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随着宁波区域划分的重新定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为海曙区的地理核心位置。其抓住机遇将开展与海曙区的合作列入学校社会服务重点工作,在2018年工作计划中提出了积极融入海曙区、古林镇发展,拓展与海曙区的合作,争取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探索共建海曙区社区学院、文化中心、老年大学、创新创业园等项目。开展“一院一镇”服务工程试点,扩大与当地企业、社区的合作。同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效能的工作目标和任务,重点指出要立足学校地理位置优势,深度挖掘图书馆功能,尝试对海曙周边社区、企业服务,将图书馆工作列入学校社会服务重点工作。通过学校对图书馆社会服务的顶层设计,使图书馆社会服务进入了前沿和核心地位,激发了图书馆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使图书馆社会服务工作起点高、影响力大。

3.3 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共建图书馆文化综合体

数字时代的全民阅读,使学习方式显得更为轻松和随意,图书馆不再仅仅是一个借阅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场所,对图书馆学习环境的便捷性、自主性、互动性、舒适性甚至随意性都要求较高。图书馆必须积极应对新需求,整合学校内外优势资源,重新规划设计图书馆空间及场所,使图书馆面向社区开放条件更好、吸引力更大。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书店进校园行动,与学校创业学院、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合作,在图书馆开办了宁波第一家直营店,面向校内外开展阅读和其他文化服务项目;建

成开放学习共享空间,提供学习和研讨交流服务;与北京爱迪科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建设全国高职院校中第一个实体报告厅——爱迪科森报告厅,利用其丰富的优质资源服务学校、服务社会,实现多媒体资源的实体服务,发挥图书馆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在图书馆场所的布置上做到优美舒适、格调高雅,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此外,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本校图书馆与学校周边的古林镇政府签署了开放协议,双方共同完成了开放实施方案。本部图书馆向4个社区4 000余名用户发放阅览证,持有阅览证的用户能进入图书馆阅读纸质图书、报刊,以及使用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特色资源库。社区读者不仅可以进入书库、阅览室、学习共享空间、爱迪科森报告厅等服务区域并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同时还可以享受校内新华书店的图书采购配送多样化服务,提升服务效能。

3.4 加强校地合作,打造图书馆社会服务品牌

品牌的打造需要图书馆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和外部的需求环境。一方面根据馆藏特色,结合现实需要,选择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进行展示和推广,组织相关社会服务活动,打造图书馆资源服务品牌;另一方面借助校内外优势资源,主动发掘社会需求,延伸图书馆服务项目,联合打造图书馆文化服务品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宁波市新华书店合作,发挥学校专业教师优势,以提高人文素养为目标,每周推出一次微讲堂,开展讲座和互动活动;组织读书协会、影评沙龙,提高文学艺术鉴赏水平,满足社区居民的阅读及文化娱乐需要;与宁波赵大有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宁波老字号走进高校活动,开展老字号商业文化传承和普及活动;与学生社团一起开展汉服、书法等传统文化展示活动,传播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系列活动的推出扩大了图书馆在社会的认知力和影响力,提高了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在社会服务常规工作中,图书馆联合社区图书室、文化站、新华书店等,为社区居民提供终身教育课堂,开展各类读书活动、文化沙龙、传统节日庆典、人文专题讲座和专业信息素养及技能培训等,为社区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同时,图书馆还将面向有需要的部门、企业或个人提供资源检索和文献传递服务,对社区图书馆文化站给予业务指导。

3.5 整合内部业务,加强服务环境建设

社会服务项目涉及面广,需要图书馆各个部门的有效配合。面对社会服务新形势,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亟待改进,需要重新整合内部业务工作,通过资源建设、场所建设、环境建设以及图书馆学习空间、自助服务建设,将图书馆打造成一个市民终身学习的知识殿堂;馆员要更多地为学习和沟通创造条件,以便腾出更多的人力投入社会服务工作,充分利用专业人才资源,完成对周边社区阅读活动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将推广工作、读者活动工作列入图书馆核心业务的重点工作,注重对外业务人员的公关能力、活动策划能力等综合素养的培训和提升;重点开展资源服务、技术服务和互动服务,打造跨领域、跨学科、跨学院的交叉服务团队。

3.6 创建校、地、馆三方多边合作新格局

社会服务取得良好的成效,必须创建校、地、馆三方互利互惠、三方共赢的合作新格局^[4]。高职院校图书馆要主动获取和整合校内外资源优势,充实社会服务力量,提高社会服务成效。例如,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在校内结合学校党建工作、学生工作、创新创业教育、社团工作,与学生处、创新创业中心、团委、工会等部门合作,实现与学校相关工作的

深度融合,共同开展社会服务;在校外与本区域相关文化教育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社区合作,结合现实需要,共同发起、策划、组织实施社会服务项目和活动,达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双方共赢的目标。同时,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社会合作过程中要善于寻找发挥中介作用的“中间机构”,如学校和社会的一些管理部门和研发中心、校外行业协会等,争取得到中间机构的支持和协同,突破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交往的局限性,使社会合作更加顺利、高效。

4 结语

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优势明显,资源丰富,专业人员充足,必然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融入校地合作理念、探索校地合作模式、创新校地合作机制,从而进一步明确图书馆社会职责,突破服务局限,着眼于图书馆自身发展,推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区域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方面的作用,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拓展社会服务和实现转型发展的出路和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永刚.高等职业教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49.
- [2]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EB/OL].(2016-01-04)[2017-04-28].http://www.moe.edu.cn/srs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 [3] 郑学军.大学图书馆研究与思考[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107.
- [4] 金声.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图书馆企业服务模式探索[J].图书馆论坛,2012(4):61-64.

作者简介: 朱如龙(1962—),男,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已发表论文12篇;邢玓(1983—),女,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已发表论文4篇。

收稿日期: 2018-05-29

· 工作研究 ·

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郑永

(诸暨市图书馆 浙江诸暨 311800)

摘要: 文献捐赠工作对促进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加强与社会联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介绍了诸暨市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相关实践,包括对捐赠文献的要求、文献捐赠方法、文献捐赠的宣传、文献捐赠的品种和捐赠文献的开发等方面,指出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文献捐赠;公共图书馆;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Literature Donation System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The work of literature don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library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contact and also offer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to take part in the building of librari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the Zhuji library receiving literature donation, including requests, methods, publicity, kinds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donation. It also discusses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work and offered counterstrategies.

Key words literature donation; public library;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采购、接受交存或者捐赠等合法方式收集文献信息。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公共图书馆捐赠。文献捐赠有助于图书馆收集各种类型的文献,促进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收藏、开发和利用职能的发挥,是实现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学术界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杨新涯等通过网络调研和实际捐赠行为,对我国39所“985工程”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捐赠工作进行了研究。高校图书馆目前普遍重视图书捐赠工作,在捐赠说明、业务流程及捐赠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初步发展,但在捐赠反馈、捐赠宣传、专题网站建设及图书法律归属权等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与捐赠人的交互及对捐赠利用数据的反馈^[1]。谷雨对天津泰达图书馆图书

捐赠工作进行了分析,提出建立适合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捐赠体系^[2]。张吻秋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对国内34个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进行调查,发现图书捐赠工作普遍存在着重视度不够、同社会成员的交流少、栏目设置单一、信息查找不便、标准不明确、捐赠说明不完善等问题^[3]。王岚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社会赠书接受原则和规范的赠书接受机制,建立适合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原则的接受赠书工作流程^[4]。章亦倩对温州市图书馆社会捐赠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5]。以上对图书馆文献捐赠的研究,为促进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完善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在介绍诸暨市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的建议。

2 诸暨市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实践

诸暨市图书馆是国家一级图书馆、浙江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和浙江省省级古籍修复站。其秉承“服务立馆、资源强馆”宗旨和“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十分重视图书捐赠工作。

2.1 制定详细的文献捐赠管理办法

文献捐赠一般分为接受和不接受两个原则。诸暨市图书馆制定详细的文献捐赠管理办法,对捐赠文献要求作出具体规定,文献需是符合本馆馆藏发展政策的书籍、品相基本完好的国内外正式出版物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手稿、科技报告、学术集刊等非正式出版物,对违反出版法、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文献不予入藏。

2.2 公布文献捐赠方法

文献捐赠遵循自愿捐赠原则。诸暨市图书馆发布了《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文献的公告》,公布两种文献捐赠途径。第一种是镇街、部门、企事业单位职工或退休职工所捐书籍统一汇总到本单位,经清点数量册次后由各单位联系图书馆作统一捐赠,由馆员现场组织验收、清点、统计,并出具图书馆收藏证。第二种是社会团体、个人捐赠书籍直接联系图书馆接受捐赠,由图书馆出具收藏证。

2.3 通过多样化方式宣传文献捐赠工作

图书馆对文献捐赠活动的有效宣传,不仅能体现图书馆对捐赠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能增强读者的捐赠意识,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图书捐赠。诸暨市图书馆通过多样化方式进行文献捐赠的宣传:利用纸质媒体、电视等传统媒体报道文献捐赠工作;利用微信、微博平台等新媒体实时发布文献捐赠信息;通过展橱或流动展板陈列捐赠文献,宣扬文献捐赠活动,等等。

2.4 提高了馆藏品种数量和质量

诸暨市图书馆经过多年的文献捐赠活动,已收集文献6 000多种,其中地方文献占70%以上。按照文献来源划分,地方文献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反映家族传承历史的家谱和宗谱,如《吴氏家谱》《倪杨氏家谱》《丁氏家谱》《陈氏宗谱》等;二是本地作者撰写的作品,如作家梅芷和李国林著的《生命的痕迹》《冷香簪吟稿》,书画家许文巨书写的《许文巨书法作品集》、钱汉东书写的《钱汉东诗文墨迹选》;三是本地籍但在外地工作的名人作品,如张仕波将军著的《战争新高地》、陈侃章著的《古往今来说西施》;四是本地社团组织撰写的作品,如诸暨市孝文化研究

会编写的《诸暨孝德文化》报、浙江省水浒研究会编写的《店口与水浒》。以上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文献资料,为地方文化研究爱好者提供了珍贵史料,对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地方文献外,乡贤还为诸暨市图书馆捐赠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文献,如陈侃章先生捐赠一套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 559册),使诸暨市图书馆成为全国首家拥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县级图书馆,大大提高了馆藏质量。

2.5 及时整理开发捐赠文献

诸暨市图书馆对捐赠文献及时整理,编制文献捐赠目录,并在网页上及时发布。对于有价值的捐赠文献,根据情况开展有深度的开发,如对捐赠的家谱和馆藏家谱,合编了一部《诸暨市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尽可能收集本地所藏的家谱。

3 公共图书馆文献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 捐赠文献的质量把控机制欠缺

由于捐赠文献的来源广泛,而且公共图书馆一般以被动的方式接受捐赠,导致捐赠文献质量参差不齐。从事捐赠工作的馆员一般情况下会出于对捐赠者的礼貌和尊重,对捐赠的图书照单全收,这就导致一部分捐赠文献不符合馆藏要求。特别是有些个人捐赠家藏图书,采取清理式的大批量打包捐赠,其中不少捐赠的文献内容老旧、无利用价值,或者是某一时期流通的包含错误观点、残破污损的图书。有的图书是由境外非法出版公司出版,印制粗糙、内容低俗、盗用书号,与盗版无异;还有一些是旧的普通期刊、教材、宣传广告册等,这类文献捐赠,不仅浪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精力,也增加了馆藏空间负担,降低了馆藏文献质量。

公共图书馆应出台明确的质量把控机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对图书的类别、品种、质量进行鉴别。同时,公共图书馆应明确各部门及馆员在质量把控机制中的责任与工作:馆长主要负责策划和组织;参考咨询馆员负责在专门研究领域征集所需要的材料;办公室负责举行捐赠宣传活动;对外联络馆员负责宣传图书馆的捐赠计划和捐赠后的反馈联系。

3.2 捐赠工作业务管理流程不规范

目前,很多公共图书馆普遍采用人工电脑登记

捐赠文献信息的方式。捐赠文献收到后,缺乏去向信息记录,导致日后捐赠人来馆询问所捐图书去向,出现找不到书的情况,这既失信于捐赠者,也不利于日后文献捐赠工作的宣传推广。

捐赠工作要想实现长效持续发展,必须制定标准的工作流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如制定各种捐赠资料的征集及处理办法、切实可行的捐赠奖励办法、捐赠文献入藏工作流程、捐赠信息归档及信息化管理等,使各项工作有据有序地开展。另外,图书馆还应重视捐赠反馈工作,使捐赠者感受到图书馆对捐赠工作的重视,从而带动更多社会人士的捐赠行为。图书馆可为捐赠者提供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在捐赠文献编目中明确著录捐赠人、捐赠单位等信息,实现图书馆对捐赠文献的规范化管理;加强与捐赠人的互动,建立长期的联系机制;开辟捐赠专柜、专室,妥善保管赠品。以台北艺术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在接到大宗捐赠后,先进行捐赠访谈,询问捐赠者意愿,对于捐赠资料内容及馆藏的特殊要求,比如是否需要专架专室保管、是否可以展览、是否可以盖藏章等进行咨询,再提报馆长或依图书馆程序,进行捐赠确认并签订备忘录及捐赠协议,确定搬运方式、典藏方式、特殊需求以及财产变更和图书馆处理权益等,再进行搬运作业,完成捐赠^[6]。

3.3 文献捐赠工作在法律上存在隐患

在捐赠过程中,很少有图书馆会就捐赠人对文献

的合法所有权进行调查,受赠双方制定捐赠协议的也少之又少。就算制定了捐赠协议,协议中也未必会明确捐赠人对所捐赠文献的合法支配权,也不会对捐赠文献入藏图书馆后的法律归属权进行说明,导致图书馆如果对捐赠书籍处理不当或书籍不慎遗失时,产生与捐赠人之间的矛盾,也为后期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留下隐患。

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对文献合法所有权的重视,与捐赠者签订捐赠协议,明确强调捐赠图书馆的所有权及处置权归图书馆所有,图书馆有权对赠书进行适当处理。只有明确了捐赠图书的合法支配权、受赠方的法律归属权,用严谨的法律来规范捐赠工作,才能维护好捐赠人与图书馆双方的权益,减少隐患、杜绝日后纠纷。

4 结语

文献捐赠工作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途径。公共图书馆应该大力重视和促进文献捐赠活动,完善文献捐赠工作。通过“社会捐赠、图书馆收藏、读者受惠”这种合作方式,使捐赠者既成为图书馆的读者,又成为文化发展的推动者,产生积极良好的阅读效应,从而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新涯,罗丽,王彦力,等.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5):31-36.
- [2] 谷雨.公共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探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6):108-109.
- [3] 张叻秋.省级公共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情况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16,29(1):60-62.
- [4] 王岚.公共图书馆建立健全图书捐赠机制的若干思考[J].图书馆建设,2011(2):30-32.
- [5] 章亦倩.以温州市图书馆为例看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捐赠工作[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6):99-101.
- [6] 张建静.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情况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2):39-46.

作者简介:郑永(1975—),男,诸暨市图书馆馆长,党支部书记,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史。

收稿日期:2018-06-26

从郑樵目录学思想探析《通志·艺文略》类目数量

刘骏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对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类目的具体数量,众多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认识,这是由于未能深刻理解郑樵“类书如持军”的目录学思想而导致的差异。结合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从《通志·艺文略》文本出发,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统计,并通过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通志·艺文略》类目数为12大类、82小类、431种的结论。这不仅解决了众说纷纭的类目数量问题,更深化了对郑樵目录学思想的认识。

关键词: 郑樵;目录学;艺文略;类目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Categories of *Yiwenlve* of General History From Zheng Qiao's Bibliographic Thoughts

Abstract Scholars provid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pecific number of categories of Zheng Qiao's *Yiwenlve* of General History. In fact,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Zheng Qiao's bibliographic thoughts that classifying books is like governing an army. Through statis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very text of *Yiwenlve*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it. As a result, the author, based on Zheng Qiao's bibliographic thoughts, finds 12 sections, 82 minor-categories and 431 sub-categories in *Yiwenlve*. That is how the unsettled problem of number of categories solved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Zheng Qiao's bibliographic thoughts achieved.

Key words Zheng Qiao; bibliography; *Yiwenlve*; category

郑樵的《通志·校雠略》(以下简称《校雠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献学理论专著。在《校雠略》中郑樵阐发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学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编次必谨类例”之论。“必谨类例”即强调对文献分类的特别重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只有在分类设置上臻于完善,目录之书才能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郑樵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文献学思想,还把这种思想实践在自己所作的史志目录《通志·艺文略》(以下简称《艺文略》)中。当时四部分类法已在图书编目中确立了主导地位,而郑樵别开生面,在《艺文略》中采用了12大类的分法,并且设置了“类、家、种”的三级类目结构,第三级类目多达400余个,充分体现了他“必谨类例”的文献学思想。但是,对于《艺文略》类目的具体数量,众多研究者的认识并不一致,有深入分析辨证的必要。

1 《艺文略》具体类目数量的诸多异说

《艺文略》采用了12大类的分法,但是,对于《艺文略》第二级和第三级类目的具体数量一直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意见如: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认为是12类,155小类,284目^[1]。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2]和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3]均认为是12类,82家,442种。

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认为是12类,100家,432种^[4]。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认为是12类,100家,371种^[5]。后来在《古典目录学》中修订为12类,82家,430种^[6]。

徐有富《郑樵评传》认为是12类, 100家, 422种^[7]。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认为是12类, 71小类, 384种^[8]。

此外, 张舜徽所著《中国文献学》以及程千帆、徐有富合著《校雠广义·目录编》二书虽没有直接给出具体数字, 但详细抄录了《艺文略》的类目, 如按二家所录进行统计, 结果与上述诸家也不一致。

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加以研究。首先, 《艺文略》没有序文等理论说明, 其思想指导体现在郑樵的《校雠略》中。深入理解《校雠略》中的文献学思想, 尤其是关于类例的表述, 是分析《艺文略》类目设置的一把钥匙。其次, 《艺文略》中虽然没有理论说明, 但文本中存在着能够判断其类目的规则。结合以上两点, 可以对《艺文略》的类目设置有更加准确与深入的认识, 并能以此为基础考察造成各家不同看法的原因与得失。

2 郑樵“类书如持军”的目录学思想

郑樵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说:

(第二篇)……类例不明, 图书失纪, 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 为之区别, 凡十二类: 经类第一, 礼类第二, 乐类第三, 小学类第四, 史类第五, 诸子类第六, 星数类第七, 五行类第八, 艺术类第九, 医方类第十, 类书类第十一, 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 九家有八十八种书, 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 可乎? 礼一类分七家, 七家有五十四种书, 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 可乎? 乐一类为一家, 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 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 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 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 其八家为书八种, 道释兵三家书差多, 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 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 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 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 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 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 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书, 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 百家, 四百二十二^①种, 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 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第三篇)易本一类也, 以数不可合于图, 图不可合于音, 讖纬不可合于传注, 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

也, 以图不可合于音, 音不可合于谱, 名物不可合于诂训, 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 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 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 以啖赵杂于公谷可乎? 乐虽主于音声, 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 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 文集一家而有合离。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 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 以此观之, 《七略》所分, 自为苟简; 四库所部, 无乃荒唐!

(第四篇)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 虽多而治; 若无条例, 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 患处多之无术耳。……^{[9]1804-1806}

对整个“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加以梳理, 可以看出这六篇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理论上其目的和意义是“类例既分, 学术自明”, 实践上其具体方法即“类书如持军也”。对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 但对于具体的“持军”的方法似乎少有论及。实际上, 第二篇和第三篇就是郑樵从实践层面对“持军”方法的示范, 从中可以看出, 所谓“持军”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在同级类目之间, 类目设置应当根据内容不同而加以尽可能详细的区分; 二是在不同层级之间, 类目设置应当做到完全涵盖。做好这两个方面, 才能切实达到“类例既分, 学术自明”的目标。

这两个维度中, 第一层较容易理解, 而第二层有必要加以阐发。在第二篇中, 郑樵用“类、家、种”三个层级名称示范了这种完全涵盖。“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 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一句, 就是说分散的400多个三级类目可以完全涵盖100个二级类目, 掌握了100个二级类目就可以理解12个一级类目。这就是“完全涵盖”, 如同部伍行列一般整齐。郑樵认为目录分类与此类似, 所以才用“持军”作类比。不同等级的类目之间“散之能穷”, 这就意味着不会出现某个二级类目下没有三级类目的情况, 这样每一本书所体现的学问, 都可以并且必须在每一个层级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而没有能逸出其外者, “散、穷、敛、明”的意义正在这里。这是郑樵始终强调的用分类以体现学术的目录学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方式。

这种“类书如持军”的目录学思想(及其方式)至今尚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研究者对《艺文略》具体类目数量认识的差异。

3 《艺文略》类目统计的依据及数量

除了深入理解《校讎略》中的思想外,在《艺文略》文本本身中也存在着判断其类目设置的途径,且不止一种。以经类为例:

经类第一

易 古易 石经 章句 传注 集注 义疏 论说 类例
谱 考正 数图 音 讖纬 拟易

《连山》十卷……

右古易三部,十六卷。

《石经周易》十卷……

右石经三部,十四卷。

……

右拟易二十九部,二百三十一卷。

凡易十六种,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9]1449-1457}。

其篇列举的“经类第一”是一级类目,“易”是二级类目,“古易、石经”等是三级类目,《连山》以下是书名,层次分明,这是第一个途径。此外,第二个途径是,在三级类目“古易”的所有书之后,郑樵有一个统计曰“右古易三部,十六卷”;在二级类目“易”的所有书之后,也有一个统计曰“凡易十六种,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因此,每出现一个“右某若干部”即可判定为一个三级类目;每出现一个“凡某若干种”即可判定为一个二级类目。并且,“凡易十六种”同时还意味着前文应当出现16个“右某若干部”,这对于统计来说又是一个绝佳的呼应与验证(实际上《艺文略》涉及图书的部数与卷数也可照此呼应统计)。

当分别采用两种途径统计后我们发现,第一种途径在列举中常有缺漏^②,因此,第二种含有呼应和验证的统计途径是我们判定《艺文略》类目设置的最可靠依据。这种统计来新夏先生已经做过了,他说“我核查《通志·艺文略》各家后的凡计,实际数是十二类八十二家四三〇种。”^[6]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核凡计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如前所述,出现一个“右某若干部”即可判定为一个三级类目,但是,若某个二级类目下只有一个三级类目,如“故事”家、“儒术”家等,此时《艺文略》会省略三级凡计“右某若干部”,仅保留二级凡计“凡某某一种”。如果补全这种省略的三级凡计,那么全部三级凡计“右某若干部”共431

种;同时,全部二级凡计“凡某若干种”共为71家430种。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验证,430和431这两个数字本应是相等的;第二,二级类目的数量与采取同样方法的来先生的结论也不一致。

首先来看三级类目数量上这一种的差别的原因。这一差别源自“类书”类的“类书”家。原文有“右类书上六十二部”“右类书下七十部”两个三级凡计,但二级凡计只说“凡类书一种,一百三十二部”。

这一类的开篇只有“类书类第十一”六个字,此下直接进入具体书名,因此第一种统计途径对解决这一问题不能有所帮助,同时也恰好证明了前文所说的这种途径常有缺漏的事实。综观整个《艺文略》可以发现,有两个与“类书类”情况类似的二级类目,分别是“霸史”和“职官”。这三者的三级凡计是同类型的:“右霸史上”“右霸史下”;“右职官上”“右职官下”;“右类书上”“右类书下”。而二级凡计则略有不同:“凡霸史上下”(按2种计)、“凡职官二种”、“凡类书一种”。可见“霸史”和“职官”的呼应是吻合的,而“凡类书一种”也当如此,其作“一种”是郑樵的失误,应当作“二种”。

其次来看第二个差异。在二级类目上,文中只有71个“凡某若干种”,即71个二级分类。但是郑樵在“道家”“五行”“医方”“别集”4个二级分类下又插入了“一二三”或“上下”的划分,如二级类目“道家”名称下先小字列出“老子”至“修养”25目,然后跳行书“道家一”,再跳行为具体书名,在“传”“科仪”“外丹”三目的具体书名前分别加“道家二”“道家三”“道家四”,但都没有类似“右道家几”的凡计,只有全部道家最后有凡计“凡道类二十五种”。“五行”类所加为一至四,“医方”类所加为上下,“别集”类所加为一至五。

如果严格按照凡计来看,那么“凡道类二十五种”表示“道类”就是一个二级类目,但完全无视这种“一二三”的划分似乎未能深入理解郑樵的用心,也过分拘泥于统计规则。并且,这种“一二三”的情况与前述“类书”上下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将之综合起来,从形式、内容与旁证3个方面深入探究。

从形式上看,如前所述,“霸史”和“职官”各自凡计的呼应是吻合的,形式上具有范例作用,因而这种“上下”应当分别独立看待。其次,从所收图书内容上看,“霸史上”所收都是关于南北朝之书,“霸史

下”所收都是关于唐末五代之书；“职官上”所记是汉晋南朝隋唐书，“职官下”所记是唐末五代宋书，可见其区别上下是有原因的。同样，“类书上”收宋以前类书，“类书下”专收宋代类书，因而其上下也应各自独立。而“道家”“五行”等所加区分也各自有一定独立性的：道家一为经典，二为传记，三为科仪内视，四为丹药；五行一为占筮，二为阴阳，三为命理，四为堪舆；医方上为本草，下为病理；别集一至五以朝代区分。以上这些命名并非《艺文略》中原有，是笔者体会所加，虽然极为粗略，但能看出各小类内部的相关性与各小类之间的独立性。因此这绝非仅是出于卷帙繁多而进行的分节，而是和其他数百个类目共同体现了郑樵在分类上精益求精的一贯思想，也即前文所说的“类书如持军”的第一个维度：在同级类目之间，类目设置应当根据内容不同而加以尽可能详细的区分。

第三说旁证。这个旁证就是《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的第二篇及第三篇。第二篇对全部十二类的三层类目设置所言甚详，因此许多研究者就将该篇末尾的总述直接视作《艺文略》类目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该篇本身有内在错误，二是其所述不完全符合《艺文略》实际情况。先说第一点。前11类的文句本身都没有问题，到第十二类，原文说“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书，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前半句说文类共2家，后半句说别集1家和余21家，则共是22家；前半句说文类共22种，后半句说19种和21种，则共是40种。前后矛盾，其中必有错讹^③。据《艺文略》文本的凡计，文类共有22个“凡某若干种”、40个“右某若干部”，因此《校雠略》的这句话可校改为“文类一类分二十二家，四十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书，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原文可能是因数字相涉而讹。校改之后，文末“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的结论也应改为“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这个总计也曾被一些学者作为《艺文略》类目数量的结论，但这个数字和我们用《艺文略》凡计得出的结果仍有差异——这正是第二个问题：该篇的描述与《艺文略》实际情况有所不符。如经类按凡计为9家89种，而该篇称9家88种；五行家抛开一至四的问题，其种数按凡计为30种无误，而该篇称33种；别集家抛开一至五的问题，其种数按凡计为20种无误，而该篇称19种。对此有多种推测，如笔误、数字相近而讹，或《校雠

略》与《艺文略》成书时间不同而郑樵有所改动。因此本篇的数字不能直接利用，但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们注意到，该篇中说“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这对我们前述的类书类问题是重要旁证，说明我们认为类书家当作“两种”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实际上之所以说这两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仅是指其中所列的数字，更重要的是郑樵在此阐释的分类思想。细读第三篇文章，可知郑樵的分类思路是“不患其多”而精益求精的，这在该篇中体现为“讖纬不可合于传注”“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等理论表述，在《艺文略》中则体现为具体的类目设置和“一二三”式的划分，两处同出一源，甚至《艺文略》中更进一步。该篇中说“易类”下分数、图、音、讖纬、传注等，“五行类”下分三命、元辰、九宫、太一等，而《艺文略》不仅体现了这样的区分，更把太一分入“五行一”，九宫、元辰分入“五行二”，三命分入“五行三”（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前述《校雠略》和《艺文略》之间有所修改的推测）。因此我们应当将“一二三”“上下”这样的划分理解为郑樵对《校雠略》中思想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④。

那么郑樵何以不为“上下”“一二三”这类划分独立命名并清晰地设置层次呢？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名称来对其加以合适概括（尤其是按时代划分的别集），另一方面如果将“一二三”等独立成一个层级，那么如道家类、别集类将出现四级分类（“诸子/道家/道家一/老子；文/别集/别集一/楚别集”），这势必对郑樵精心构建的完整的三级分类的结构造成破坏。这些突兀孤出的四级类目的存在将使“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无法完美实现。因此可以说，使用“一二三”式的划分是郑樵的折中变通之法，既保持了三级分类体系的整齐，同时又透露出一些类目间的独立性，这既是郑樵突破前人的地方，同时也是他被自己所局限之处。郑樵以分类精益求精的思路前无古人地开辟了完整的三级分类体系，然而同样在求精的思路下必然会出现了有些三级分类尚不够精确、不能完全包含的地方。面对隐约出现的四级分类的趋势，郑樵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假设他大胆地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进，不考虑层次的整齐而持续往下划分的话，就会成了类似如今常见的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分类体系，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前进，但这既非郑樵的时代所能允许，也与他推重

会通的总体思想不相契合。

因此,现在我们对于《艺文略》类目的统计,应当在理解其思想的基础上,体现出“一二三”的划分,但又不能破坏郑樵的三级结构。所以对于“诸子/道家/道家一/老子”这样的四级分类,我们取消原第二层“道家”,直接把“道家一”“道家二”等升为二级类目,其余不涉及四级分类的就直接加入“一二三”的划分,这是最能符合郑樵分类思想的做法,既保持了整齐的“类书如持军”的三级分类体系,同时用“一二三”的独立体现郑樵“必谨类例”“不患其多”的重要思想。机械的数字统计并不是目的,不能因此而掩盖了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内涵。于是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艺文略》的具体类目数量应为12类,82家,431种。

4 各家异说的差异原因分析

在得出具体的统计结论之后,可以以此为基准,考察造成各家说法差异的原因以及失误之处。

前揭各家说法中,姚、吕、王、张、程数家详细列出了各自所认可的《艺文略》类目标,现将各家说法列成下表(其中王重民与吕绍虞全同,见表1),并加上郑樵《类例论》的说法和本文结论两项,以便对比分析。

表1 《艺文略》第二、三级类目数量各家异说比较表

类目	姚名达	吕、王	张舜徽	程千帆	张富祥	类例论	本文
1 经	9, 89	9, 89	9, 89	9, 90	9, 89	9, 88	9, 89
2 礼	7, 54	7, 54	7, 55	7, 54	7, 54	7, 54	7, 54
3 乐	11, 0	1, 11	0, 11	1, 11	1, 11	1, 11	1, 11
4 小学	8, 0	1, 8	0, 8	1, 8	1, 8	1, 8	1, 8
5 史	13, 85	13, 96	13, 89	13, 87	13, 62	13, 90	13, 90
6 诸子	11, 39	14, 48	11, 39	11, 39	11, 48	11, 48	14, 48
7 天文	3, 15	3, 15	3, 15	3, 15	3, 15	3, 15	3, 15
8 五行	30, 0	4, 30	0, 30	1, 30	1, 30	30, 33	4, 30
9 艺术	16, 0	1, 17	0, 17	1, 16	1, 17	1, 17	1, 17
10 医方	27, 0	2, 26	0, 26	1, 26	1, 26	1, 26	2, 26
11 类书	0, 0	1, 2	2, 0	1, 2	1, 1	1, 2	1, 2
12 文	22, 0	26, 40	0, 22	1, 22	22, 23	22, 40	26, 41
合计一	155, 284	82, 442	—	—	—	100, 422	—
合计二	157, 282	82, 436	45, 401	50, 400	71, 384	100, 432	82, 431

注:表中用下划线标出各家统计与本文的不同之处。另外,“合计一”指各家明确直接给出的总数字,“合计二”是按照各家列举所统计出来的数字,二者有时稍有出入。

表中没有列出来新夏先生的统计。来先生在《古典目录学浅说》中讲到《艺文略》时,认为其划分是“十二类,百家,三七一种”^[5]。在几年后重新撰

写《古典目录学》中则认为应该是“十二类,八十二家,四百三十种”,并注释称“对类、家、种的数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计算结果。……我核查《通志·艺文略》各家后的凡计,实际数是十二类八十二家四三〇种。”^[6]来先生的方法与本文一样采取了凡计的统计,但凡计中只说“凡类书一种”,因而来先生没有把“类书”上下独立出来,因此比本文结论少一种。

此外,与本文结论最接近的就是吕绍虞先生与王重民先生的统计了。吕绍虞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稿》第三章第三节和王重民先生《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三章第八节都详细列举了《艺文略》类目,并统计为12大类,82小类,442种(合计一)。二家所列细目相同,据细目统计(合计二)则实际为82小类,436种(自身差异在“别集类”)。与本文的差异一是正史类将“宋齐梁陈书、后魏北齐后周隋书”分开计为“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多了6种,二是文类漏举“别集诗”一种。这样去6添1则适与本文结论431种相同。

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的《分类篇》里以图表形式列出了《艺文略》的分类,并统计为12类,155小类,284目(合计一),但是按照其所列举相加实际应为157小类,282目(合计二)。与本文差异在于,首先姚氏将如“道家”一至四等划分合并算作一小类,其次又将“乐”“小学”“五行”等类的三级类目与二级类目相同的升为二级类目,因此出现许多三级类目数量为0的情况。可以看出,姚氏的分类态度是认为同级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分类如果相同,就没有独立的必要,遵守了“分类必须体现不同”的原则。这种原则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性,但如前文所述,这并不符合郑樵“类书如持军”的思想,郑樵是有意重复的。此外,姚氏的小失误还包括“正史类”分“宋齐梁陈书、后魏北齐后周隋书”为“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编年类”分“魏吴”为二,“杂史类”分“魏晋”为二,“地里类”分“都城宫苑”为“都城、宫苑”并多“塔寺”一目,“艺术类”漏掉了“艺术总”,“医方类”分“明堂针灸”为“明堂、针灸”,大多是由于二级分类后的列目与凡计本有出入,姚氏据列目而未核凡计。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第八编第四章里抄录了《艺文略》的分类,但没有给出明确数字或说明^[10]。张先生大体按照《艺文略》所列的细目过录,以大字作一二级分类,小字作三级分类。“乐”“小学”“五

行”“艺术”“医方”“文”等大类下径列小字，“霸史”“职官”“类书”下列“上下”；“故事”“儒术”“法家”等下空白。根据字体大小拟测，张先生也舍掉了许多二级分类，这一点与姚名达类似。此外张先生的小失误还包括其“经解类”的“经解”目作“通义”，“仪注类”分“王国州县仪注”为“王国州、县仪注”，“道家类”合“内视、导引”为一等。

程千帆、徐有富二先生合著的《校讎广义·目录编》第四章第三节里抄录了《艺文略》的分类，也没有给出明确数字^[1]。其所列大体与张舜徽先生形式相同，以大字作一二级分类，小字作三级分类。而与张先生的不同在于，其保留了许多二级类目，如“乐”“小学”“五行”“艺术”“医方”“文”等大类下先以大字列“乐”“小学”等二级类目，再以小字列三级类目，除去“文”类未按郑樵的体系外，其余大体沿用了郑樵的凡计，只是省掉了许多与二级类目相同的三级类目。此外，其小失误还包括列举中“易类”分“论说”为二，“杂史类”合“隋、唐”为一，“传记类”合“名号、冥异”为一，“道家类”合“内视、导引”为一，“艺术类”漏举“画图”一目^⑤。

张富祥先生在《宋代文献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抄录了《艺文略》的分类，对二级类目，他将所有的“上下”或“一二三”合并，故为71类；对于三级类目，他虽按照凡计抄录为431种（与本文同，类书上下算2种），但其后分析称类目分上下或按时代划分均不合理，应当合并分上下或仅以时代划分的若干种，“那么

种数就应该减少47种”，“12大类、71小类、384种才是它的真实分类体系”^[8]。如前所述，这种合并是不符合郑樵思想与本意的。

此外，还有12类，100家，432种的说法（如朱天俊等）；12类，100家，422种的说法（如《郑樵评传》等），两者都源自郑樵《类例论》，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经过修正，一个照录郑樵原文，其误已见前文分析。另外更有其他不同的结论，大都是统计方式不妥或根本没有理解郑樵的分类思想，不待详辩其非。

5 结语

《艺文略》类目具体数量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体现出的研究者们对郑樵分类思想和体系的认识不够充分，尤其是“类书如持军”的目录学思想即分类方式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艺文略》的类目数量的研究，首先要对郑樵的目录学思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用恰当的标准进行统计，在出现矛盾或疑惑时，不要过于拘泥机械的方法或数字，而应当从郑樵的分类思想加以把握，从前后文体例、收书内容等多方面进行考察，这样得出的类目数量才更加准确、更能体现郑樵的思想。本文通过上述方法，最终得出《通志·艺文略》具体类目数量是12大类，82小类，431种的结论，这不仅解决了众说纷纭的类目数量问题，更有助于推进对郑樵目录学思想的认识与研究。

注释：

- ①“四百二十二”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详见后文。
- ②如“经解”家列目中缺“经解”一种，“算术”家列目中缺“算术”一种，“艺术”家列目中缺“艺术”一种等情况。
- ③此处文字据王树民点校的《通志·二十略》，王氏对该段文字并没有出校勘记，表明这段文字在其所参校的众多版本中并无异文。按王氏的参校本中包括元大德刻元明递修本《通志》，这是现存最早的《通志》版本，《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中即收有此本。考再造本中此处文字与王氏点校本同，故可信王氏所参考诸本于此并无异文。
- ④郑樵在《通志·校讎略》的《崇文明于两类论一篇》中称赞《崇文总目》说“杂史一类虽不标别，然分上下二卷，即为二家”，这一称赞的关注点即体现了不标名目而隐为区别的思想。
- ⑤以上所举小失误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第三卷《校讎广义·目录编》中均已改正并用方框标出，见该书107-110页。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4.
- [2]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74.

- [3]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9.
- [4] 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1978(3):347.
- [5]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7.
- [6]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1:225.
- [7] 徐有富.郑樵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9.
- [8]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7.
- [9] 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0]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15-218.
- [1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8:142-146.

作者简介: 刘骏勃(1990—),男,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目录学。

收稿日期: 2018-07-04

(上接第72页)

机微信客户端等各类常用手机APP培训、电子阅读器使用培训、手机网购培训等,通过一系列低门槛、公益性培训,增强读者使用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的意识,借此也可以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活动,让总分馆制建设拥有更好的受众基础。

4.5 善于开创社会合作模式

公共图书馆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综合体,其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也在激发读者需求。随着读者享受文化服务意识的增强,对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县级总馆应当加强社会合作能力,与各类社会组织或机构(如各类学校、工商企业、社会团体、个体户等)开展分馆建设合作、服务供给合作,通过“阳光合作”“互益合作”,增强总分馆

制规模及服务供给能力,自觉适应公共图书馆发展趋势,激发总分馆制建设活力。

5 结语

永济市县级总分馆制虽然尚未真正成熟,但是其建设模式初步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初步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协同发展,总分馆制建设逐渐纳入了政府日常工作,成为文化行政部门的重点工作事项,对全省乃至全国总分馆制建设颇有借鉴意义。其所面临的部分问题,也是业界的共性问题,通过深刻认识永济市的实践探索,可让总分馆制建设更得法、更合法。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等5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18-06-11].http://zwgk.mcpcc.gov.cn/auto255/201701/t20170118_477688.html.
- [2] 张凤鸣.“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法律化[J].图书馆,2018(5):6-10.
- [3] 新华社.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18-06-05].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4/content_2804250.htm.
- [4] 闫琪,侯晓斌.山西省构建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实践与思考[J].经济师,2018(4):215-217,219.
- [5] 柳斌杰,雒树刚,袁曙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5-8.

作者简介: 李子峰(1988—),男,山西省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促进与用户服务。

收稿日期: 2018-08-09

· 文献学研究 ·

新发现张寿镛及《四明丛书》稿抄文献研究*

李开升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浙江宁波 315010)

摘要:近年,天一阁博物馆发现了一批民国时期张寿镛的稿抄文献,包括书稿、诗文及友朋信札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有关《四明丛书》的编纂刊刻史料。这些史料揭示了《四明丛书》筹划、文献征集、编纂和刊印方面的诸多细节,对推动《四明丛书》的编纂和刻印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张寿镛;《四明丛书》;稿抄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Zhang Shouyong's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and His *Simingcongshu* Manuscript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batch of manuscripts about Zhang Shouyong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ianyige Museum, including his works, poems, essays, and letters from his friend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most important manuscripts are about *Simingcongshu*. These materials reveal many details of the planning, collecting of documents,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Simingcongshu*,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Zhang Shouyong; *Simingcongshu*; manuscripts

1 引言

张寿镛(1876—1945年),字咏霓,号伯颂,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藏书家、教育家、文献学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民国间历任浙江、湖北、江苏等省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创办光华大学并任校长。其约园藏书达十六万卷。著有《约园杂著》等。其所编《四明丛书》八集一百七十八种、一千一百七十七卷,是宁波历史上规模最大、编印最精的丛书,是浙江文献的渊薮,也是中国丛书史、文化史上的杰构。

近年,天一阁博物馆在整理未编书和民国旧档时发现了一批有关张寿镛的稿抄文献,主要内容是张

寿镛的书稿、诗文稿及友朋信札等,其中未编书部分曾按不同的主题整理出版^①。这批文献中内容最集中的是张寿镛编刻《四明丛书》的相关稿抄文献,对研究《四明丛书》的编纂和刻印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利用这批文献,从丛书筹划、文献搜集、丛书编纂及丛书刻印4个方面对《四明丛书》的编刻经过进行新的探讨。

2 《四明丛书》的编纂刊刻

2.1 丛书筹划

张寿镛筹划编刻《四明丛书》,发愿于民国初年,相助筹划者有张美翊、冯贞群等十余人,这在《四明丛书凡例》及《约园杂著续编》等已出版著作中均有

* 本文系2018年度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新发现张寿镛及《四明丛书》稿抄本研究”(项目编号:G18-ZC01)成果。

记载,故前人研究已涉及^②。但具体如何筹划、筹划方式及筹划经过如何,则大多不甚了了。这次新发现的文献中恰有两种涉及《四明丛书》的筹划。其一为张原炜(1880—1950年)致张寿镛手札:

廿日言别,到沪后,晤君木,谈及《四明丛刊》,渠极愿共襄斯举。廿三日自沪返甬,走访孟颀,商量着手办法,诸与老丈所言多吻合处。唯前所发函尚未接到,想为邮寄所误(原注:让丈处未去过,大约亦未接到也)。刻书体例就管见所及,略拟五、六条奉上,幸裁正之。兹事草创伊始,缓则惧其无成,急又恐其失当。

信中“君木”指冯开(1874—1931年)^③,冯氏字君木。“孟颀”即冯贞群(1886—1962年),冯氏字孟颀。“让丈”指张美翊(1856—1924年),张氏字让三。三人均为宁波近代颇有影响的人物。写此信时张美翊尚在世,可知当在1924年之前。又其下文提及张原炜未能参加当月举行的浙江省议会第三次临时会,按浙江省议会议民国十二年(1923年)举行过三次临时会,其余年份只有一次或二次^④,可知此信当写于1923年。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此时丛书的名字可能尚未完全确定,故信中称之为“四明丛刊”,而不是“四明丛书”。张寿镛正式编纂《四明丛书》第一集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距此尚有七年之久,书名未定也在情理之中。

(2)张原炜对于丛书筹划,既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信中提及的体例“略拟五、六条”(此体例内容尚未发现),又起到了居中联络沟通的作用。1923年张寿镛尚在浙江省财政厅长的任上,身处省城杭州,公务繁忙,而参与丛书筹划的诸人,多在宁波、上海,如关键人物张美翊、冯贞群均在宁波,彼此交流不甚方便。而张原炜为浙江省地方议会议员,经常到杭州开会,同时又不需常住省城,故经常往来杭、甬之间,正是居中沟通的最佳人选。而且张氏显然对此事很热心,不仅在家乡宁波筹划,还去上海联络乡贤。显然,有张原炜居间沟通,较之仅凭张寿镛书信联系,效果更好。

(3)冯开也参与了前期的筹划工作,这一点尚未见有文献提及。虽然目前并不清楚冯开具体提出了什么建议、做了哪些工作,但从信中所云冯氏“极愿共襄斯举”来看,冯氏应该不会毫无建言,至少他是很支持的。

(4)张寿镛编刻《四明丛书》最早发愿于民国初

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着手编纂,其间长达十余年中,丛书的编纂处于何种状态,以前学界是不甚清楚的。这封信则提供了一些很具体的信息,由此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工作并未停顿,而是有着很切实的进展,如张原炜多方奔走联络,并提出丛书体例五、六条。

另一种文献为张世杓(1879—1958年)致张寿镛手札,其中转述了冯贞群关于丛书编纂的几条原则:

以该书之价值为第一,至于感情方面及个人嗜好,均应置为后图。否则数十年之后,价值日减,则个人现在只努力,亦归徒劳。

其书务求最足之本。各家藏本往往钞写未完,或因忌讳残缺不完,故当努力搜求充足之本。

校订务求精善,脱讹之处力求订正。

冯贞群所提的三条,涉及丛书选目的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从内容方面来说的,后两条则是版本问题。这是丛书编纂之前需要考虑的凡例问题。而后来刊行的《四明丛书》第一集卷首《四明丛书凡例》第二、四、八条,恰可与这三条相对应。

2.2 文献搜集

文献搜集是编纂丛书的第一步工作,很多时候与丛书筹划同时进行。文献搜集为丛书的编纂提供基本的材料,从根本上、源头上决定着丛书质量。从这批文献看,张寿镛的文献搜集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编纂专题目录,即编纂有关宁波文献的书目。即目求书,按图索骥。这是文献搜集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成规模的文献搜集办法。二是通过各种途径零星获得文献。

首先是编纂专题书目。作为版本目录学专家,张寿镛深谙文献整理工作以目录为然的道理,因此他围绕《四明丛书》编纂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书目。这些书目中规模最大、为学界所熟知的是《四明经籍志》,已分别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问世^⑤。但除此之外,在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搜集文献的工作中,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相关书目,学界尚不甚了解。这些书目大致可分为三类^⑥。第一类是不甚完整、带有草目性质的宁波地方文献目录。如《四明著述者》《四明遗书存佚》等书目,前者以人系书,包括从汉代至宋代宁波地区二十位作者的著作。后者包含一百十四种宁波人著作。第二类是从官私书目或藏书家藏书中整理出来的宁波著作,如《清四库著录四明书籍目录》《慈溪沈

氏抱经楼藏甬人著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楼藏四明先哲著述草目》《张之铭所藏四明先哲书目》等书目。第一种源自《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四库著录书目和四库存目两部分。后三种分别出自宁波藏书家沈德寿抱经楼藏书、湖州藏书家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和宁波藏书家张之铭藏书。第三类是某一家族或个人的著作目录，如《屠氏书目》《梨洲著作目录》等书目。前者是宁波屠氏家族著作书目，后者是黄宗羲著作书目。

其次是通过各种途径零星获取文献。大概可分为4种情况。

(1) 第一种是通过藏书机构搜集宁波文献。如1933年5月12日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中文采访组致鄞县文献委员会手札一通，谈受鄞县文献委员会委托向东方文化筹备处抄录徐时栋《四明丛集》之事，并附账单。据此可知此次共抄录《四明丛集》中文献十六种一千零十页，合计纸张费、抄费、校费一百零二元三角二分。账单中详列每种书之页数、字数、抄费、校费。而据《四明丛书》第二集《现成话》张寿镛跋可知，鄞县文献委员会是受张寿镛委托办理此事的，《现成话》即此次所抄书之一。

(2) 第二种是通过书店搜集宁波文献。如张寿镛第五子张芝联致张寿镛手札，列出书肆送来宁波人著作《樗庵存稿》《今白华堂文集》等7种，每种均注明价格及简单提要，后云：

以上七书未悉大人何种已有、何种需购，请谕示，俾与书肆接洽、讲价。如日子过长，恐又将涨价。男允其以十日为期，十日后方可售与他主。敬请早日赐谕为盼。

张芝联时在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北平书业发达，便于搜集文献。

(3) 第三种是个人提供其先人遗著。如童葭青致张寿镛手札一通，云将其父童赓年（慈溪人，号柘叟）遗稿八种十七册送给张寿镛，并附八种书之目录，目录上有张寿镛手书五字“童柘叟遗墨”。又如宁波律师陈宗劬致张寿镛手札一通，提到曾将祖父遗著交给张寿镛，以供其收入《四明丛书》。

(4) 第四种是藏书家或业界朋友零星提供宁波文献。如张元济致张寿镛手札一通，云送给张寿镛宁波人张子中著《醯鸡鸣甌》明刻残本一册，与张寿镛所藏一册为同一种书。此书二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乃张寿镛身后家属所捐约园藏书之一。其第一册

为张寿镛原藏，第二册有张元济跋，即张元济送张寿镛者。又如傅增湘致慎斋手札一通，询问张寿镛是否需要徐时栋旧藏抄本《四明它山图经》，有人委托出售。再如赵万里致张寿镛手札一通，提供了《白斋集》《攻媿集》《张文定公集》等宁波文献的信息。又如董启俊致张寿镛手札，推荐张可久、任昱、汤舜民等人作品，并提供比较详细的版本信息。

在新发现的文献中，还反映出文献搜集中的成本等问题。前引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搜集书籍的抄录等费用是比较简单、直接的成本，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成本，或者说文献提供者提出的要求。比如《四明丛书》第一集所收周容《春酒堂遗书》使用的是冯贞群的整理本，此书张寿镛序仅云冯贞群“出其所编遗书”“尽心以收先生（周容）之书”，冯贞群总目后题识也只说“约园（张寿镛）来访遗书，爰出鄞山（周容）之作，趣其付梓”，都没有提到冯贞群提了什么要求或张寿镛为此整理本付出了什么成本。然在前引张世杓致张寿镛手札中，提到了冯贞群对使用其整理本的要求：

《春酒堂遗书》四种，坊间铅板编辑既不全，且遗漏舛误不少。此书孟颀颇费心力，搜检凡数易稿始成。据云诗胜于文。杓要求录副，尚未允诺。渠所希望此书速刻，刻时对渠条件如下：

（一）渠所校订，费力之处，不得没之，且防止他人之袭取。

（二）于短期间将此书印出，即排入于《四明丛书》甲集之中。

（三）印成后，加印二百部单行本送他，以便他赠送于人，即作为此项稿本之酬劳。

以上系渠所希望，不知尊意如何？如相合，可由公亲笔致函保证上列条件，专人送中也。

当张世杓提出要抄录冯贞群的整理本时，冯氏没有答应，而是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条要求保证著作权不受侵犯，第二条要求尽快出版，第三条要求以二百部样书抵稿酬。冯氏在此书上花费了很多心力，付出了大量劳动，提出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张寿镛来说，这些都是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后来《春酒堂遗书》收入《四明丛书》第一集率先出版，卷端署“慈溪冯贞群孟颀编”，前两条要求都满足了。至于第三条，目前还没有材料表明是否完全执行。

前引童葭青致张寿镛手札，送上其父童赓年著

作十七册,同时也提出了诉求:

世姪窘困如斯,度日如年,光明之望,维我公之垂怜。否则古稀之母,同填沟渠,不肖莫甚矣。恳赐款小厂可也。

言辞很可怜,如果张寿镛不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他们母子就活不下去了。张寿镛既然收下了书稿,则不能不有所表示,实际上也相当于购买了,因是故人之遗孀孤子,恐怕价格还不会太低。

文献搜集中还有一种情况,个人将先人遗著交给张寿镛,但由于各种原因,如著作未完,需要重新编纂,或著作本身价值不大,最后未能出版,有人就会将书索回。如前引陈宗劬致张寿镛手札,主要就是索还祖父书稿的,因其书一直未能出版。这是向个人征集文献可能带来的问题,不是所有书稿都能达到出版要求。这也是张寿镛在文献搜集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除了个人送来的先人遗著之外,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搜集来的宁波文献,最终未能出版的还有不少。除了前述著作未完成、价值不大等原因之外,没来得及出版也是一个原因,《四明丛书》原计划出版十集,最终只出版了八集。这些书如《会稽先贤祠传赞》《舂草》《三全韵》《历代河渠考》《陶陶轩诗集总抄》《句章摭逸》《四明摭余录》《四明余话》等均是^⑥。

2.3 丛书编纂

对于丛书编纂而言,选目确定以后,主要就是文本编辑、校勘问题,这直接决定着丛书的质量。此外还有序、跋的撰写,也是反映编纂水平的重要内容。

文本编辑,主要是编成足本,即《四明丛书凡例》第四条,亦即前述冯贞群关于丛书编纂原则的第二条建议所言者。这就要求编者广泛搜集各种不同版本,加以比勘,校出文本最足最完整的版本。比如《春酒堂遗书》,张寿镛在序中感叹以前没有读到全本,前引张世构手札也特意指出坊间流传者内容不全,而冯贞群数易其稿,才编成全本。还有一种情况,其书早已散逸,需要重新辑佚成书,如《虞秘监集》,即张寿镛所辑。这批文献中有稿本《虞秘监集》二册,可以看出其辑佚、编纂过程^{[2]1-4}。

文本校勘,主要是校正文本讹误,即《四明丛书凡例》第八条,亦即前述冯贞群关于丛书编纂原则的第二条建议所言者。如夏启瑜致张寿镛手札一通,专门讨论华夏《过宣言》文字校勘问题:

过宜先生(华夏)文辞诡奇,僻奥难明,明季有此体格,而先生实尤甚。加以抄写舛谬,往往不可思议。弟处既无旧稿可对,又无他书可以互证。即间有几处更正,不过纠抄胥之误,何足以言校勘!所作之跋准拟抽下,公自撰以归一律。惟意所未安者,钩勒以识别之,此法尚属可采。另附格式一纸,可交抄手,切勿遗失为要……《过宣言》有介乎可解不可解者,尚未尽加钩勒,卷次亦未敢强分。最好请藏书多而嗜书又笃者覆核之,幸甚幸甚。

其中交待了夏氏所校情况及其对进一步校勘的建议。《过宣言》收入《四明丛书》第二集。又如沈祖绵致张寿镛手札一通,谈全祖望《读易别录》的校勘问题。《读易别录》收入《四明丛书》第四集。

《四明丛书》中每种书均有张寿镛所撰序,部分书有张寿镛跋。这些序跋的底稿大多可能都已散失。新发现的文献中保存比较多的是第二集的序跋和第七集的序稿。其中第二集序跋最多,包括七篇序、六篇跋,有些序跋既有手稿,又有修改稿,有的还有第三稿,合计不同版本之稿共二十篇。除了其中一篇为何刚德所撰第二集之跋外(有两稿),其余均为张寿镛所撰。有五篇为张氏手稿,其余修改稿正文为他人誊写,修改之处为张寿镛手迹。如《六经堂遗事》序、跋均有三稿,即手稿、二稿、三稿。《六经堂遗事序》手稿第一句作“明自成、弘以至正、嘉”,二稿此句加删除符号,三稿已无此句,而作“有明之季”,后来正式出版的刻本则与三稿同。其他手稿与修改稿情况大多与此相类。第七集序稿存六篇,加上第七集总序、后序共八篇,均为张寿镛手稿,满篇涂抹修改,与第二集相近^{[2]53-58}。从这些稿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张寿镛撰写、修改的过程,也可见张氏编纂《四明丛书》之劳费心力。

2.4 丛书刻印

丛书的刊刻和印刷,相当于进入出版流程。此次新发现的文献中有关信札和文稿揭示了这一流程中的许多重要信息。

首先,这一阶段协助张寿镛负责编校、出版事务的主要人物是施维藩,其工作地点在湖州南浔刘承幹嘉业藏书楼。施维藩(1897—1944年),字天游,号韵秋,浙江海门人。1925年至1937年在南浔嘉业藏书楼工作,曾任嘉业藏书楼编目部主任^{[3]222-223,252}。《四明丛书凡例》末条云:“海门施君韵秋总任勘校,尤尽

心焉。”新发现文献中有施维藩致张寿镛手札八通、施维藩致张有伦手札两通，信札用纸为嘉业堂专用信纸，信纸左下方栏外印“南浔嘉业藏书楼用笺”九字。据信中内容，《四明丛书》第一集尚未出版，当均写于1931年或稍前。信中所谈均为《四明丛书》编校、刊印之事。施维藩由张寿镛专门聘请，有比较优厚的薪金。施维藩四月二十五日致张寿镛手札云：“维藩猥荷誦诤，自当力图报称，岁糜厚俸，已感不安，前赐薪金，万难拜领。”显然，除了每年的固定工资之外，张寿镛还会不定时给他奖金。

其次，承担《四明丛书》刊刻业务的有南京姜文卿刻书处和扬州周楚江刻书处。姜文卿，清末民国南京著名刻工、刻书店老板，其店铺在南京东牌楼党家巷。其子姜瑞书（字毓麟）承父业，抗战胜利后继续营业^[4]，为南京市刻字印章商业公会负责人^[5]。周楚江，扬州刻书者。姜、周二二人皆曾为刘承幹嘉业堂刻书^{[3]151-152}，这很可能就是张寿镛将《四明丛书》出版工作放在嘉业堂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寿镛曾致姜文卿手札一通，谈《春秋集注序》的修改问题^{[2]62-64}。施维藩九月十日致张寿镛手札云：“宁、扬两刻书处接电后，均以快邮见覆，扬州一信顷始收到，两处书版安全无恙。”又施维藩五月二十六日致张有伦手札云：“刻书处以书既刻成，钱已领到，修板每迟迟不理，此最可恶。已分告姜、周，接到校样后，务于短时间内将板修好。”其中“宁”“姜”即南京姜文卿刻书处，“扬”“周”即扬州周楚江。张有伦（1887—1962年），别号秉三，浙江吴兴人，曾任松江税务局局长、国民政府检察院参事、上海文史馆馆员^[6]。《四明丛书凡例》最后一条提及“吴兴张君秉三首先赞助”。

第三，《四明丛书》刊印的基本流程是先在南京、扬州刻好书版，再运到南浔嘉业藏书楼刷印。新发现文献中有一册稿本《四明丛书第二集序跋》，其中《陈忠贞公遗集序》有张寿镛手批：“此序即刻，将全书板即俟齐定日运南浔。寿镛，十一月廿七。”又施维藩手札中多有南京姜文卿寄印样之语，如七月七日致张寿镛手札云：“姜刻书处端节所交各书有修成红样七册……《畏斋集》卷四、《积斋集》卷三、四，请将红样寄还。”可知其大致出版程序为：原稿送到南京、扬州刻书处，初步刻好书版，刷印出红样，寄到南浔施维藩处，进行校对或校勘，施维藩再将其寄到上海张寿镛处，请张看过，再由施维藩将校改之处统一寄给

刻书处修改。由前引施维藩致张有伦手札可知，刻书处对修版往往不太积极，需要督促。刻书处将书版修改好之后，将“齐定”的书版运到南浔。丛书的正式刷印工作应该在南浔进行。

第四，《四明丛书》第六、七集很可能是在上海印刷的，在南浔印刷的是第一到五集。二者的差别是，前五集出版于1937年以前，第六、七集出版于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而1937年以后，施维藩也去了上海^{[3]252}。新发现文献中有一件《〈四明丛书〉在沪开印计划书》：

（一）购纸。文康京庄苏州纸号有五件，上海惟南京路北洪泰有一件，该号允往产地订购，二三个月陆续交货。

（二）运板。试运《纯德汇编》已安全到沪，拟将第六集未修之板陆续启运，已修者最后运出。

（三）修板。板片运到千片左右，即雇工二名来沪修补。

（四）赁屋。运来板片暂存尊处，或指定其他处所，俟修板开始时，赁屋一小幢，或平屋二三间，为藏板室及工场等用。

（五）印书。板片修至相当时期，即雇印工二名开印。部数最少五十部，否则扯算成本太不合算。墨汁用具亦由南浔运出。

（六）期限。及今赶运板片，三月中开始修板，五月初开始印刷，七月中第六集成书，十月中第七集成书。非常时期进行，或未能如预期之顺利。惟国历年内总可全功告成。

（七）费用。六、七两集各印五十部，约共需费三千元，每部扯合成本三十元。

这份计划书是否完全执行，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其中《纯德汇编》一书已经提前运。再从下文提到的第六集印刷情况看，计划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按《张约园自定年谱》，第六、七集分别成于1939年、1941年，而第（六）条中有“非常时期”云云，且张寿镛去世于战争结束之前，可知印刷应该就在战争时期，可能在1941年或稍后。从第（一）条购纸可知其时纸张不容易买到。计划书中也透露了当时印书的一些细节，比如印书的成本，第（七）条云每部三十元，《四明丛书》第六、七集每部均在六十至七十册之间，则每册合零点五元。又第（五）条提到至少刷印五十部成本上才划算。从第（五）条“墨汁用具亦由南浔运出”来看，书版应该也是从南浔运出的。

第五,从《四明丛书》第六集的部分书籍来看,其印刷数量大多为一百五十部,少数为五十部,个别为三百部。古籍的印刷数量一直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古籍都不会标明印量。《四明丛书》的印量也未见有人提过。比较幸运的是,新发现材料中有两张第六集已经印刷的十六种书的清单,其中《穹天论》《虞征士遗书》《颐菴居士集》《四明宋元僧诗》《纯德汇编》《甬东正气集》《四明诗干》《大衍集》《约仙遗稿》《四明人鉴》《养园剩稿》等十一种印一百五十部,《全校水经注水道表》《明明子论语义疏》《贞白五书》《留补堂集选》等四种印五十部,《劝忍百箴》一种印三百部。

3 结语

《四明丛书》在宁波、浙江乃至中国文献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其编纂和刊印的一些细节却一直不甚清楚,主要是受到文献的限制。这次新发现的一批文献,对推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这批文献比较零散、很不系统,比如施维藩和张寿镛有关工作通信,只有较早一年的,其后数年均无。《四明丛书》各集序跋稿,也只有第二、七两集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均无。因此有些问题,如1937年以后施维藩及刻书处的工作情况等,还需要新的文献材料和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 ①其中有关《四明丛书》者,整理出版为《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其中的张寿镛手稿,整理出版为《天一阁藏张寿镛手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两书所收皆是在未编书中发现者,至于民国旧档部分,则为此后发现。
- ②如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24-226页;徐小燕《张寿镛及其〈四明丛书〉研究》,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第94-95页。
- ③冯开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见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沙孟海研究》第8辑,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4页),很多论著据此将其生年转换为公元1873年(沙孟海此文夹注之公元纪年即如此),实则中历十一月十九日已为西历次年1月7日,故其生年当为1874年。
- ④影印本由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于2006年出版,整理本以《增订四明经籍志》为题由宁波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 ⑤以下八种书目,除《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楼藏四明先哲著述草目》《张之铭所藏四明先哲书目》《屠氏书目》三种之外,其余五种已著录于《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第125-147页;五种中之《慈溪沈氏抱经楼藏甬人著作》《梨洲著作目录》因是张寿镛手稿,故又全文收入《天一阁藏张寿镛手稿》,第443-452页。
- ⑥这几种书的详细情况见《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第65-114页。

参考文献:

- [1] 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M].上海:三联书店,2005:319.
- [2] 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 [3] 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 [4] 卢前.书林别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0-301.
- [5] 蔡鸿源,徐友春.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M].黄山:黄山书社,2012:331.
- [6] 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189.

作者简介:李开升(1982—),男,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藏书史。

收稿日期:2018-07-04

· 文献学研究 ·

《韩诗翼要》三题考辨

吕冠南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韩诗翼要》十卷是汉代《韩诗》学派的重要著作。但由于《隋书·经籍志》未对此书进行详细介绍,加之该书亡佚已久,其基本信息已湮灭无考。前人偶有对其相关情况进行考证者,却仍有订补之余地。结合史料记载与文献征引情况,可就其作者、性质及辑佚等三方面内容进行考察。

关键词:《韩诗翼要》;辑佚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ree Factors of *Hanshi Yiyao*

Abstract The ten volumes of *Hanshi Yiyao*, recorded by *Suishu Jingjizhi*, are important work in the school of *Han Poem*. However, *Jingjizhi* does not record details of these ten volumes and they have been disappeared long ago, even basic information cannot be learnt completely.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volumes from time to time, many questions are still left un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author, character and compiling of Han Poem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Key words *Hanshi Yiyao*; compiling

由西汉学者韩婴创辟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代表,与鲁人申公所创《鲁诗》及齐人轲固所传《齐诗》均列于学官,对汉代学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著录了四部《韩诗》学派的著作,但除了《韩诗外传》传世至今,其他三部著作均已亡佚。接续《汉书·艺文志》的《隋书·经籍志》又著录了一种新的《韩诗》专著,即《韩诗翼要》。但由于此书亡佚较早,佚文数量较少,同时《隋书·经籍志》除了著录其作者及卷数信息之外,未就此书的其他信息进行介绍。兹谨结合史料记载与文献征引,就《韩诗翼要》之作者、性质、辑佚三方面进行考察。

1 《韩诗翼要》的作者

《韩诗翼要》首见于《隋书·经籍志》^[1]。撰者有题作侯苞者,有题作侯包者,亦有题作侯芭者。清人姚振宗认为:“《汉书·杨雄传》云:‘钜鹿侯芭,尝从

雄居。’……苞与芭形声相近,非别一人,即杨雄弟子,钜鹿人也”^[2],“其称侯包者,则又苞之误也”^[3]。可知侯苞(亦讹作侯包)、侯芭系同一人,兹从《汉书·杨雄传》,题作侯芭。“苞”“芭”之互见,另有一例可作辅证:《隋书·音乐志下》论及房中乐时,有“据毛茛、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之句^[4],用的是“侯苞”之名;而宋人陈旸《乐书》卷一一三《房中乐》化用这节文字时,却写成“毛茛、侯芭、孙毓皆言有钟磬”^[5],用的是“侯芭”之名。这证明陈旸所读到的《隋书》实作“侯芭”,今本《隋书》作“侯苞”,当系“苞与芭形声相近”而致歧。

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可知侯芭字铺子,又字子常,钜鹿人,曾受学于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侯氏著述在《韩诗翼要》之外,“又有《法言注》,见本志子部儒家类;又有《太玄注》,见王涯《说玄》。今传《太玄》释文,出自侯芭云”^[3]。另据《汉书·扬雄传》,雄卒后,“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6],《艺文类聚》卷四十引《扬雄家牒》记“侯芭负土作坟,号

曰‘玄冢’”^[7]，可谓极尽弟子之礼。清人王谟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韩诗翼要》，遂以“包当属后汉人，出处亦无考”，并谓“今本《隋志》误作侯芭，扬雄弟子载酒问奇字者”^[8]。现在看，这些判断表达的均是颠倒事实。

对侯芭撰《韩诗翼要》之事的澄清，还有助于判定其师扬雄的《诗》学渊源。清儒陈寿祺定扬雄习《鲁诗》^[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因之，此后学界大多默认了这一看法，鲜有就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著。但熹平《鲁诗》残碑与扬雄所引《诗》存在显著不同，例如扬雄曾在《逐贫赋》有“誓将去汝”之句^[10]，显然出自《魏风·硕鼠》，但《鲁诗》此句作“逝将去女”^[11]，四字之中，有两字不同，可证扬雄所习确非《鲁诗》。事实上，此诗早已得到南宋洪适的著录^[12]，陈寿祺已辑入《鲁诗遗说考》中，显已关注了此条《鲁诗》异文，但对于扬雄《逐贫赋》提供的颠覆性异文则不置一词，未知是有意回避还是无心遗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径袭陈氏成果，亦未提及《逐贫赋》。以上是从用字方面推翻扬雄习《鲁诗》的观念。现有侯芭之例，可从师承方面助证扬雄非习《鲁诗》。因为侯芭既为扬雄弟子，则其所撰《韩诗翼要》的《诗》学渊源当受诸扬雄，据此似可定扬雄所习实为《韩诗》。

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经籍志》题《韩诗翼要》为卜商撰。但此说毫无依据，故《新唐书艺文志注·翼要十卷》谓：“《隋志》：‘《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此志不著传，可用《隋志》证之。若《旧志》以为卜商撰，则误之甚矣。”^[13]故本文不再就“卜商撰”之说进行辨析。

2 《韩诗翼要》的性质

作者既明，续就《韩诗翼要》之性质略作推求。吕思勉先生在《传、说、记》中曾就《汉书·艺文志》所载“翼经之作”进行过赅要的描述，列举了多种体裁的著作及其特点，颇有隅反之助：

翼经之作，见于《汉志》者：曰外传，曰杂传，盖摭拾前世之传为之。曰传记，曰传说，则合传与记、说为一书者也。曰说义，盖说之二名。曰杂记，则记之杂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远，故古言有待训释，此盖汉世始有。曰训传，则兼训释古言及传二者也^[14]。

惟《韩诗翼要》未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吕

先生未加探讨。从“翼要”之名来看，此书显然亦是“翼经之作”，“翼经”是其根本性质。结合《韩诗翼要》传世的几条佚文，似乎体现了上述多种体裁的特色：既有“摭拾前世之传”的“传”体性质，如叙述《大雅·抑》之本事云“卫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犹使臣日诵是诗，而不离于其侧”^[15]⁵⁵⁴，即刺取《国语·楚语》这一“前世之传”而成^[16]；又有“训释古言”的“故”体，如释读《小雅·白华》“天步艰难，之子不犹”为“天行艰难于我身，不我可也”^[15]⁴⁹⁶，显然以“行”训“步”，以“可”训“犹”，与《毛传》全同。此外，《韩诗翼要》还有涉及礼制的条目，如《周南·关雎》“钟鼓乐之”，《韩诗翼要》便以房内之乐“皆有钟声”为解^[14]³⁵⁴，显然是偏向于礼乐文化的解读。综上可见，《韩诗翼要》是一部风格多样、包孕丰富的著作。马国翰仅因此书“说‘衣褐弄瓦’与毛传合，《正义》取之为毛说”，便“意其以毛通韩，摘论节训，故以‘翼要’为名”^[17]，这显然忽视了《韩诗翼要》的多元面目，可谓“见虎一毛，不知其斑”。

《韩诗翼要》大约亡佚于唐代。唐初魏徵等人编纂的《隋书》及孔颖达编纂的《毛诗正义》还对侯芭的说法有所征引，可见彼时《韩诗翼要》仍在知识界流通。此后引用侯芭说法的文献，则均转引自《隋书》或《毛诗正义》，而非通过直接阅读《韩诗翼要》原书而来。由此可知《韩诗翼要》当于唐代之后即告消亡。

3 《韩诗翼要》的辑佚

《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对于《韩诗翼要》的辑佚本有周密的考证与介绍：

《隋志》载《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撰。《新唐志》亦作十卷，不题撰者，《旧唐志》题卜商撰，误。王谟谓《汉志》不载其书，苞当是后汉人。王谟从《隋书·音乐志》《毛诗正义》采得四节，马国翰亦从二书采得四节。按二家采自《正义》者各缺一节，王缺《斯干》“载衣之褐”，马缺《江汉》“武夫滔滔”一节。王仁俊补马氏之缺，所补即《江汉》一节^[18]。

这段提要介绍了《韩诗翼要》的3种辑本，即王谟《汉魏遗书钞》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本。兹就以上三本所辑，略作考辨于下。

(1) 房中之乐有钟磬。(释《周南·关雎》“钟鼓乐之”)

按: 见马国翰辑本, 辑自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三^[5]。马氏自注云: “案《隋书·音乐志》、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并云: ‘宏又请皇后房内之乐, 据毛茛、侯苞、孙毓故事, 皆有钟鼓。而王肃之意, 乃言不可。’”^[17]考陈旸原文作: “毛茛、侯苞、孙毓皆言有钟磬。”^[5]实转引自《隋书·音乐志下》: “据毛茛、侯苞、孙毓故事, 皆有钟声。”^[4]依辑佚古书之惯例, 当内容一致时, 理应征引年代最早者。王谟辑本即据《隋书》, 然改动为“后妃房中乐有钟声”^[8], 与原文不尽一致。

(2) 示之方也。(释《小雅·斯干》“载衣之褐, 载弄之瓦”)

按: 见马国翰辑本, 辑自《毛诗正义》卷十一之二^[15]^[438]。马辑本原作: “示之方也, 明裸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义。”^[17]^[523]“明裸制”句实为孔颖达解说“示之方也”之文, 非《韩诗翼要》之文, 当删。此条王谟

辑本漏辑。

(3) 天行艰难于我身, 不我可也。(释《小雅·白华》“天步艰难, 之子不犹”)

按: 见马国翰、王谟辑本, 均辑自《毛诗正义》卷十五之二^[15]^[496]。

(4) 卫武公刺王室, 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 犹使臣日诵是诗, 而不离于其侧。(释《大雅·抑》)

按: 见马国翰、王谟辑本, 均辑自《毛诗正义》卷十八之一^[15]^[554]。这一说法见于《国语·楚语上》: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 犹箴儆于国。……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韦昭注: “《懿》, 《诗·大雅·抑》之篇也。”

(5) 滔滔, 众至大也。(释《大雅·江汉》“武夫滔滔”)

按: 见王谟、王仁俊辑本, 辑自《毛诗正义》卷十八之四^[15]^[573]。王辑本原作“众至大貌”, 考《正义》作“众至大也”, 据正。此条马国翰辑本漏辑。

参考文献:

- [1] 兴膳宏, 川合康三. 隋书经籍志详考[M]. 东京: 汲古书院, 1995: 74.
- [2] 姚振宗. 后汉艺文志[M]//王承略, 刘心明. 二十五史经籍艺文志考补萃编: 第2卷.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25.
- [3]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7: 44.
- [4] 魏徵, 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354.
- [5] 陈旸. 乐书[M]//永瑤, 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211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469.
- [6]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410.
- [7]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731.
- [8] 王谟. 汉魏遗书钞·韩诗翼要[M]//《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第199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29.
- [9] 陈寿祺, 陈乔枞. 鲁诗遗说考[M]//《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第7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9.
- [10] 张震泽. 扬雄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47.
- [11] 马衡. 汉石经集存(释文部分)[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6: 6b.
- [12] 洪适. 隶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51.
- [13] 佚名. 新唐书艺文志注[M]//王承略, 刘心明. 二十五史经籍艺文志考补萃编: 第18卷.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18.
- [14] 吕思勉. 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753.
- [15] 孔颖达. 毛诗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6] 徐元诰. 国语集解(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500-502.
- [17]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韩诗翼要[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523.
- [18] 孙启治, 陈建华. 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58.

作者简介: 吕冠南(1989—), 男,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秦汉文学与文献。

收稿日期: 2018-06-29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年征订开启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国内统一刊号: CN33-1398/G2;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2363)为大16开, 96页, 月刊, 每期定价22元, 是浙江省内唯一正式出版的图书情报专业期刊。由本刊编辑部自办发行, 2019年出版12期, 共264元(免收杂志邮寄费),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订阅。

凡订2019年度本刊的单位和个人, 请以信汇方式将订购款汇到下列账号, 或以邮汇的方式并填写订购回执寄至本刊编辑部, 我部收到订购款和回执后即开具并寄回发票。如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 请提供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号、开户行及账号。

信汇银行: 中国银行杭州世贸支行

收款户名: 浙江图书馆

账号: 366258326759

邮局汇款: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电话: 0571-87988086

联系人: 茅珍艳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编: 310007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订购回执

订购单位/个人 (发票抬头)		
邮寄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订购份数及金额	份数: _____ 份	金额: ¥_____ 元
合计金额 (人民币大写)	_____ 万 _____ 仟 _____ 佰 _____ 拾 _____ 元整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